

# 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



甯應斌 編著

# 身体政治与媒体批判

Body Politics and Media Criticism

甯应斌 编着



## 【性／别研究】丛书

总策划 何春蕤

性工作：妓权观点

酷儿理论与政治

性侵害性骚扰之性解放

性工作研究

跨性别

身体政治与媒体批判

性工作与现代性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预行编目资料

身体政治与媒体批判／甯应斌编着 . -- 初版 . -  
- 桃园县中坻市：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2004 [ 民 93 ]  
面 ； 公分 . - ( 性／别研究丛书 )

ISBN 957-01-8748-4 ( 平装 )

1. 女性主义 - 论文, 讲词等 2. 大众传播 - 论文,  
讲词等

544.5207

93020025

【性／别研究】丛书

## 身体政治与媒体批判 Body Politics and Media Criticism

---

主编 何春蕤

封面设计 黄玛璃

执行编辑 朱玉立

出版者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地址 320 桃园县中坻市中大路 300 号

电话 ( 03 ) 4262926

传真 ( 03 ) 4262927

e-mail [sexenter@cc.ncu.edu.tw](mailto:sexenter@cc.ncu.edu.tw)

网址 <http://sex.ncu.edu.tw>

ISBN 957-01-8748-4

出版日期 2005 年 9 月初版二刷

---

版权所有 · 请勿翻印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或倒装，请寄回更换

## 论文作者简介

张锦华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

黄浩荣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

甯应斌（卡维波）

中央大学哲研所教授

黄宗慧

台湾大学外国语文系副教授

陈建志

淡江大学英文文学系助理教授

林深靖

法国里昂第三大学现代文学硕士，「台湾新社会协进会」秘书长，  
「亚洲地区 NGO 论坛」执行长，现任「民主行动联盟」执行长

汪立峡

夏潮联合会执行委员、人间学社理事

黄咏梅

东海大学社会所研究生，资深减肥实践者

何春蕤

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

# 目录

---

*i* 性／别研究丛书（书系序）  
何春蕤

*iii* 序  
甯应斌

## 一、导论

3 还童的女性？弱智的男性？  
张锦华、黄浩荣

7 老化的媒体批评，弱智的女性主义  
卡维波

11 主流性感标准与片面身体解放  
黄宗慧

15 资本主义机器文明创了新高？  
陈建志

19 青春睿智卡维波  
林深靖

27 体型歧视违反多元文化  
张锦华

## 二、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

33 青春睿智的左派？成年痴呆的左派  
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  
卡维波

---

95 卡维波，左派装可爱  
林深靖

101 反卡维波论述提纲  
汪立峽

### 三、女性主义的身体政治

111 塑身运动、厌食症到胖妹骄傲的思考  
一个女性主体与女性身体的提问  
黄咏梅

141 「减肥瘦身」的女性主义标准答案错在哪里？  
从「饮食消费与现代性」到「性感美貌的多元与普及」  
卡维波

197 全球欲望城市中缺席的女性主义身体  
卡维波

### 四、媒体批判？或媒体箝制的新策略？

207 速食业的欲望广告与社会变迁  
卡维波

213 公共电视与公关电视  
卡维波

227 综艺节目是性剥削吗？  
反对媒体分级制度  
何春蕤





# 性／别研究丛书

（书系序）

何春蕤

「性／别」研究在台湾的特殊语境中有着相当不同于「性别研究」或「妇女研究」的意含。

「性／别研究」虽然也重视性别权力关系，但是并不在知识与政治上将「性别」凌驾于其他权力关系之上。相反的，性／别研究会平等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差异，例如性、年龄、阶级、种族、身体等等。换句话说，性／别研究很认真地对待「别」（差异）。

在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差异中，有些不平等权力关系（例如阶级）已经被长期的论述所关注，有些不平等权力关系（例如性别或妇女）则已经取得某种社会正当性——虽然上述这些权力关系在全面的指标上并未达到相当程度的平等。不过还有一些不平等关系，特别是边缘的性差异与年龄，连最起码的平等地位都谈不上，甚至在批判理论的圈子中（也就是宣称进步的女性主义、左翼团体或公民权利团体中）也没有得到被认可的共识，甚至还被视为「异己它者」，以种种的理由排斥在外。

性／别研究因此无可回避地会探究边缘的权力关系与被污名的社会差异，也会同时暴露出主流批判思惟的不足与压迫性质，更会进一步地反思「批判共识」、「公共领域」、「公民社会」、「文明开化」、「公／私之分」的系谱与排它的权力效应。同时，也因为这样的

学术位置，性／别研究对于惯常的一些权力假设与政治策略——例如权力是从上而下（国家法律与政治乃是权力中心与改革焦点）——也采取怀疑的态度。

《性／别研究丛书》除了企图承载上述性／别研究的意义之外，此时此刻之所以有此学术丛书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台湾的性／别解放运动在本地特有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脉络中的发展带给性／别相关主题的学术研究者非常丰富的现实要求，使得台湾的性／别研究循着不同于其他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学术轨迹发展出特殊的论述形态。另外，部份因为现实运动路线的争议与多样，部份也为了解决实践问题，本土激发出来许多原创和新奇的概念和语汇开始重新改写传统或主流的性与性别研究论述，这些新发展也将会对国际性／别研究有所激荡。

《性／别研究丛书》的前身乃是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发行的《性／别研究》期刊（1998年创刊）。出版期刊原本是为了灵活介入理论与政治，而这份期刊当时也确实发挥了这样的功能，然而由于我们显然不由自主地偏向厚重沈实的学术呈现，使得《性／别研究》总是以厚厚的合刊本出现，在实质上也是一本本厚实的专题书籍，之后也有一段时间与远流出版社合作发行《性／别桃学》丛书。于今再度出发，我们仍不改初衷，为性／别研究的学术深化发展尽力。

# 序

甯应斌

大众媒体对于身体的呈现，特别是关于青少年的身体外表或者女体与性的话题，无论在综艺节目、电视广告、电视剧、电影、音乐、网路中的呈现，近年来均引发了许多从女性主义、亲权保护主义、宗教道德净化、或甚至左派人士的批评。这些批评基本上认为：青少年通俗文化是商业利益对青少年的剥削利用；女人的瘦身减肥是性别支配的结果；媒体则是剥削青少年与宰制女人的重要工具。

不过另一种声音则认为通俗文化虽然包含着商业利益与有时保守的意识形态，但却也存在着青少年的抵抗空间；同样的，一方面媒体在商业竞争中剥削着女体与性边缘人口，另一方面，诸如减肥瘦身等现象的背后还有比媒体洗脑更广泛的结构因素。更有甚者，许多媒体批评针对的往往不是媒体中广泛可见的对中产阶级幸福生活的美化，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循常意识形态；相反的，媒体批评的焦点多半是那些新兴的、影响不明的、有违常识规范的、可能被视为偏差的呈现。以此看来，这类媒体批判很明显的效应就是保护现状或回到过去。

这些争议的出现当然有着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历史脉络。即使在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也知道这和全球化下媒体与通俗文化的影响、贩卖欲望的商品生产、青少年的消费文化、性／别关系的演变等等

直接相关。这些争议代表了对这个广大社会历史脉络的不同理解与不同介入策略。

这本书在呈现上述争议时虽然好像有个辩论的形式，但是显然我个人的观点占据了比较大的篇幅，因此其实本书算是我对这些争议的观点陈述。其他与我观点不同的文章则提供了对这个议题的精彩与简要「导论」（本书的第一章）。「导论」的文章都曾在报章上发表过；第二章「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的三篇文章最早发表于《左翼》杂志，其他第三、第四章的文章则大都是首次正式出版。整体而言，本书文章有着彼此对话与呼应的关系。虽然我在本书批评了女性主义、左派、媒体批判，但是我对这三者还是有着基本的认同：我反对阶级、性别与媒体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不过我不能认同某些反对的策略。

在内容构想上，本书可以作为大学生的通识课程、或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媒体批评、社会学课程的入门教科书或参考读物。

本书的出版首先最要感谢的是慨然应允重刊文章的诸位作者，尤其因为他们与我的观点立场并不一定相同，因此他们对知识分享与流通的态度更令人敬佩。

我也要谢谢编辑朱玉立，她使此书能实际地问世，还有黄玛璃永远精彩的封面设计。

另外我要谢谢给我封面照片使用权的摄影者「艾许」与模特儿「婷」。我觉得这张封面照片恰巧凝缩了「身体政治与媒体批判」这个主题。这可从两方面来谈。首先，这样的照片可以追溯其系谱到人像摄影与人体艺术摄影，后者以女体为凝视对象，但是当人体被切割为部位或器官时，特别是有强烈性意味或畸异丑怪（grotesque）时，又往往造成强迫观众逼视的效果，提示了身体与我们的异化关系。上述特点均出现在这张以乳房（女体性征）与流血（象征生命与死

亡——自我又异化)的流血为构图的封面照片。至于人物或人像摄影则经常作为社会写实的工具,除了劳工、原住民、游民外,以底层污名的女体为主题的人像照片也很常见。台湾近年来以槟榔西施与性工作者为主题的艺术摄影引发了社会的普遍注意(事实上,某张著名的台北公娼摄影与本书封面照片在构图上颇为相似),这张封面照片也可以视为社会写实主义的延续,主题则是作为性/别底层的愉虐恋者,实践着玩耍式穿刺(即,有别于穿耳洞鼻环的一种暂时性穿刺)。

其次,我之所以认为本书的封面照片恰巧凝缩了「身体政治与媒体批判」,是因为对某些媒体批判者而言,这张照片或许就是膾炙人口(SM、暴力、色情、血腥);不过这张照片也同时表达了丰富的身体政治意涵,可以有各种解读(为什么流血令人恐怖震惊?流血使乳房更性感或破坏美感吗?为何宗教会常有仪式性的自残?主动侵入破坏身体是伸张自我对身体的控制吗?)。但是作为摄影主体的模特儿婷却拒绝了诸如吸血鬼、身体自主权这类文学的或政治的沉重解读,她告诉我这种玩耍式穿刺没有特别意义,流血更非重点,因为穿刺不一定会流血。或许,穿刺的微痛带给身为愉虐恋者的婷一点快感,或许,看来恐怖或困难的穿刺却一点也不恐怖或困难,带给婷一点成就感。但是婷说:基本上,玩耍式穿刺只是好玩而已,一个派对上的游戏。对婷以及很多和她一样的年轻女人而言,或许身体没有那么沉重,只是好玩而已。

甯应斌于2004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



# 一、导论





# 还童的女性？弱智的男性？

张锦华、黄浩荣

近来某则斥资巨金的美容塑身广告以极高频率出现在各大电视台与平面媒体：童话故事般的黑森林里，一名天真烂漫的小公主，小手轻捧着青蛙，绽放迷人的笑靥，背景奏着悠扬回荡的乐章，一幅如梦似幻的浪漫和谐影像，彷彿勾动你我心中最深处的纯真悸动，唤醒沉睡已久的斑斓童年……岂料却也坠入一个危机四伏的幽暗泥淖，儿童及女性的权益被践踏，男性的本质被弱智化。

一个个飘扬的醉人音符，掩饰着父系社会偷窥女体的私欲；一段段悦耳的嘹亮童声，遮蔽着成人恋童的隐癖；一次次温婉的轻柔微笑，粉饰着煽动女性（甚至是国中生）成为美容塑身业者囊中物的行销手段——然而，外表貌似迪士尼的欢愉影像符号，却狡猾地诉求着成年女性要追求一个外表上「返老还童」的不可能任务。

广告中的主角，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少女，在商业资本的雕塑下洋溢矫情的馨笑，任凭摄影镜头在其未臻成熟的身体上反复游走，特写强调女体性征的胸部部位，狡猾地让全国成人公然意淫少女正在发育的身体，美容塑身业者可以这样挟其财大气粗的资本暴力，任意地剥削才只是国中女生的女体，在全国的主要媒体上大登特登这样的广告吗？甚至曾有报导指出该业者还将投资数亿的资金，继续大量炒作这位女学生的身体，以及制造女性「如何返老还童」的焦虑！我们的社会如果是一个文明而有教养的社会，岂该继续容忍这

种剥削儿童（依据国际惯例，未满十八岁就是属于应受社会保护的儿童）的广告继续横行？

女性「返老还童」才是美吗？美容塑身业者以往大力宣传「瘦才是美」，让许多女性出现瘦身与饮食失序的焦虑；现在又开始鼓吹「还童才是美」，是不是又要在巨量的广告符号操弄之下，制造女性的「童稚化」焦虑？甚至广告中还闪过一个白发老女（以往曾为该公司做过广告模特儿的女星所饰）正在找寻「返老还童」秘方的画面，广告内容显然丑化了女性的「老化」，年龄增长的自然现象被刻画为悲哀挫折、需要极力消除的现象；这不就是将我们社会中所有的成年女性加以负面化、病态化吗？可是我们很清楚的发现，这个社会对于年龄渐增的男性却往往是十分正面肯定的，男性年龄的增长通常代表经验、智慧、甚至权威的增长。为什么却对女性的年龄渐增呈现这么负面而病态的定义？

年长的女性为什么不能是更有经验、更有内涵、更值得尊敬？什么样的男性才害怕面对一个更有智慧和能力的女性？一个社会想将女性「童稚化」，不但是扭曲、矮化女性的角色，更显示出这个社会缺少成熟而有智慧的男性，是男性弱智化的现象啊。

在这个全球化、资讯化的时代，广告已不再只是贩卖商品，更是推销价值观，建构我们所处的公共领域文化。根据研究指出，一则广告如果在短时间内让阅听人连续多次接触，就可以成功的达到转变观念态度的功能；同时，强势的大众媒体曝光率更会形成风行草偃的社会流行压力，迫使人们改变行为；前几年的瘦身广告和这几年的大哥大广告，都已成功地证明了这个过程和效果。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轻忽广告对这个社会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及所应负的公共责任，如果广告业者恶意塑造不当的偏差价值，我们也必须以发挥公民的角色监督媒体中各种文化价值观的再制。如果我们容忍这种

利用小女生的身体来满足成年人窥视欲望的广告内容持续，默许对女性年龄增长的污名化，并漠然于男性弱智化的沦落，不是将纵容这个社会愈发的不择手段且向下沈沦吗？

我们不希望政府以公权力介入任何合法的自由创意的领域，我们也肯定美容塑身业者能够对有需要者提供合理服务的贡献；然而，我们也必须维护一个自由而有品质与专业内涵的公共领域，尊重多元异见，但绝不是一再地剥削儿童、歧视弱势族群、塑造偏差的社会文化。

——原载于 2000 年 12 月 18 日《中国时报》



# 老化的媒体批评 · 弱智的女性主义

卡维波

张锦华与黄浩荣于《中国时报》时论广场版发表〈还童的女性？弱智的男性？〉一文（2000年12月18日），对于十四岁女主角的美容塑身广告提出批评，认为这个广告是在「诉求成年女性要追求一个外表上返老还童的不可能任务」，而且也让男性观众意淫少女身体，造成男性的弱智化。

张黄两人的批评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这一两年来影响舆论的媒体批判的主调。不论是对吴宗宪或综艺节目的监管、对「性」与「灵异」节目的批评、对ASOS姊妹主持风格的警告，我们都看到一个以监督媒体、以控诉剥削女体、以保护儿童、以强调格调与低俗之分、以建立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为名的言论领导权（hegemony）的出现。此一主流媒体批评的形成，其社会因素固然须要另文分析，然而笔者要在此指出，这种媒体批评是以成人老化的立场来看待青少年的新兴现象；并且是以去性化的女性立场来看待另一些渴望彰显身体的女性主体，以复诵咒语式的女性主义修辞（物化、偷窥）来解释性的开放，这些都势必造成女性主义思想的弱智化。

张黄二人对于该广告的解读是出于特定立场的诠释：广告或许是要女性观众欣羡青春女体，但是两位作者关注的却是男人看到了模特儿的胸部。两位作者虽然号称女性立场，却总是透过男性眼睛来看这个广告的女体，而不能直视女人自己的身体。事实上，女人

不能直视自己身体，或少女以身体发育为耻，正是过去女性被压抑的状态。近年来的女性情欲解放与身体风潮终于使一部份女人改变了自己与身体的压抑关系，美容塑身事业不过是这个风潮的一部份。

美容塑身事业起先是以未婚年轻女性为主要对象，但是最近则有往上与往下发展顾客群的趋势。往上就是诉求中年（可能已婚）的人口群——被批评为「还童」的意识形态；往下则是诉求青少年——被批评为「恋童」的意识形态。张黄二人所批评的这个广告可以说是一石两鸟，同时召唤了这两个人口群。然而，以保护儿童为名的批判却看不见，被美容塑身业所召唤的女人，她们所欲求的身体并不是什么青春的身体，而是情欲与性感的身體。

中老年女人欲求性感身体，被批评者讥为「还童」，其实是无视于中老年女人长久以来被强迫「去性化」的现实——在压抑女性的社会中，中老年女人的社会权力必须来自所谓的「智慧与能力」，而且往往必须为了权力与安全保障而放弃情欲。但是现在有许多女人开始打破「中老年女人不宜性感」的价值观念，正视自己喜欢性感的感觉、有情欲的需要、想突破婚姻内的平淡、借着性感塑身来实现自我等等。她们和那些借着「智慧与能力」来实现自我、改造人生的女人并无不同。

更有甚者，「还童」并不是不可能的。年龄其实和女性主义者所说的性别一样，有生理与社会之分。生理年龄与性别不透过手术与生化手段也许是难以改变的，但是社会年龄与性别则是一种建构：社会为了维持年龄的建构，歧视那些违反年龄规范的人，中老年人若在言行穿着上扮装为青少年就会被讥笑，儿童青少年若从事成人行为（特别在性方面）则会被惩罚。然而，年龄的压抑正如同性别一样，越来越难维持僵化的界限，越来越趋向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的解放。

或问：中老年人为什么一定要以还童来表现性感的身体？这并不完全是广告的洗脑，而是「性感」在目前和「青春」有直接的关连。但是这个关连并不如生物演化论者所言不可改变，当越来越多中老年人以其身体来展现性感时，性感的青春定义就已经在转变中。即使在所谓「还童」的实践中也有很多个人的差异和方式的调整，流行与媒体只是提供了公共的资源而已。

与中老年女人相较，青少年的身体遭受更直接强烈的压迫与规训：家庭与教育制度对儿童青少年身体进行日复一日的「塑身」，国家更以法令来介入这样的身体管理（如宵禁、分级等），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则提供另类的身体管理。青少年的身体就是各种规训权力的战场，青少年则从中争取身体自主的空间。但是为什么今日的青少年会比过去更要求身体与性的自主？这是因为消费文化召唤青少年成为消费主体，个人化的商品也鼓励青少年「做自己」，这大大强化了青少年的自主欲望，而所有唤起青少年消费欲望的信息影像也多半以性感身体的自主为诉求（因为这是最被压抑的），这使得青少年强烈需求身体与性的开放，同时和「做自己」的自主欲求紧密结合起来。

透过塑身减肥美容、表现性感等来「做身体」，其实就是「做自己」的一部份，而「做自己」则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化（individualization）趋势。这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并不来自塑身广告的洗脑，而是现代性的大趋势使然（另文详述），使得人越来越早在自己的生涯史中开始做自己，而越来越早出现的自主性已变成社会生存的一种必要。故而，国中生甚至国小生开始性感身体的自觉也就不足为奇了；风潮所至，连男性也不能再自外于身体性感的开发。

今日青少年在全球化的传播网络内，从新宿或伦敦取得更多做



自己和做身体的欲望与符码，编出一个个和父母与教育制度的规训相冲突的身体，并且透过这个冲突与争战来取得自主。易言之，青少年的身体风潮与性化，是其追求并展现自我的萌芽努力。这些商品化的性感身体信息影像或许是另一种身体规训，但是青少年正在利用消费文化的身体规训来对抗父母师长强加的禁欲身体规训，而在这个争战的缝隙中壮大自己的自主性。故而，面对越来越早性感化的身体，我们必须改变「某个年龄不宜性感」的观念，而强调个体的差异与平等的对待，透过新的、不压抑性感身体的青少年解放论述，来使青少年更有自主能力，使性感身体成为其人生积极与正面的力量。

张黄二人在其文章结尾强调要维护公共领域，尊重多元异见，而非歧视弱势族群、塑造偏差的社会文化。然而追求性感身体的中老年女人与青少年却正是被主流歧视为「偏差」的弱势族群，多元的公共领域就是容不下性多元，保护青少年的媒体批评总是先行封杀青少年爱看的节目。这种老气横秋的媒体批评所形成的舆论霸权（已经迫使广告被撤回、节目被处罚等），正在使我们的媒体丧失公共性。

——原载于2000年12月21日《中国时报》，此为全文版，曾于《南方电子报》转载

# 主流性感标准与片面身体解放

黄宗慧

卡维波先生12月21日的大作〈老化的媒体批评·弱智的女性主义〉一文，反驳先前张锦华、黄浩荣认为十四岁女生不该成为塑身广告女主角的看法，主张女性身体应该被解放而非被压抑。本人同意卡维波所谓不同年龄的女性都应该要敢于正视自己的身体、敢于追求性感这样的说法，但问题是解放女性身体此一大任能否透过一则以十四岁女生为主角的塑身广告达成？则又绝对是另一回事了。

解放女性身体此议题，绝非如卡维波所言，在女性主义弱智化的趋向下遭到打压。《阴道独语》一书的作者Eve Eensler 便发现，在父权文化中，女性身体被认为应该被遮蔽、被避谈，因此非但大多数女性从未仔细看过、了解过阴道这自己身体的私密部位，甚至连阴道一词都不能被直接说出来，而必须以各种婉语取代之，她因此疾呼女性应直视自己的阴道，并大声地说出对阴道的观感；而许多女性主义团体也的确会教女性如何用镜子观看自己的阴道，试图以此作为建立女性对自己身体自觉的起点。诸如此类对身体的正视与解放是值得肯定的，而反观千篇一律以丰胸细腰肥臀的「性感」模特儿为主角的塑身广告，又解放了什么样的身体呢？

当性感的标准被塑身广告单一化为特定的曲线与尺码时，将会有更多的女性不敢正视、不敢解放自己的身体；卡维波虽然表示，性感的定义已经在改变中，而「还童」的实践也可以有很多个人的差

异和方式的调整，问题是在流行与媒体所提的公共讯息中，我们看不到这些个别差异或多元定义，只看到越来越多人簇拥媒体形塑的一套僵化的主流性感标准，在此情况下，不性感的身体该何去何从？塑身广告片面地解放了女性的身体，却压迫了更多女性的身体，使她们以为自己的身体是不正常或不合格的。

如果照卡维波的思考进向，或许会鼓励不满意自己身材、觉得自己身体不够性感的女性就勇敢地选择以塑身来实现自我吧！问题是何以女性应该根据主流性感标准来建立理想自我的形象呢？而屈从这种塑身标准，又究竟是实现理想的自我？还是陷入失去自我却浑然不知的状态？至于卡文中将透过塑身减肥美容来「做身体」等同于具有身体自主意识的「做自己」，其中的争议就更多了！早有西方女性主义者指出，「苗条论述」的可议之处就在于，当它告诉女性，追求苗条是自我管理、自我意志的彰显，具有绝对的正当性之际，它也暗示了不苗条的身体完全是女性不够有意志力、疏懒于管理自我身体的结果，这也使得许多因为遗传、体质甚或疾病等因素而肥胖的人一直被污名化为贪吃、嗜睡、懒惰、不懂自我管理的一群；如今对丰乳肥臀的追求亦然，不符合这套主流标准的女性在父权眼光下被定义为不性感的一群，那么如果她们不去「改造自我」，是否也表示她们没有足够意志力去雕塑自我、不懂得做自己呢？

我们必须重申对身体解放的肯定，而且应该鼓励各个年龄的女性都要能更勇敢地正视自己的身体；非但对自己的身体应该敢于正视、有所认知，且应透过正视他人的身体、与其他身体互动所得的知识，来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与人际互动。事实上，精神分析告诉我们，人类原初建立自我的过程，就是透过镜像期对身体的认知而达成的，身体对主体身分建构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精神分析也告诉我们，镜像期时身体内在发育尚不完整的婴儿把所认知到的镜中

完形（Gestalt）当成理想的自我，是出于一种想像「误识」，也就是说，真正主体的建立，是要透过与繁复的互为主体网络（intersubjective economy）互动才能逐步达成的。如今媒体塑身广告利用父权的主流映镜，提供女性一个标准的完型——除了告诉不再年轻的女性，「返老还童」的完形理当如此，也顺便告诉发育中的国中女生们，十四岁的身材就已经可以如此完美了——但是这面镜子绝对照不出多元的性感标准，也因此无法让女性从对自身身体的认知进一步获取与其他身体互动的知识，它只能让女性以为，只有某一种身体才是美的、才是性感的。解放女性身体此一问题当然应该被重视，但答案绝对不能只在制式的塑身广告中找寻。

——原载于2000年12月22日《中国时报》



# 资本主义机械文明创了新高？

陈建志

十四岁女孩为美容机构拍的「返老还童」广告，引起论者哗然。然而我看到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机器文明在此创下了新高（或新『低』）。

这样的广告可不是首例。1980年，美国以稚龄演出雏妓而名声大噪的布鲁克雪德兹就在电视萤幕上穿着贴身的卡文克莱（Calvin Klein）牛仔裤问观众：「你知道在我和CK牛仔裤之间有什么吗？什么都没有！」当时她也才十五岁，引起许多耸动与议论。而就在两三年前，卡文克莱又在美国各大看板刊登的少年童男裸露上身，腰身极低的牛仔裤海报广告，也因为引起巨大反弹声浪而被撤下。

这两个例子除了都是以稚龄世代展现诱惑，性别在第二个广告中跨越，不再局限于女体。然而，当两性都成为可以被公开窥视的肉体对象，并不带来多大的平等，而是两性都被物化了。借此我要说明的也是，当稚龄少年也被当成一个广告中的有力形象，这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汰旧换新已经到了一个更令人心惊的地步。

如同那两个广告，「返老还童」篇不但要诱惑较广告中人年长的消费者，也要诱惑这个年龄层的少年少女。而这对于少年少女的诱惑，不只在鼓励他们去消费与暴露自己的身体，还更在于使他们将自己的身体类比于各式各样的新产品，新机器，以为从中可以得到某种力量。

由于广告无远弗届的影响渗透，机械器物形成一种巨大的光艳魅力。借由这个机械文明，年轻世代的某些人可以大刺刺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来冲撞较年长者。他们凭着的不是他们的青春肉体，而是惊人的，这整个强调「新」的机械文明的魅力。他们将自己的肉体等同于新的机器、新的手机与新的篮球鞋，并因此认为自己取得了与较年长者抗衡的力量。（「真是LKK不懂电脑不玩手机。有够SPP不穿最流行的行头。」）

换句话说，与其说他们在自己的青春中找到力量，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各式各样的机械与器物之中找到。每一次出现新的机器，就得到一点新的力量，只是这新的力量何其短暂，又马上要被更新一代的机器取代淘汰，必须不断的追逐。机器也像人一样有新的一代，更新的一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四岁童女脱颖而出，以「更新」击败原来的酷哥辣妹。

于是身体变成机器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难怪我们有那么多的好莱坞机械人）。身体不只变成了物，它变成了必须一再汰旧换新的机器。现代的医学观念也会告诉你：「身体就像一部汽车，必须定期身体检查作保养、维修。」而因此，上了年纪的身体就是一部老汽车；而老汽车应该报废！（但人活生生的身体怎能被类比为无生命的汽车？）

于是广告借着更新再更新，年轻世代的竞起追逐，将较年长者与不跟随流行者推向废弃物收容所，现代人——不管哪一个世代——于是都焦虑起来。然则这又何独「返老还童」广告为然，所有的强调最新的机器、最新的时尚广告，不都在造成这种焦虑吗？人们不是害怕自己老去（那原是自然的过程），而是害怕自己被打入废弃物收容所（人为的操控）。

因此，所谓的「返老还童」的「不可能任务」，不是在于人是否可

以回春（老年人确实可以有回春现象，如毕卡索八十多岁高龄生子，心灵也可以常保年轻），而在于人毕竟不是可以一再汰旧换新、用后即弃的机器。因此，当论者在广告上看到了一个被剥削的稚龄女体，我看到的却更是一部会动会笑的新机器，其生命与呼吸必须靠电源才能运转，彷彿机器狗ABO最新的一代、蓝芽、或MP3手机新鲜上市。那是一则人类肉身变成机器的诡异寓言。

——原载于2000年12月23日《中国时报》





# 青春睿智卡维波？

林深靖

塑身美容业龙头大老板黄河南最近密集强打的一则「最佳女主角」广告，引起了若干风波（丰波？）。十四岁小少女王瞳的躯体，在电视里被争睹，在报纸上被争议。

## 「做身体」就是「做自己」？

针对《中国时报》上一篇题为〈还童的女性？弱智的男性？〉的批判文章，文化评论名家卡维波做了文章批判，标题是针锋相对的：〈老化的媒体批评·弱智的女性主义〉（见《南方》电子报，2000年12月22日）。

卡维波指责他的批判对象是「以成人老化的立场来看待青少年的新兴现象」，这种老化的立场，以保护儿童、强调格调高雅低俗为名，形成媒体监督的言论霸权。至于那些控诉剥削女体，复诵物化、偷窥等咒语式修辞来解释性开放的，则是「女性主义思想的弱智化」。

于是，不能不期待于卡维波展示给我们青春的媒体批评以及睿智的女性主义。

卡维波是这样说的：

透过塑身减肥美容、表现性感等来「做身体」，其实就是

「做自己」的一部份，而「做自己」则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化（individualization）趋势。这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并不来自塑身广告的洗脑，而是现代性的大趋势使然，使得人越来越早在自己的生涯史中开始做自己，而越来越早出现的自主性已变成社会生存的一种必要。故而，国中生甚至国小生开始性感身体的自觉也就不足为奇了；风潮所至，连男性也不能再自外于身体性感的开发。

进入塑身减肥美容中心去「做身体」，也就是「做自己」，并从而找到社会生存所必要的「自主性」。这就是卡维波的青春论述？不禁让人想起2000年总统大选甫结束之际，「最佳女主角」主打的一个广告口号：「阿扁实现台湾的梦想，最佳女主角完成女人的愿望」。什么是台湾的梦想？在民进党的经典语言里，无非就是「当家做主」！广告与政治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诉诸「认同」（identity），因此，也都需要塑造「偶像」，以方便消费者或选民的认同有一个具体的投射对象，透过偶像的移情作用，对商品、候选人产生购买或投票的欲望与冲动。

## 台湾土产的日本偶像明星

然而，偶像的塑造永远是一个非常昂贵而复杂的过程。根据《中国时报》的报导，「最佳女主角」老板黄河南准备要花5亿元「打造王瞳」，目标是将王瞳开发成「台湾的深田恭子」。王瞳经过大老板的大手笔投资，报上的说法是：「塑身后的她，腿细、皮白、更有波」。不过，少女王瞳经过最专业、最细腻的「做身体」，目标似乎并不是像卡维波所说的要「做自己」，而是变成一个台湾土产的日本偶像明星。

黄河南可以用金脂银粉堆砌出一个「天真无邪」的美体少女；同样的，航业大亨张荣发也可以花5亿元打造出一个以「清寒贫苦」为形象的政治明星。「人」既然可以是投资的对象，最后当然是以创造利润为目标。张荣发成功地将阿扁送进总统府之后，虽然「当家做主」的台湾选民依然没有在长荣集团里组织工会的权力，张大老板的人马却很快就从国安会、外交部、交通部等重要部会都占到了位置。王瞳才十四岁，开发利润的周期甚长，精打细算的黄大老板已与这个向前走的小女生订下「七年发展计划」，塑身打造完成，很快可以投产营收。

卡维波说，「为什么今日的青少年会比过去更要求身体与性的自主？这是因为消费文化召唤青少年成为消费主体，个人化的商品也鼓励青少年『做自己』，这大大强化了青少年的自主欲望。」青少年追求自主，要「做自己」，是消费文化的召唤？是透过个人化商品的鼓励？在卡维波看来，似乎消费文化就像空气与水一样，大化流行，滋养了青少年的青春活力。然而，为了购买一个布娃娃Kitty猫，一长龙子青少年在麦当劳门口漏夜排队，这是自主的欲望？为了拥有一个「个性化」手机，到24小时便利商店出卖廉价时间和劳力，这是「做自己」？个性化商品一定让人更有「个性」？

卡维波又说，今日的青少年，「在全球化的传播网络内，从新宿或伦敦取得更多做自己和做身体的欲望与符码，编出一个个和父母与教育制度的规训相冲突的身体，并且透过这个冲突与争战来取得自主。」为什么青少年争取「自主」，不是透过个人与生活环境的对话，不是透过生命经验和生存实践形成主体的历史感（*historicité*），而必须透过「全球化的传播网络」，变成放眼新宿的「哈日族」，或是遥望伦敦的「skin-head」？

## 富贵闲人的专利

好了，现在卡维波又告诉我们，青少年跟王瞳一样到塑身减肥美容中心「做身体」，是追求「做自己」的一种表征。卡维波似乎认为，到黄河南的豪华名店，就跟青少年到麦当劳买个汉堡，喝杯可乐一样稀松平常！塑身减肥美容中心也许不完全是富贵闲人的专利，却也不是一般人轻易踏得进去！要是依据卡维波的说法，青少年当中，公子哥儿和富家公主肯定是能「做」更多的身体，因此，也能「做」更多的自己。至于一般靠打工赚零用的小伙子小姑娘，要跟王瞳美眉一样尝上一次「做身体」的机会，恐怕得在7-11站上好几个两周84小时，站坏了身体，站到忘记了自己……

在台湾，的确有活力旺盛的青少年文化，比起青少年文化更厉害的是：讨好青少年的文化。岂不见，每逢节庆大典，从政治人物到学校校长、老师，使尽浑身解数，变身作怪，变性作态。一切一切，只为博得青少年的一句「哇塞！」从中学到大学，「爱宠一族」和「小扁帽兵团」可以是同一票人马！吴宗宪的鸟笼和阿扁的超人装成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深沉记忆。

如今，进步知识分子卡维波在文化评论里扮演了青春歌手，为消费文化和青少年文化请命，为青少年的自主和自由挥笔战斗。然而，在卡维波的青春论述中，他一再强调的「自主」，似乎是「自恋」的同义词，在性解放的主张中，liberty 与 libertine，似乎也很难分得清楚。

有时候，是不是也该告诉青少年，王瞳的美丽，背后有大老板黄河南的算计。可爱的Kitty猫，也许沾有亚洲许多国家童工的血迹。上帝不再创造女人，但是资本家可以。Kitty猫没有嘴巴，因为童工们在血汗工厂里规定不能说话……

## 率「性」与任「性」

关于女性主义方面，卡维波指出：「女人不能直视自己身体，或少女以身体发育为耻，正是过去女性被压抑的状态。近年来的女性情欲解放与身体风潮终于使一部份女人改变了自己与身体的压抑关系，美容塑身事业不过是这个风潮的一部份。」他说，「被美容塑身业所召唤的女人，她们所欲求的身体并不是什么青春的身体，而是情欲与性感的身体。」

## 情欲论述作为一种运动策略

相对于那些被卡维波批评为动辄以物化、偷窥等「复诵咒语式的女性主义修辞」来谈性开放问题的「弱智化」的女性主义思想，卡维波的智慧表现为将有关美容塑身业广告的讨论迅速以「情欲论述」的盔甲武装起来。卡维波及其爱人何春蕤曾经以《豪爽女人》一书冲决禁忌，不仅在影视文化娱乐圈掀起讨论女性情欲的风潮，也让许久不曾亢奋过的知识界因此达到了高潮。

正因为何春蕤一再强调她的情欲论述是运动策略的一部分，认定「情欲自主」等于「性解放」，「情欲革命」也就是「社会革命」，因此对于来自左翼的质疑特别敏感。何春蕤在论战结集的序文中说：「西方妇运在起步时，曾经被阶级化约论的左派所打压，故而妇运应当更能体认化约论的僵化，应当更容易体认性（和性别一样）是一个有自主逻辑运作的领域。可惜的是，有阶级化约论倾向的左派人士至今仍缺乏这些起码的认识……以左派自居的人对豪爽女人的质疑，归根究底就是想要问：情欲解放的物质基础是什么？从何证明情欲解放可以造成更根本的社会生产关系革命？」在结论时，这位卡维波的爱人同志又说：「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情欲批判至少要展现一些历史的眼界，而不是偷懒的用最简化的教条来做无历史眼界的

笼统批判。」

卡维波将以《豪爽女人》为基地的情欲论述突兀地架接到有关一则消费广告的争议，无非是冀望借此取得弱势者抗争的政治正确性，同时，以此为盔甲，防堵来自同属左翼阵营的质问（上述「化约论」或「教条」的指控，既是绊倒左翼的陷阱，也是消解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利器。）

然而，何春蕤的《豪爽女人》尚且作为一种「运动策略」而展开，卡维波对一则文化工业消费广告的护卫，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策略呢？黄河南老板的塑身美容产业，以美少女躯体为卖点的镜头，究竟有什么进步的意义？

## 「追求平等」与「尊重差异」

女权运动的发展，迄今大致可划分为两个主要的面向：「追求平等」与「尊重差异」。「追求平等」意味着将女性从传统秩序中作为「物体」（只在男人的眼中存在，也就是男人的「本质」决定女人的「存在」）的地位解放出来，成为「主体」（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婚姻、工作、信仰、政治倾向……，也就是女性的「存在」足以决定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

「尊重差异」则是意识到「性别」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不突破既定的文化建构，就无从解除父权体制的压迫和宰制。「女人」（feminine）是相对于男人的生物差异，是不变的；「女性」（femininity）则是一种文化建构，是可以调整，可以改变，可以创造的。因此，女性主义的发展，不仅在于追求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更在于建构女性自主的身分认同，凸显女性特质，甚至颠覆既有的人类文化（男性文化！），开发女性观点的历史、哲学，创造女性主体的世界（有别于男人上帝的创世纪！）

黄河南老板透过文化工业强势推销的塑身美容产业，放在当今台湾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脉络中，当然不足为奇。然而，资本家可以如此推「波」，自许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却不宜如此助「婪」。女权运动的发展，从批判以男女性别差异为基础的劳力分工，到检索、剔除女人意识形成过程中父权与男性资本家介入的轨迹，都是一个非常艰辛而漫长的过程。卡维波若是自认为站在弱势者、被压迫者的一方，就不应该轻易将女性主义者「追求平等」与「尊重差异」的努力，轻易遗忘在现代消费文化的颂歌里。

在1968年的解放风潮中，美国女性主义者曾经为一只母绵羊戴上后冠，以嘲讽「美国小姐」的选举。法国女性主义者曾在凯旋门下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旁，隆重地将花束献给「无名英雄的妻子」。2000年，台湾女性主义者何春蕤的爱人同志卡维波将一篇文章献给了塑身美容业者。

选美比赛之所以受到进步女性的批判，正因为其中有太多父权和男性资本家运作的轨迹，女人的躯体在比赛中（在男人眼中）被三围化、被规格化，异化为如同生产线上可以被筛检的商品。依据卡维波的用词，也就是择优去劣，塑造「情欲与性感的身体」。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则在提醒我们，暴力无形，英雄无名，在英雄的背后，埋葬着更多被牺牲又被遗忘的女性。而在当今的台湾社会，文化工业的暴力与暴利，导致「腿细、皮白、更有波」成为男性赞许、女性自我期许的价值观。女性在惹人垂涎或垂怜的欲望中，遗忘了自己。

## 诱惑与欲望的力量

我不否认，诱惑和欲望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早在19世纪末，发展女性观点报导，创造女性新闻王国，争取女权不遗余力的法国女性主义者玛格丽特·杜杭（Marguerite Durand）就说过：「没



有人知道，女性主义该多么感谢我的金发！」然而，我们应该分辨，这种诱惑和欲望，有多少是出于女性的自主与自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性」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分辨率「性」与任「性」的区别。所谓率「性」者，是以自我为主体，率领、导引进入「性」的领域。所谓任「性」者，就是以「性」挂帅，以「性」为主导，随「性」所至，也就是*laissez-faire*，相当于经济学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资本横行，弱肉强食，在此原则下，性暴力、性交易、性压迫、性骚扰、性产业……都可以找到合理化的基础。

卡维波一再强调在塑身减肥美容的风潮下，「做身体」也就是「做自己」；强调女性透过塑身产业塑造「情欲与性感的身体」是「实现自我」的途径。却完全忽略了这种将人的躯体「规格化」的塑身文化，这么庞大的消费需求，究竟有多少是出于女性的自主，有多少是出自父权文化的建构，是男性资本家因追求利润而介入操纵？过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透过裹小脚而创造「情欲与性感的身体」的文化，在北非某些部落，迄今仍有割除女性阴核以创造符合父权标准的躯体的文化。这些可怜的女性，她们同样被要求「做身体」，却何尝做得了自己？

卡维波的情欲论述虽然一再强调青少年与女性的「自主」欲求，大部分的时候，却是把任「性」当作率「性」。任「性」者所发展出来的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自恋与自大，完全剥除了社会关系的脉络。这样的人格最符合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一切以追求利润为中心：利润之所在，也就是道德之所在。

这是我的左翼观点。我等待卡维波「化约论」与「教条」的指控。

# 体型歧视违反多元文化

张锦华

翻开中国时报星期三（2004年10月13日）的第六版，赫然见到一个横式的全版大标题「胖妹游走立院骗上千遍也不厌倦」。其中「胖妹」二字还以不同颜色作很醒目的标示，显然为了吸引读者的好奇，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歧视「体型」、违反多元文化的典型做法。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案件的林姓嫌犯确实可能有近百公斤，称为「胖妹」也合乎事实。不过，问题是，「胖」与这件诈欺案有任何关联吗？新闻内容对整个事件的描述很清楚，大约就是这位林姓嫌犯擅长利用人性贪小便宜弱点，因此以吹嘘自己政商名流关系良好，和可以低价取得便宜家电和名车的谎言，四处行骗。

如果该嫌的犯罪行为并非与其体型有任何关联，该则新闻中也并没有片语只字与此相关，那为什么标题中要把体型特别标示出来呢？无非是以此做为新闻卖点，吸引读者。但是，任何体型的人都有可能犯罪，任何体型的人也都有佼佼者。媒体编辑可能忽略了这种集体性的标签很容易成为主流族群罔顾弱勢族群权益的共犯结构。

同样的，在六年前曾发生过一个网路诈欺案件，报纸标题也是大大的标示出「胖妹」虚拟「俏妞」的文字，记者的特写报导中绘声绘影的描述这位胖胖的高职生嫌犯可能因为「自卑和人缘不好」，所以

虚拟广告模特儿。但是其他媒体采访了该生的导师和同学，结果发现事实是：该校师生不但说她人缘很好，群育92分，而且九二一大地震时，台北市东星大楼倒塌，她还去现场帮忙搬石块呢。显然她的个性中也有着开朗而乐于助人的一面。然而媒体不顾事实，竟以近乎杜撰的方式，无端复制对于较胖女性的负面想像，实为一种符号暴力。

根据相关多项研究，这种符号暴力可能是源自近十年来，瘦身美容公司投入大量的瘦／塑身广告，渲染瘦／塑身的各种好处，相对的也极尽所能的贬抑胖肥身材者，造成女性对于肥胖的恐惧与焦虑。体型较大者不但被指为贪吃、懒惰，甚至于没有自信、不受欢迎。媒体中屡见不鲜的是「胖妹援交」或「恐龙妹」这类污名化的称呼。瘦／塑身业者的利益与媒体有意无意的配合，建构出一种歧视大体型的语言和论述，让许多人拿着放大镜找自己或别人身材的缺点，共同沦为体型歧视论述下的受害者。而在这种歧视下大发利市的，其实并不是媒体，而媒体却赔上了专业，让瘦身工业赚进每年百亿以上的业绩。

我自己曾对从事瘦身行为者做过访谈，受访者常常讲到泫然泪下，她们仅仅因为较大的体型，就遭受各种负面的评价，使自尊受挫，更可能影响生涯发展。日常生活中，不但可能被家人挑剔、被老板嫌弃、店里买不到合身衣服时，还可能被店员嘲讽；连走在路上，都可能有瘦身业者迎面推销产品，造成难堪。在某大学校园中，就曾发生过营养课程同学拦住走道上的同学，推展减肥作法，把同学吓哭或造成强大心理压力等事情发生。坊间也有许多控诉「瘦身迷思」的书，受害者细数较大体型者在这个时代受到的瘦身霸权的控制与煎熬，令人长叹，何苦如此！

其实，每个时代的美丑，根本是一种想像的建构。我们只要回忆

一下，台湾在60和70年代时，浑圆的肥胖身材被赞许为丰腴有福气、而瘦子则被批评为薄命及不利于生产。其实就医学上来看，除了真正有病的过胖或过瘦的身体外，每个人体型样态各有不同，并不妨碍别人，实应互相尊重欣赏，不要侵犯到别人身体的私领域中说三道四。本篇小文章因此建议：请媒体不要再炒作较大体型的女性，以免殃及无辜。同时，体型歧视不但违反新闻专业、罔顾人权，而且也破坏尊重多元文化的社会善意。

——原载于2004年10月17日《中国时报》



## 二、青少年通俗文化的 左翼政治



# 青春睿智的左派？成年痴呆的左派？

## ——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

（青春睿智）卡维波

如何看待今日的商品消费与通俗文化？坊间的某类左派、仿左派、人文主义派、温情脉脉的浪漫派都认为：消费文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广告创造出虚假的需要或欲望；通俗文化乃是文化工业所操纵的产物；通俗文化复制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而青少年则是最容易受骗被洗脑的受害者。这些是本文所要反驳的观点。在所有人的生活与消费实际上都处于商品消费与通俗文化内部的今日，知识份子若还假装处于商品消费与通俗文化外部之某个战略高地，并且在这个不存在的外部摆出全面拒绝、全面扬弃、全面批判商品消费与通俗文化的姿态，那就只是思考与实践的懒惰无能，企图否认消费与通俗文化本身也是战场。如果消费与通俗文化不是等待社会主义革命后自然消亡或光复的领地，相反的，它本身就是战场（亦即，一个不能被「下层建筑」或经济结构所决定或取代的战场），那么左派别无选择地只有从内部抵抗，亦即，这个领域内的抵抗资源与策略必然也是来自商品消费和通俗文化之挪用。这就是考验左派的创造想像力、要求左派搞笑可爱性感（即生产愉悦／认同／欲望）、挑战左派能不能做到青春睿智（而非成年痴呆）的关键了。

这篇文章分成A B两个部份。A部份是把这个争议放在台湾的脉络内，穿插着我对别人论战文章的回应，这算是为进一步讨论扫清障碍；为了增加阅读的乐趣，我还附录了三个小故事专栏来生动化



我的论点。B部份则是比较直接处理本文的主要问题，对「青春睿智卡维波」论战没兴趣的读者也可以直接阅读B这个部份。

应当声明的是：「左派」应该是千奇百怪、各路人马都有的，所以文章中被当作批评标靶的「左派」，只是某类左派，不过为了行文方便就简称「左派」吧。至于近年来仿左派盛行、批判资本主义商品化的文章越来越多的原因不是左派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事实上，只是因为已经没有了要全盘推翻资本主义的共产国家或有实力的左派政治力量，现在在论述上全盘批判资本主义不会被误会是与左派政治挂钩，反而可以安全免费的获得批判姿态。自从社会主义国家崩解，传统左派路线不再被看作是一个有效选项而只是一个有效修辞之后，各种各样的保守派也开始挪用传统左派的假设与修辞来应对全球化下新变动的文化政治，其批判往往不是针对资本主义循常例行的实践或制度，而是变动前沿的新兴或偏差现象。保守派或自由派之所以开始批判资本主义，乃是因为商品化与国家权力已经深入文化与私领域，造成各种权力关系（阶级、性／别、年龄等）再生产的变数或危机，因而威胁到优势支配者与期待向上流动的被支配者的前景。在这种保守派纷纷采用左派修辞的情况下，左派不应该沾沾自喜地认为革命同志越来越多，而是要检讨传统左派论述是否已经无法接合新的社会对立与敌意。

## A 计画「消费的通俗文化政治篇」

### 一、争论的背景

这篇文章一方面回应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维波〉（原载于《左翼》第15号），以及间接回应有关减肥塑身与女性主义的几篇文章和零星的网路议论，另一方面，我也企图回应近年来和台湾公民社会自发的

媒体监管运动密切相关的媒体批判或批评。易言之，我认为当前有一种主流的媒体批评论述已经成为现今台湾几股不同来路的政治与实践立场背后的共通论述，所以不但林深靖所呈现的左派会使用这个批评论述，而且构成目前台湾公民社会主力的几股力量也会使用同一批评论述或批判论述。这几股力量包括主流的**妇女儿童福利与教育团体**、**问政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宗教服务团体**等等。对于这几股力量所整编形成的**台湾公民社会**（我则偏好称之为「市民社会」），在历史演变、社会动力、权力策略方面更进一步的分析，则必须留到笔者未来对全球化下台湾社会排斥与社会变动形势的分析再说。上述这个主流媒体批评的效应之一，就是对于性偏差／年龄偏差／各种新科技偏差的建构。不过，我在本文内只驳斥这个媒体批评论述关于消费／通俗文化／广告／青少年次文化等错误的理论假设，故而本文还不是对此一批评论述所接合的反动退步力量的总清算，只能算是清算的序曲。

当前台湾市民社会所使用的媒体批评论述，几乎无例外地采纳了类似法兰克福学派的菁英立场（虽然该学派立场有其反纳粹的历史社会背景），也充满了传统左派对于文化工业、广告与消费的假设与修辞。最近，张锦华与黄浩荣批评某个电视塑身广告而于《中国时报》发表〈还童的女性？弱智的男性？〉（2000年12月18日）一文，即是这类典型的媒体批评。

针对上文，我写了〈老化的媒体批评·弱智的女性主义〉（《中国时报》，2000年12月21日），从「女性情欲」与「青少年文化」两条主轴来批判前文。之后有数篇文章回应我的文章，其中包括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维波〉。现在我针对一些女性立场的回应继续写了〈「减肥瘦身」的女性主义标准答案错在哪里？〉（见本书141-195页）；本文则是针对青少年文化与晚近主流媒体批评而作。

我觉得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维波〉是颇有某种代表性的批判论述，因此以下我会针对双方论战的部份予以回应，至于比较观念性的问题则留到B部份才处理。

## 二、争论的主轴：消费的文化意义不能被生产（者）所决定

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维波〉讲到塑身事业的老板黄河南花大钱买广告与捧明星，长荣财团的张荣发花大钱支持陈水扁，说他们都是透过广告包装，创造认同，让人们产生欲望去投票与购买商品服务云云。但是这些事实到底证明了什么？林深靖是否假设：只要花大钱，就可以保证效果？广告与购买就是简单因果关系？（这当然都是错误的假设。）他是否认为资本家借着商品所意图生产的意义与认同就是固定不变，而非不断被挪用与转换，甚至可能形成对抗的意义与认同？他究竟如何看待「现代的商品生产与消费也同时是意义的生产与消费，意义的消费则经常具有愉悦与培力的效果」此一事实呢？是否只需持一负面态度就完成了左派的「批判」任务？

林深靖不断强调资本家的财大气粗、资本家生产出来的意义巩固了父权资本主义。他可能以为这些事实就自动证明了消费产品的反动，因为他误以为通俗文化与消费现象都是资本家意图的实现；他以为人们排队买Hello Kitty就证明了资本家的宰制与胜利。这些其实都没有碰到我文章的主要论旨。我关心的是：（例如）排队之前或之后的Hello Kitty人生，Hello Kitty在自我与互动中的角色，如何谈论与挪用Hello Kitty以产生各种反抗与颠覆的意义等等。毕竟，利用Hello Kitty的资本家并没有想到有人会给孩子看Hello Kitty打炮的图片，也无能关心或预料Hello Kitty是否会造成什么权力效应等等。而左派如果只是摆出批判姿态，把所有通俗文化与消费很轻易地归档到「父权资本主义生产与复制」之内，这是一种与现实不相干、没有

实践能力、也没有抵抗着力点的诠释。

事实上，通俗文化、广告与商品所构成的意义，很多时候是暧昧的（例如不会是纯粹异性恋，也会和跨性别或同志调情；不会是一对一，而可能是勾动外遇欲望）。即使其文本的字面意义或现实意义确实是复制主流意识形态的（例如充满年龄歧视），左派或任何批判诠释的任务就正在于进一步挪用转化其意义（例如使之反转为年龄抗争的意义，或者编出其阶级抗争的意义等）。

把现有的意义挪用或编出反抗或颠覆意义的诠释，不但需要诠释者的想像与创造力，也需要诠释者深入通俗文化与消费主体的生活与立足点，因为后面这些主体早就在各自的生活脉络与社会位置内产生出各种具有抵抗意义的零星诠释，群众的智慧及其被压迫的处境可以帮助诠释者编出新的抗争与意义。如果把群众当作盲从的傻瓜，或者只看到生产领域，那么就是放弃文化诠释这个重要战场，也因此会忽视在生产过程以外、彰显于消费文化领域内的许多权力关系与问题。

例如，如果只是贬低排队购买Hello Kitty或减肥瘦身的人群，谴责制作Hello Kitty的童工血汗工厂，或者指出减肥风潮让资方大赚其钱等等，这些都还没有触及与生产领域同样重要的消费文化层面，更不能因此证明所有相关的实践在每个权力关系的面向都是反动的。

传统左派认为真正的战场在生产领域，其他权力问题（如性／年龄／性别／族群等）解决的关键在于阶级权力问题，因此对于各种抵抗形式也都以一个先验现成的「整体／结构」来评估。这种态度自然会轻忽（例如）减肥或追求性感对于青少年、老年在不同生活脉络内所可能产生的诸多文化意义与复杂效应。（对于传统左派所主张的「阶级」与「结构」的双重优先论，我与一些朋友曾以「人民民主」的纲领来批驳，参见<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4/ppdemo/>）。

### 三、做身体

上一节我把双方争论放在纲领的高度上来总结，现在则回到具体的减肥塑身问题。

减肥是一个很普遍的实践，我很怀疑减肥会对不同性别／年龄／身体／性／身分地位有同样的文化意义，或是对个人处境都有相同的影响。我不认为父权资本主义垄断了减肥的意义；我认为减肥的重要面向之一，便是减肥具有晚期现代的「做身体」之意义。

「做身体」是个简化或许有点误导的缩写，意指着Anthony Giddens所讲的「自折回应（包括反思、反射、反应）式地筹划身体」（reflexive project of body），它表现于在各种专家、知识、资讯笼罩下的身体管理，并且在形形色色的身体管理中将身体当作一个开放可塑的筹划，体现着自我、生活风格或认同（同样的，本文中的「做自己」也是采同样的定义）。这种「做身体」现象与动力的出现，和晚期现代的社会趋势相关。从身体管理这个角度来理解普遍的减肥现象，也就是不把减肥视为单一「外力」所完全决定的身体，而是身体本身、现代自我与诸种现代力量所建构的身体。

在这里需要指出，「做身体」是男女老少与各个阶级都存在的晚期现代现象，并不是林深靖在〈青春睿智卡维波〉中所说的是「富贵闲人的专利」。因为身体管理不是特指去参加美容事业的昂贵减肥班；事实上，还包括戴耳环、唱KTV、禁欲、刺青穿洞、避免污染风险的食物、美容、吃药、性、运动、荷尔蒙治疗、体态、打坐、泡汤、做出性感模样、养生、彩绘指甲、抗失眠、拍写真、饮食摄生、束胸或束屙、起舞、入珠、化妆（109辣妹、上学化浓妆）、避孕、作息、增高、装饰、留剪染烫植头发、扮装、变身、蓄胡、除毛、戴帽、戴假发、戴魔术胸罩、纹眉、矫正牙齿、隆乳、割双眼皮、割眼袋等等身体整型不一而足。林深靖以为在7-11长时间打工的

青少年就较少机会「做身体」，恰恰是看不到青少年打工的身体规训与日常生活（校园、家庭）身体管理的关系，也看不见长时间打工的动力与身体的来源、以及他们下班后的人生。林深靖把「做身体」当作「富贵闲人的专利」，也就是忽略「身体」这个战场，彷彿身体的争战不发生在「富贵闲人」以外的身体上。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假设，也因而不可能在今日的身体与文化中发现新的抵抗策略／论述／空间。

#### 四、自主性：形上学还是辩证法？

在另一个地方，林深靖好像也讲了些如何介入青少年次文化与「做身体」的方针。他先引了我的话，然后加以评论，以下就是他所说的话：

卡维波又说，今日的青少年，「在全球化的传播网络内，从新宿或伦敦取得更多做自己和做身体的欲望与符码，编出一个个和父母与教育制度的规训相冲突的身体，并且透过这个冲突与争战来取得自主。」为什么青少年争取「自主」，不是透过个人与生活环境的对话，不是透过生命经验和生存实践形成主体的历史感（*historicité*），而必须透过「全球化的传播网络」，变成放眼新宿的「哈日族」，或是遥望伦敦的「skin-head」？

对此我想做出两点评论：第一，关于「自主」。第二关于「全球化」（留在下一节讲）。

当前主流的（从传统左派的批判论述转化而来的）媒体批评论述，有一个十分策略性的论述技巧，就是把「自主」形上学化以及选

择性地运用在偏差的或新兴的（可能搅扰现存秩序的）群体实践上。这也就是说，她们把「自主」放在类似「自由意志vs.决定论」的形上学架构中，只要是偏差的、新兴的集体现象，就以「社会结构决定」为理论依据，以简单因果关系（例如广告宣传造成虚假欲望）为证据，来说明群体丧失了自主性。有趣的是，在大陆热与Hello Kitty热，兵马俑热与刺青热，高行健热与饭岛爱热等等对比中，总是只有后者群体被视为丧失了自主性。（当然，相反看法也还是存在的：例如，台独认为大陆热是台湾自主性的丧失，中共则认为高行健热是西方炒作，中辍生则认为被强迫去参观兵马俑的在学学生很可怜等等。）此外，当一种群体实践不再新兴（不再形成令人瞩目的热潮），而且不再限于特定人口群时（如青少年），此一群体实践既然已被驯服收编，也就不再被视为偏差，更没有「自主性」的问题。例如，手机热（特别是青少年的手机热）曾被视为炫耀性消费或消费自主性丧失的表现，但是随着手机的普遍，这个问题也就很少人提起。一天观看三、四小时电视曾经被视为电视成瘾，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全民的平均电视最低观看时数，也就没成瘾之说。相反的，现在却有网路成瘾之说。当然，等到全民日夜上网后，网路成瘾之说也就会完成其时代功能了（在过渡期帮助主流镇压可能的权力秩序不稳定因素）。

总之，从买米吃饭、恋爱结婚、打工上班，到买Hello Kitty、手机、上网、阅读资本论、刺青染发，这些无不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限制内、社会文化建构之下的主体的行动。从中区分「自主」与「非自主」行动，此一形上学论述本身便有其「偏差控制」（social control of deviance）的权力效果。

我建议从辩证法而非形上学来谈论自主：我们不必费心地去否认主体作为行动者的能动性；相反的，我们要强化被压迫者的能动（agency），我们要为他们培力（empowering）、让他们得力壮大（empowered），我们要

使他们更自主。这至少意味着（例如）我们要生产更多颠覆现实的反对论述，制造更多的矛盾与对立，因为自主总是在对立矛盾与冲突斗争中产生的。

不把「自主」形上学地看成免于权力或社会建构的自发，而把「自主」当作矛盾冲突的效果，并且从此辩证观点来看青少年次文化，我们便可以发现我之前论断的「睿智」了。我在前文曾说：

今日青少年在全球化的传播网络内，从新宿或伦敦取得更多做自己和做身体的欲望与符码，编出一个个和父母与教育制度的规训相冲突的身体，并且透过这个冲突与争战来取得自主。易言之，青少年的身体风潮与性化，是其追求并展现自我的萌芽努力。这些商品化的性感身体信息影像或许是另一种身体规训，但是青少年正在利用消费文化的身体规训来对抗父母师长强加的禁欲身体规训，而在这个争战的缝隙中壮大自己的自主性。

这就是从辩证法而非形上学的观点来看「自主」。从这个观点来分析青少年自主性，简单的说：今日「消费／通俗文化」与「家庭／官式文化」是有矛盾对立的。由于政治社会化以及许多意识形态复制的要求，家庭／官式文化不得不采取许多和消费／通俗文化迥异的「教育」方式，这个矛盾对立是青少年自主性的重要来源。对比之下，许多所谓的「教育改革」则是在企图减低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企图调和两者（例如采取隔离策略，准许青少年的休闲生活完全让消费／通俗文化支配，但前提是不搅扰校园生活、不准进入校园，另一方面，则希望父母家长对子女次文化宽容让步等等）。但是这种调和在现阶段很难成功，因为中学生就是要在校内染发戴耳环等，父母就是不宽



容子女自由等等。而这些都给予激进年龄政治（the cultural radicalism of age politics）相当大的介入空间。

不客气的说，消费／通俗文化在唤醒青少年自主性方面，比左派做得要多上千百倍。左派只看到青少年一窝风买手机，就断言手机文化的缺乏自主性，却没有深入青少年的手机文化与其所造成的父母师长规训方面的困扰，以及同侪凝聚方面的壮大得力。更重要的，左派只讲青少年流行手机让资本家赚钱，却没看到今日中等学校普遍强制禁止学生带手机上学，很多大学也不准学生上课接听手机等等充满压迫的管教行为。晚近易利信手机有个广告，显示一群中学女生上课以手机来彼此传讯（「不要讲话，要专心——专心用手机聊天」），并且调侃（情）年轻的男老师。这说明了广告商比左派更深入学生生活。这个遭到批评的广告利用了现实不存在的乌托邦狂想（中学生不准带手机上学vs.上课用手机传讯）与性／性别操作，但是这个广告也有唤起学生抗拒不合理规定的权利意识之潜在可能。此处便是激进社运可以而且应该介入的地方：把手机文化更进一步地转化为政治行动，唤起青少年的反抗与权利意识，制造真正的矛盾与官式文化管教上的困难。很清楚的，主流的教改团体是不会站在青少年这一边的，其调和策略必然是准许青少年可以带手机上学，但是上课时必须关机。在这方面，左派应该学习并且支持像「青少年解放阵线」所发起的「教室使用手机权」（可参考其在「国际边缘」上的网页<http://intermargins.net>）。

其实今天激进社运可以介入青少年权力问题之处甚多，因为青少年「做身体」而带来与家庭／官式文化（国家的政治社会化、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学校权威与管教、教育过程中阶级的再生产等）的冲突矛盾甚多，几乎无处不是战场。我们看到激进的性教育、酷儿（同志）青少年、放心药解放、反文化的摇滚乐与电子音乐、援

交妓权等等的抵抗论述——但是左派还在形而上地否认青少年次文化的自主性！左派必须放弃「左派总是每个战场的主导者」的心态，左派必须认识到：不是所有社会位置或社会敌意（对立）都和阶级相关或都能归结到「阶级是主要面」。在很多反对宰制的战场上，左派只能靠边站做啦啦队，并且很多抵抗运动的模式不是像工运的动员组织模式，因此左派必须和其他运动共同平等的合作。

## 五、全球化

林深靖在文章中还问：「为什么青少年争取『自主』，不是透过个人与生活环境的对话，不是透过生命经验和生存实践形成主体的历史感？」很显然他所指涉的这些东西不是消费／通俗文化，可能是一些现在青少年没什么兴趣的左派教材吧。这些左派教材或许是营养丰富的飨宴，可惜现在青少年还没东西餬口（青少年解放运动尚未起步），此一说法就恐怕只是「何不食肉糜」了。

既然消费／通俗文化提供了满地的武器，可能的抗争空间，也是青少年欲望／认同／愉悦的焦点，那么，不从青少年这个生命经验、人生实践、生活环境入手，却妄想跳脱这个现实来灌输青少年什么成人自认政治正确的价值与真理？！就像同志运动必然从同志次文化出发一样，年龄解放运动也必然从青少年现有的次文化出发，承认其内中包含的（源于主体社会位置的）合理性与抗争性，以及可能带给其他运动的不同珍贵资源，另一方面，也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从既有的各种解放运动汲取资源与挪用现有的批判论述，以便接合各类反对运动与论述。

曾听到左派对于右派掌控历史诠释权感到不满。其实，一本传达左派历史教材观点的畅销漫画书，会比右派的学校历史教科书更对青少年有影响力。但是以某些左派脱离青少年现实、放不下身

段、不熟习一般漫画的符码来看，我很怀疑这些左派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讽刺的是，右派能够在「教材」中参透偏差的科幻、性、乌托邦狂想，而左派却还在追寻「纯净的」（不受消费与通俗文化污染的）历史感——这就注定了左派与青少年的隔离。（何春蕤等人制作的《青春 性别快报》漫画书，则是激进性教育的一个初步尝试。）

林深靖还问：为什么青少年争取「自主」，必须透过「全球化的传播网络」？其实，我的意思是指出：全球化对于青少年抵抗在地的权力布局而言，有着正面的意义。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青少年可以到国外（网站）去取得在本地非法的或被禁止的资讯、漫画等。全球化带来新的抵抗机会、资源与空间，为现有霸权创造新的难题；亦即，「在地-全球」的结构下，存在着太多差异与空隙，容许青少年游走与逃避。无论是台湾民族主义或好莱坞电影工业，没有单一的力量可以完全垄断青少年的文化空间。对于全球化效应的进一步分析，则留待我未来其他文章再说。

## 六、任性与马克思

林深靖在〈青春睿智卡维波〉后半部提出的，是和性／别相关的问题。我觉得这部份的讨论比较接近常识俗见，他把激进的性政治描绘为「任性」，还创造出一个「率性」的说法作为对比，深度上不如那些立场上和我们敌对的女性主义言论。归根究底的讲，不管是林深靖或是主流女性主义，这些言论都还缺乏「性政治」（politics of sexuality）的眼界，也就是Gayle Rubin所指出的：性无法被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所完全解释，性无法被化约为性别或阶级，「性」是一个和年龄／性别／阶级／种族……同等程度自主的领域。一个缺乏性政治眼界的论述也就是还停留在「去政治」的层次，无法和酷儿等论述有「批判性的对话」（critical dialogue）。

左派可以自问：如果在谈劳工或阶级问题时，无法把阶级当作一种权力关系或政治关系，而只是大谈劳资和谐、劳工抗争可以「率性」但不要「任性」云云，这种论述可能和马克思主义有「批判性的对话」吗？事实上，现在的左派可以和女性主义有批判性的对话，是因为左派承认性别是一种权力关系，不把性别去政治化，不会讲什么两性尊重与和谐的屁话。同样的，左派如果真的要进入性政治的对话，就必须使用「压迫、剥削、歧视、管制、支配、宰制、阶层、殖民化、平等、权利、自由、正义、抵抗权力、多元、民主、解放」这些现代的政治语言来描述、解释、分析、定义、建构、改变……「性」与性（权力）关系。更需要正视「性压迫」，亦即，因为处于性底层而被分派到比性上层较差的收入、财富、职业、教育、身分地位、官职的机会，以及无法像性上层那样拥有或运用各种自由权利；性下层身为二等公民、缺乏自尊，向上流动必须「顺服」（conform）以及蒙混假扮（passing）；而且在法律、文化、道德、媒体、教育、公共领域、空间环境等方面遭到歧视与不平等待遇等等。

林深靖的「性不应任性」论述，其实在马克思那里也有相似说法。马克思曾经反对因为感情破裂就可以离婚，因为马克思认为父母还要顾及子女和他们的财产，离婚会使家庭离散，故而不应让夫妻两人任意决定。马克思说：「婚姻不能听从已婚者的任性，相反的，已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的本质；谁随便离婚，那他就是肯定任性」。有人或许会联想到马克思在另一处所说的：「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不再结婚」，不过这应该是错误联想，而且稗官野史不是重点。重点是：马克思用「任性」云云来谈离婚，虽然从今日看来并不适当，但是马克思的谈法有其时代因素，还可以理解。不过在性政治不但旗帜鲜明、而且内部路线差异浮现的今日，如果

左派还用「任性」来批评性政治，那就不可理解了。

## 七、为了左派论述言之成理，塑身女人，请你牺牲做个受害者吧！

林深靖之所以用「任性」来批评我，基本上不脱形上学观念的「自主」，亦即，是追求一个免于父权文化建构、免于资本家追求利润所塑造的虚假欲望的自主。可是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这种论述如果不是选择性地运用到塑身或性感上，那么在父权资本主义社会内还有什么自主呢？「自主」似乎必须来自纯粹、未受父权资本主义污染的某个原始状态或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形上学的自主论述最大错误就是对于塑身或性感的全面否定，以为塑身或性感的效果与文化意义是确定的与单一的（即被规格化、被男性物化等），是被父权资本主义的生产者所决定的，而且没有任何介入干预与挪用的可能，因而也不可能为那些塑身与性感的实践者培力，她们因此只是被操纵的玩偶而已。（熟习性政治的人不早就厌烦了这个简化论证吗？）林深靖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而在当今的台湾社会，文化工业的暴力与暴利，导致「腿细、皮白、更有波」成为男性赞许、女性自我期许的价值观。女性在惹人垂涎或垂怜的欲望中，遗忘了自己。

我想很多熟习性政治辩论的女人会对上段话回应说：「别臭美了！」这段话的另种解读就是：男性资本家与批评家都把女性的「惹人垂涎或垂怜的欲望」当作男性的杰作，当作男性加害的后果，以为女人都被洗了脑，才会是要惹「男」人垂涎或垂怜。可惜这只是男性集体的性幻想，不会成真。重点不只是：女人「腿细、皮白、更有

波」可能是在惹其他女人垂涎或惹自己垂怜。重点是：即使女人是惹男人垂涎，也绝非「遗忘了自己」，而是要积极的操纵与「征服（加害）」男人。They are out to get you, man！如果你不信这种培力女人的另类解释有效，那你就等着和她们互动吧！

## 八、性／别政治的「派别」

《左翼》第十五号刊载了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维波？〉，该期的编辑报告说：「十四岁女星王瞳拍摄的塑身广告，曾经在主流媒体引发了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卡维波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之间的论战，现在九二一民报的林深靖……对于卡维波的论述提出批判与反对，过去台湾有关性别议题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在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之间，我们欣见在《左翼》出现另一种观点」。我希望这个编辑报告不是要把教科书里的「激进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社会主义或马克思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拿来台湾套用。这个目前很流行的分类是西方学院的产物，也主要是学院人的关怀，首先做此分类的Alison Jaggar的那本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虽然从学术观点来说，写得很好，但是这种分类并不能反映实际西方妇女运动的不同立场与策略。各个运动组织都有很复杂的政治与驳杂的论述策略，然而，这样的分类后来也多少会对运动有所影响。

我认为台湾的性／别政治更不能直接套用这种西方分类，因此我对于国内女性主义者写的那本套用西方流派分类的教科书有些意见，我认为那只是承袭了国人从派别主义分类做学问的旧方式，读了以后根本没有感受到运动的能量。另一方面，我也能理解：在台湾出现更多基础草根的性别研究之前，不可能写出一本有问题意识与运动眼界（而不是机械式地分门别派）的教科书。问题是，台湾当时

的主流女性政治力量需要那么一本集体创作的「正统」，也就是在功能上能够代表所有女人的一种对外发声，于是该书就在形式上「女人统一」，这本教科书也因为其沿袭西方的分类而有了某种学术正当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该书是从本地实际的生活历程与运动经验来写，恐怕也必然不能涵盖各类女人的差异（女工、少女、公娼、二奶、原住民、变性、老拉子、外籍新娘、大陆妹……），因而也就不能成为代表所有女人的「正统」了。

我在其他地方分析过台湾主流女性主义与西方意义下的激进女性主义之差异，对此《左翼》可能还需要更多分析。《左翼》称我们为「女性主义」，虽然也是正确的，但是我希望这不是因为《左翼》把「性别」和「性」化约为同一问题（这种化约有时是一种异性恋与男性沙文主义的表现）。不论如何，在某些台湾主流女性主义的分类系统中，我们绝对不会被归属于女性主义或性别类，而只是属于「性」类。其实我们自承是「性解放派」或「性激进派」，但是西方的性激进派却常被其反对者冠上「性自由放任派」或「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派」（例如在妓权、生殖科技、色情、性骚扰等论战中），这种扣帽子固然是无法胜之以理之后的下策，但是台湾竟然也有人糊里糊涂地采纳这种标签，例如把妓权派称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或者把我们称为「性解放派」，因为反正「性解放」是个政治不正确的污名）。虽然有人拒绝承认我们和女性主义／性别相关，但是如果我要放胆形容我们在性别或女性主义方面的立场，那么我们倒是愿意接受「性激进派的女性主义」、「跨性别的女性主义」、「酷儿的女性主义」、「激进民主的女性主义」等说法。

台湾左派并不能因为把台湾的现实世界分类为「激进vs.自由」女性主义立场之后，就能够快乐地给自己一顶社会主义或马克思女性主义的帽子，从此安居乐业。从过去到现在，我一直看到左派只是

在性／别「外部」喊话，用的都是全面否定论述，这样并不能真的给自己一个位置（当然还有等而下之的左派想去依附主流女性主义，想要劳工脱离边缘位置而进入公民社会）。左派如果觉得现在台湾性别政治各派都没有「左味」，那只有亲自下来干一途，进入性别政治的内部。至于比「性别」污名而且更少正当性的「性」，我猜左派可能更没兴趣了。

此外，性政治的派别当然不同于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的那些分类，易言之，「性」的分门别派不会刚好吻合「性别」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之分；而且就我所知，目前全球学术界都还没有把性政治立场派别做完整分类（可能在同志政治内有所谓「同化派」与「酷儿派」之分），因为这是个庞大的学术工程，涉及了历史与全球两个范围（我在〈性政治：性运的由来及其派别〉一文中曾尝试做过性政治派别的初步分类）（注1）；故而，如果左派想要把台湾「性」的政治论述分门别派的话，还需要深入比较研究台湾各种性论述，分析不同性政治立场的对立社会位置，才能弄出一个左派的性政治立场。在左派研究阶级都感到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还是外部喊话比较低成本。

## 九、人是机器

顺便一提的是，在这次论争中还有一篇陈建志的〈资本主义机械文明创了新高？〉（《中国时报》，2000年12月23日），此文批判资本主义物化男女两性，也使用了左派的语言修辞。陈文的一个重点是说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机器，但是这不是左派观点的说法，而只是人文主义或温情脉脉的浪漫派而已。资本主义把人变成机器的观点，是无新意的，人文主义者佛洛姆就曾说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人贬低到成为机器的附件，被它的节奏与需求所统治。它把人变成



消费机器，变成彻底的消费者」。不过，此处具有反科技意涵的人文主义观点之所以是相当陈腐而非批判的，除了之前它就被「科学」社会主义传统的左派所批评外，在近年来还被受到后现代影响的左派所批判；后者认为人文主义与浪漫观点，无法积极介入科技所造就的现实，也继续预设机器与人（有机体）的二分，更有甚者，人文主义者一如市民（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把「人」与「人性」自然化、永恒化，以「异化」之说把人（性）安置在前资本主义的伊甸园中，或者想像在未来的乌托邦中克服异化回归自然的人性，或创造出更完美的人性。以下让我们来看看陈建志的说法。

陈建志说：「年轻世代的某些人……将自己的肉体等同于新的机器、新的手机与新的篮球鞋，并因此认为自己取得了与较年长者抗衡的力量。……换句话说，与其说他们在自己的青春中找到力量，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各式各样的机械与器物之中找到。……于是身体变成机器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因此，当论者在广告上看到了一个被剥削的稚龄女体，我看到的却更是一部会动会笑的新机器，其生命与呼吸必须靠电源才能运转，仿佛机器狗A B O最新的一代、蓝芽、或MP3手机新鲜上市。那是一则人类肉身变成机器的诡异寓言。」

陈建志虽然看到了青少年对于机器的认同，会帮助青少年培力，具有世代斗争的意义，但是对于肉身变成机器（将自己想像或变成为机器，而且从机器中得到力量）的现象却似乎不以为然。不过这种现象只对浪漫派才构成感伤或批判的题材，对于另类世界观的人而言，则完全是理所当然与欢欣鼓舞的事。例如，早期唯物主义者早就对人没有了任何怀旧乡愁，一心要离开上帝所创造的伊甸园，他们因此喊出了「人是机器」。近年来，也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将「机器战警robocop」这种cyborg（译为：赛伯、赛柏格、复合人、半生

物体机器人、半机器人、动物人机器、有机机器人、机器改造人、生化电子人等等）当作新社运主体的隐喻。至于人类肉体与机器的复合化在未来似乎是会必然实现的，毕竟，现在已经在发生中，我看不出来为何这是应该被批判的趋势，而且cyborg可以连结起十分批判的政治意义。

Donna Haraway在“A Cyborg Manifesto”有一段话说得很好，足以和陈建志所说作为对比。Haraway说：「为什么我们身体的末端应当是皮肤、或者最好是包着皮肤的东西？从十七世纪以降，机器总要被活化……或者有机体要被机器化……。然而这些有机体／机器的关系是过时的、不必要的。对今日的我们而言，在想像与其他实践中，机器可以是义肢的装置，亲密的部位成份，友善的自我。……奇器奇技淫巧、玩物取乐不再是罪过，因为精通机器的技巧乃是我们身体（存在）的一个面向。机器不是一个需要被活化、崇拜或支配的物，机器就是我们、我们身体的过程，我们具体存在的一个面向。我们可以为机器负责，机器并不宰制或威胁我们」。

Haraway看到cyborg可能具有的意义，能在多方面地踰越各种二元对立的界限（男女两性的、人与机器的、有机体与机器的等等），而且cyborg不是从一个完美状态统一体的分化而出的，所以没有乡愁（因此不要「人性的复归」），也不是要追寻某个革命后的理想，所以没有历史进化的最终目标（因此不要达到完满「人性」的实现）。Cyborg是复合的杂种，充分适应一个充满怪物（而非「人」或「人性」）的世界。我认为社会运动应该朝着Haraway所建议的方向去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可以走出目前许多对科技社会的理论认识与现实实践的困境。

## 十、谁恶黄河南？

不少人（包括林深靖在内）回应我文章时，都把我写成是替王瞳（十四岁模特儿）那个特定的广告辩护、或者替广告主黄河南辩护。大概是黄河南令很多人讨厌吧，而我的文章竟然为一个令人讨厌的资本家辩护（不喜欢王瞳的人似乎也不少），故而这样的写法就有唤起读者认同来抗拒我文章的情绪效果。这种写作策略其实也是广告文案的一种写法。

讨厌黄河南，可能是人们觉得他相貌猥亵，但是却左拥右抱，大赚女人钱，现在又搞小美眉。无疑的，这些「讨厌」都是「情绪」在后面作祟，但是仔细去分析这些情绪，又怪伤感情的，因为这些「情绪」好像有点政治不正确（如果黄河南是爱情忠贞、不花心、老实诚恳、风度翩翩、斯文有气质的年轻极帅弟弟，那就不讨厌了？）

林深靖说：黄河南花钱捧王瞳不是要王瞳「做自己」，而是要捧王瞳做偶像明星。这种观察跟我的文章的论点毫不相干。我要谈的是：（1）台湾社会很普遍的减肥实践之社会意义——做身体、「做自己」、做性感；（2）反驳一些「媒体批评」对于电视上偏差影像的看法。故而我关心的是那些对青少年做身体与「做自己」有影响的消费文化与广告或媒体影像（不限于王瞳广告，也不在乎生产这些影像之目的）。其实批评者都没有回应我讲的这两个主要问题。（我所谓的「做自己」是个简化或许有点误导的缩写，意指着Anthony Giddens所讲的「自折回应（包括反思、反射、反应）式地筹划自我」（*reflexive project of self*），它表现于在各种专家、知识、资讯笼罩下的自我管理，并且在形形色色的自我管理中将自我当作一个开放可塑的筹划，体现着自我认同、生活风格或认同）。

我虽然和黄河南划清了界线，我的文章和他不相干，但是这不代表我和女性主义者一样特别讨厌他；我要这么说：黄河南对我而

言，和比尔盖兹、张忠谋、王永庆、海夫纳……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差别，都是资本家或企业家。若对他「特别」感冒，那心里真是有鬼。

## 十一、左派与年龄政治

最后让我回到青少年问题来。左派如果要有效地介入年龄解放，首先在认识论上，就应该承认年龄是和性／种族／性别／阶级／身体等一样的位阶，各有内在的组织原则与操作逻辑。年龄不是阶级关系的产物，因此不能把所有年龄现象与实践都现成地区分为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阶级无法穷尽年龄现象，两者没有一对一关系——就像有的阶级现象是不分年龄的，而很多年龄现象则是非阶级的。总而言之，既有的阶级论述与知识是无法穷尽说明年龄领域的；简单的说，《资本论》不够力处理青少年问题。今日某些左派的悲哀则是：年龄解放的激进派或许熟读《资本论》，但是左派却不熟习年龄政治与文化。别人知左知己，左派却只知此不知彼，那么左派还能进入年龄政治内部吗？还是只能在外部的搞全盘大拒绝？

林深靖〈青春睿智卡维波〉一文在看待青少年次文化问题上，不加批判地就接受了西方殖民与资产阶级主流社会的青少年建构（源自西方殖民与西方资产阶级），缺乏年龄政治的眼界：例如在这篇文章中，「青春／青少年」就不像「左派／劳工」那么具有正面含意，甚至隐含了某种贬意。以下在本文的B部份，我将先追溯左派与青少年的关系的社会历史发展脉络。

## A 计画附录：

### 来自无处的几个小故事——爱如潮水／可以上我／Che

#### \* 爱如潮水 \*

我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紧紧跟随  
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  
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  
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  
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李宗盛作词的《爱如潮水》看似有很确定的文本与社会意义：这是传统异性恋男人在面对女性情欲高涨的社会脉络下的一种反应。这首歌所反衬出来的女主角喜欢深夜买醉、徘徊与放纵，不被单一男人所掌控；然而男主角在歌词中先说「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但是接着却又以「会让我心碎」来柔性阻止女主角的情欲生活方式。这首歌侧面地描绘出异性恋男人无法掌控女人情欲的现实，但是又企图以男性珍贵的汹涌爱情「紧紧跟随」与「包围」女人，呼唤女人自愿放弃自由，让男性「包围」与「跟随」。这样一来，男性就可以夺回原本的独占掌控权了。

上面这个解读，既有社会现实的印证，也有文本证据的支持；

看来这首歌乃是资本主义父权制下文化工业为异性恋男人服务、对女性洗脑的文化产品。这条歌越流行大卖，就显示异性恋父权压迫女性情欲也就越深入人心。

这首歌确实在台湾十分流行，可惜流行的现实与上述这个解读完全不相干。此歌成了「同志国歌」，广受台湾同志的喜爱。这个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现象很显然是消费者对于这首歌的二度创作，对这首歌意义的重新生产。这个新的意义所产生的流行，离开了原本创作者意图扣连的社会脉络。而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 \*可以上我\*

我小时候常常搞不清楚安全别针、大头针、回纹针的区别。最近读了《利器》（时报出版社）一书才对这些「利器」各自复杂的源起与演进过程稍稍有所了解（虽然此书写的也不够清楚深入）。例如「早在二千五百年前，罗马人就发明了安全别针」，1849年Walter Hunt申请专利的设计在原针上加上弹簧作用，这就和今日的安全别针相同了。安全别针或大头针现在都是很便宜的，但是根据此书，大头针曾经是很昂贵的，但是后来却极为便宜。回纹针也是非常便宜的，甚至因为其便宜而被「滥用」：某个回纹针制造商在1958年调查，「每十个回纹针就有三个不知去向，而十个当中只有一个用来夹定纸张，其他的用途包括当牙签、指甲夹、耳挖勺、领带夹、玩纸牌的筹码、儿戏的计分工具、别针的替代品、还可以充当武器」。我相信它还有「无尽的功能」，例如，以发明回纹针自豪的挪威人在「二次大战时，许多挪威人甘冒被捕之虞，将回纹针别在衣服领口，抗议德军的武力入侵」。奇妙的是安全别针在当代次文化也有过类似的用法，不仅出现在庞克次文化中，也出现在同性恋次文化中。

在爱滋危机中，西方同志次文化有所谓「更安全的性」(safer sex)

的提法，这乃是针对主流的「安全的性」所夹带的道德禁欲意含的批判提法。「更安全的性」强调任何性（包括禁欲在内）都涉及风险，性必然是一种风险管理。性激进派更进一步把「更安全的性」色情化，让更安全的性也是最色的性。总之，在这个时期，许多西方同志在衣服上别上安全别针，表示自己响应「（更）安全的性」的呼吁，这是同志次文化对安全别针这个小商品的挪用。不过，以安全别针标示自身实践「更安全的性」，就好像另一些同志用手帕来表示自己搞安全的性一样，可以被建构为某种主流印象，亦即，某些性是安全的，其他的性是不安全的；故而某些人是高级的，其他人（滥交或性工作）是污秽的。这种建构则是再次挪用之前对安全别针的挪用。

这故事还没有完：由于安全别针有借着表明自己的性方式（我是戴保险套做爱的人）来筛选性伴侣的功能（如果你也同意戴保险套，那你可以找我）——虽然这个功能会产生某些主流人士排他的效果——这个安全别针的筛选功能却也立刻被滥交者再度挪用：我戴安全别针就表示「我正在寻找（安全）的性或性伴侣」，亦即，「你可以上我」的意思，这是安全别针的色情化。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安全别针—更安全的性」的不断被挪用，意义的一再转换，这些意义差异极为细微，但是却又是各种政治立场的交锋。次文化所挪用的商品可能会是昂贵的，但是也可以是像安全别针这样的便宜的小东西。

### \* Che \*

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一剧轰动大陆，被张广天批判的新左派、自由主义，以及其他门派的讨论也很多。其实自从Che死后，全球各地就有一波波此起彼落、以各种方式进行的不断「纪念」，有些是以Che来批判中南美洲独裁政权与中情局的，有些是暗

批卡斯楚的……。真是有多少不同政治立场，就有多少对于Che的不同挪用。连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也会偶而推出Che相关的文化产品，毕竟Che具有很吸引人的英雄浪漫反叛形象。（《新新闻》729期，2001年2月22日-28日，报导民进党政策会现场也悬挂着某党工从纽约带回来的Che海报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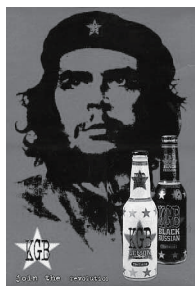
现在我要讲的不是什么文化商品，而是一个啤酒广告海报。这个啤酒广告海报以熟悉的Che画像为主，Che的帽子上的五星标志有着啤酒品牌KGB字样，画像右下方则有两种KGB的啤酒，左下角则写着「join the revolution」（加入革命）。

如何理解这个广告海报呢？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是：资本主义把Che商品化，挪用Che的形象为啤酒消费者的认同，等等。总之，这个广告海报很聪明、很厉害，消费者则是任人宰割的。

我一向很喜欢Che的画像，也有收集马、恩、列宁、史大林、机器战警等左派人物画像为办公室装饰的嗜好。KGB的Che广告画像真的

很酷，比没有啤酒的正统Che画像还要有趣。事实上这张广告画像越看越有味道，于是趁着黑夜尖沙咀街道四下无人，我悄悄上前小心地取下贴在墙上的广告海报，一张完好无缺地海报现在就挂在我的办公室内了。

至于台湾何处有卖KGB啤酒或伏特加，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喝酒。





## B 计画 「文化研究篇」

**作者按：**「B 计画」的内容基本上独立于「A 计画」部份。B 部份可以说是一篇当代「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简单入门。文化研究这门批判性的学问本身便和现实运动的论述连结，本文则试图显示文化研究的批判蕴涵与应用，也介绍了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观念与假设，使不熟习文化研究的学生能够从一个运动批判的角度来初步地认识「文化研究」这门学问。

本文的「A 计画」部份（原载于《左翼》第16号）回应前一期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维波〉。林文对青少年消费文化持负面看法，其标题也隐含着对「青春」的贬抑，形成「青春睿智卡维波」的反讽意含。我则认为消费／通俗文化的意义不是固定而是时常协商斗争的，因此也经常被青少年所挪用并形成零星的反抗，正如同「青春睿智卡维波」的反讽也可能在论述实践中被挪用反转。为了继续说明「卡维波，果然青春睿智」，我将在本文中比较细部地从青少年解放的立场来阐述青少年通俗文化与消费，以显示晚近台湾主流媒体批评的一些错误假设。我的诸个论点可能有些分散，但是主轴乃是针对一些流传于空脑知识份子间、已经人人琅琅上口的八股论调，他们以为只要口念「商品化、物化、消费主义、结构限制……」等等「大殇咒」就自以为是「批判」了，这篇文章则显示这种论调有滑向成年痴呆的危险。

## 一、左派革命是一首青春之歌：认同青年与颂扬青年的左派时期

冯客（Frank Dikötter）曾指出，「青年」在晚清的时候还只是指着约16岁到30岁有钱人家的男性，但是在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不但包括了女性，也包括了工业部门里的年轻劳工；更重要的，「青年」变成了重生、活力、与现代性的有力象征，代表了理性、进步与科学。在这个时期，「青少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毕竟，就连西方中产阶级的童年／儿童观念也是在此时才开始传播到中国。

早期现代时期的左派，不论是共产党或者其他社会主义流派，都十分偏好与重视「青年」。中国的左派也不例外。从陈独秀到许多左派文人的论述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召唤青年与建构自身为青年化身上，都比其他政治力量成功；中国共产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动力也因此被隐喻为「青春之歌」（小说电影名）。

在这个时期，「青年」，作为一个被发明的社会范畴，正是民族国家的希望与革新力量。今昔对比，现在「青年」这个词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这样的含意。实际上，「青年」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范畴也已经不存在了。

青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青少年」。然而，在这个社会历史过程中，左派也开始随着西方殖民与资产阶级主流社会的年龄建构起舞，其对年龄政治的认识也从「青年是社会希望」转变为「青少年是社会问题」。

## 二、青年的衰亡与青少年的兴起：迈向青少年解放

与青少年对比的是「成年人」，这是个崭新的说法。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的对比并不是成年人，事实上，过去「青年」与「童年」的界限还很模糊，「童年」与其知识／权力在当时

才刚刚诞生（有关儿童的各种论述与科学、与儿童相关的制度机构——如西方儿科医学与国民教育等——才刚刚萌芽）。后来「青少年vs.成年人」这个新说法则很明显是年龄的社会建构，特别是在儿童或童年的社会建构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更形深入后才出现的现象。

不过，过去「青年」虽然连结了正面评价（民族国家的希望），却也同时包含了青年的「问题」。例如民初反手淫运动的学者说：「要预知民族的兴衰……要估计国家的未来，只需检查我们青年的床单」（即，有无留下手淫精液的痕迹）。晚近被发明出来的「青少年」并没有承继太多「青年」的正面评价，但是却接收了所有「青年」的「问题」，并且还建构出更多的「青少年」问题。

建构青少年的最重要历史机构乃是中学（注2）。也只有当中学成为普及全民的教育制度时，青少年才成为一个无分阶级的全社会范畴。青少年在这个社会建构下被「生物化」，其所遭到的歧视与压迫往往诉诸「自然」或「天生」的生物理由，一如过去妇女被歧视与压迫也是诉诸生物理由一样。

在歧视方面，阶级／性别／种族等等歧视上常见的操作方式也同样的出现在年龄歧视上。首先，青少年作为年龄下层，本身就被连结到负面价值，故而必须被监督、导正或规训（年龄阶层不但是年龄分类，而且还对应着高下的价值判断）。其次，在不同年龄阶层的比较上，歧视的运作乃是以平均值来忽略个别差异，或者以偏概全。这些歧视也常常得到社会科学、医学、性学、新闻报导的「证实」，各种研究结果则更形深化对青少年的认识／歧视，也进一步构成了法律上对青少年的认定和规训。

在压迫方面，青少年没有公民所拥有的各种自由权利（如财产权、参政权、秘密通讯权、自由移动权等），甚至连二等公民都谈不上。在现实生活中，台北市以外的青少年有许多每天生活在校园暴

力（体罚等）之下，身体遭受成年人殴打鞭挞，被暴力强迫接受主流的意识形态与规训监视，至于殴打形式以外的身体惩罚与口头的威胁暴力则更为普遍。现代几乎没有其他被压迫者每日都承受这样的制度性暴力统治。青少年在家庭中遭受亲权的统治，在公共空间（如街上或网咖）则被所有成人所监视，也被警察等公安机构所骚扰。青少年在经济上被剥削，缺乏自尊，无法和成人享有同等的人生机会选择。这些都是青少年被压迫的事实。

虽然青少年、原住民、性多元、劳工、妇女、特能（残障）都是被歧视与压迫的身分，而且其歧视与压迫都有共同点（如分配的正义），不过在其身分建构与认同发展等机制上却互有差异，在抵抗压迫歧视的资源与条件方面也很不相同，故而也不可能有简单相同的单一反抗策略。例如劳工基本上没有现身出匭的污名，但是性多元（同双性恋、性工作、跨性别、爱滋病患、愉虐恋者等）就有现身出匭的困难；以劳工或妇女所具有的抗争条件或动员组织方式想当然地来要求性多元或青少年，就是一种「胡不食肉糜」的观点。

年龄是导致不平等的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的一个面向（Bradley），阶级、性/别、族群等压迫权力也常常从年龄压迫来施展，故而批判论述必须从年龄政治的角度来看待青少年。以下我将从青少年解放的立场来讨论青少年通俗文化与消费。

### 三、互相冲突的主流建制

随着富裕社会与消费文化的兴起，青少年的社会建构有了新的制度力量与变数。除了原有的学校、法律、社会科学、医学、性学、新闻报导、摄影影象之外，还多了商品消费以及大众传媒和通俗文化。

不过，这些制度与机构（各自有多重目的与复杂源起）所建构的

青少年并不是一致融贯的，其所采用的「知识／权力技术（规训）」也充满异质性，只能借着文化中的青少年主流论述来维持（缝合）不稳定的大致统一。「消费／通俗文化」与「学校（官方）／家庭」这两组主流建制，在目前社会形构中有着无法协调的冲突矛盾。（例如1925年中国的教育部就颁布「整顿风化令」以取缔女学生游逛娱乐场，要求学校通知违令的女学生家长等等。类似的禁令至今仍以不同形式存在，可见官式文化在这方面的坚持性。）这个可以简称为「官式文化vs. 通俗文化」的冲突矛盾，也给予青少年机会在同样的场域内进行多样的「反建构」操作。青少年次文化对现状的顺从与抵抗、被体制剥削或对体制反叛、对主流文化的迎与拒，都必须在这些互相冲突的主流建制脉络内观察。

#### 四、文化研究的取向

有关消费与通俗文化、青少年次文化的讨论，文化研究（特别是新葛兰西传统）很早就驳斥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菁英观点，但是晚近台湾主流的媒体批评却完全略过当代文化研究，甚至简单套用「资本主义（父权结构）物化／商品化／媒体洗脑／广告催眠……」这些大掰咒来批判一些搅扰或改变现状的新现象。从他们的立论来看，他们并不是像Jim McGuigan、Todd Gitlin等等这类在文化研究领域之内提出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事实上，台湾这些主流媒体批评似乎只是简单地捡拾了几个口号挥舞，完全没有跟上文化研究这一、二十年的发展（注3）。

不论如何，为了丰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将简单地重述过去文化研究少数几个和本文相关的观点（我所挑选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会遗漏文化研究中其他很多重要的主题），但是我希望这将有助于我们摆脱那些简化教条的说法，重新看待像减肥美容的媒体风潮、凯蒂

猫、偶像追逐等等通俗文化与消费现象，并且使得这个辩论在未来能够在新的地平线上继续。

## 五、文化消费的矛盾与反抗（激化扩大／掩盖压抑）：Bell vs.左派

英国文化研究的缘起其实就是对经济化约论（也就是马克思的经济下层决定文化上层）的批判。从化约论来看，任何商品消费或通俗文化大概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继续统治，而左派的文化批评活动就是把某些消费与通俗文化现象，解读／诠释为宰制阶级阴谋操纵技术的又一次胜利施展。于是只要(1)某个商品消费帮助了资本家赚钱，(2)通俗文化的某些元素在复制既定价值观念或权力关系，(3)某个对象新近被纳入市场关系，(4)某个领域被更进一步商品化或甚至「麦当劳化」了……，这些就都立刻构成了资本主义宰制成功的证据，而从来不会被视为是新社会矛盾的可能出现，或危机的可能扩大，或抗争的可能机会等等。

不过，与其说左派化约论的文化诠释不重视经济领域以外的斗争，倒不如说它意图否定性别、性、年龄、族群、身分团体等主体的文化与日常实践的进步性与有效性。换句话说，化约论的左派几乎举不出任何一件其他主体所做的消费或通俗文化实践是可能有正面意义的（此处的「正面」乃是相对于左派的政治价值而言）。

事实上，从现代主义文艺到后现代的享乐主义，许多左派都认为它们是有利于体制的。不过这也不稀奇，不只左派，连右派——例如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Daniel Bell——也反对享乐主义，后者并且认为后现代的享乐文化根源来自现代主义文艺的进一步商品化。不过，Bell和左派们（典型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库色）反对享乐主义的共通点只是表面的。因为左派还只是简单地认为享乐文化有

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维系，而Bell却辩证地看出享乐文化造成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Bell说：「现代主义文艺是否如马库色（Herbert Marcuse）所说已被收编了呢？在单个层面来说，是的，因为现代主义被转化为促销与利润的商品。但是在更深刻转变的结构中，这个现代主义转化为商品的过程只会更损害到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相较之下，马库色的观点因而（颇为反讽地）只是「单面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文化内部存在着矛盾，而不是简单地再生产（复制）资本主义下层经济结构而已（注4）。有关Bell的论点，我将放在注脚内进一步说明（注5）。

在此我不是声称Bell的论点完全正确。我想强调的重点也不只是：「资本主义文化没有内部矛盾」的想法恐怕不够辩证；更重要的是，我要强调：文化领域内的诸多矛盾不是万流归宗地都来自——或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基本矛盾，后者并不解决或决定所有的矛盾。我们应该承认各类矛盾的存在与意义，而不是否认（掩盖）矛盾与隐含在其中的抵抗。我们还应该借由激进论述来扩大矛盾与制造新的矛盾，否则终究也只是在掩盖与压抑矛盾而已（注6）。某些左派总是把众多矛盾化约为一种「基本」矛盾，或者只谈各类矛盾对现实的顺从性——而非抗争性，这些都是在掩盖与压抑矛盾。换句话说，如果左派在分析通俗文化与消费实践时，只强调这些实践配合了并复制了资本主义的层面，而不注重与扩大这些实践与现实之间矛盾和反抗的层面，而只是喃喃絮叨「受结构限制而有其局限性」（哪一种实践没有局限性？），也不思考如何非经济化约地突破其局限性，那么左派依然是在掩盖与压抑社会矛盾。

在今天，青少年的消费与文化实践经常直接与家庭、教育建制和官式文化相冲突与矛盾；有效地扩大与激化这些矛盾，以促进青少年对自身处境的反思与能动，才是左派积极的作为。很明显的，

想要「有效地」激化与扩大矛盾，而不是「胡不食肉糜」式的场外指导，就必然要串连青少年的通俗文化，而非空降左派的空灵论述。在本文的十一节开始，我将阐明消费与通俗文化为何能产生矛盾与反抗，以下我先说明「消费欲望（第六、七节）、购买行为（第八、九节）、次文化（第十节）」的真实基础或物质存在。

## 六、洗脑与真假需要——马克思vs.全球化

不论左派或女性主义者在讨论塑身广告时，总是假设广告与购买商品之间是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彷彿媒体或广告的影子无须中介就有效果：消费者被广告所操纵与影响，创造出「虚假的需要」，而消费则灌输顺服的观念、压抑政治的抗争。这种贬低消费者的看法，也有贬低女人、青少年、教育程度低者的含意，因为正是这些消费者往往被认为是容易受骗与不理性的主体。

在这种批判中最容易被贬低的消费通常是：被认为缺乏社会价值的消费，有可能搅扰现状或接近偏差的消费，会改变原有身分地位或阶层高下阶序之消费，可能使旧有人际关系与人伦产生变化的消费，或者关连到通俗文化的新风潮消费。相较而言，如果是高等文化的消费或家庭消费，就很少会被贬低（尽管这类消费才是维持社会建制的重要基础）。以此看来，贬低消费论述，其本身也是不同主体之间斗争的修辞策略。

最常见的一种贬低论述就是说消费者被广告「洗脑」了。这个词原本来自右派的反共宣传，目的是贬低那些拥护共产党的人民缺乏自主能动，故所以说亲共者是被共产党「洗脑」。

和广告洗脑论述密切相关的则是「真实需要／虚假欲望」的区分。然而在今天，其实这是一个无法成立的假区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



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

我认为马克思这段话说明了：首先，需要或欲望（及其满足方式）本身就是历史的、相对的，不同国家有不同水平的需要欲望。其次，无论真假欲望，都是透过文化来建构与诠释的，它们无法独立于文化。换句话说，没有什么真实需要是「自然」决定的。（试问：大鱼大肉、有机蔬菜、旅游、彩色电视机、性爱合一、手机……是真实或虚假的欲望？）

不过，马克思的讲法也必须放在今日全球化的脉络里来进一步修正；虽然马克思时代已经有了全球化现象，但是当时民族国家内劳工生活对外的区隔性以及对内的同质性，都十分显着，而这些恰恰是今日全球化现象正在逐渐改变的对象。马克思那段话的脉络，主要是在谈各国在工资水平的高低方面会有文化的差异，有些国家可能需要较高的生活水准，故而马克思的讲法或许有可能被延伸为：外劳在台湾领取较低的工资或许是合理的。但是我不认为左派应该接受这样的主张。更有甚者，如果外劳被台湾消费文化影响因而改变生活方式与欲望，并且想要更多的工资，这是虚假欲望吗？或者，如果台湾本地工人受到媒体上西方工人形象的影响，而想要更高的生活水准，这也是应当被批判的吗？

在上面的引文中，马克思也强调「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此一因素。由于社会变迁的加速度，同一民族国家内的不同世代在成长与进入劳动市场时的文化差

异很大，成长于富裕社会与消费主义的世代，或者成长于经济萧条与景气衰退期的世代，其需要欲望当然会和其他世代不同，同时，由于世代更替的周期不断缩短，故而同一民族国家内并没有马克思所设想的一个统一的「文化水平」，而是有世代差异的。如果新世代具有高于过去生活水准的欲望需要，或者相反的，如果旧世代的生活水准的欲望需要高于新世代，那么这些欲望需要是否必须被否定？为什么必须被否定？既然这些欲望需要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还能称之为「虚假」吗？

不过，即使修正过的马克思说法，也不足以处理「真实欲望 vs. 虚假需要」的问题，因为还有许多欲望需要无法纳入经济范畴内被解释。例如性的欲望需要，以及身体管理相关的欲望需要等等，这都需要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以外的理论资源来分析。任何想要把（例如）某种特定SM或人兽恋商品的性欲望需要，从阶级、经济、民族文化、父权、国家机器等等角度来作直接连结的企图，都会有简化的危险。

## 七、你喜欢批判别人的商品消费欲望吗？

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在1932年说，马桶、玻璃窗、衣柜等是西化者追求时尚的奢侈欲望。以今日的语言来说，曾纪芬是指责马桶等乃是西方殖民者所制造的虚假欲望。而当时甚至还有人曾经以生理的理由说马桶「违反自然」（即，大便时应当采蹲式而非坐式）。

现在人们将曾纪芬的这个说法视为民国守旧派的迂腐，但是大大小小的曾纪芬今日充斥「批判」界，这些人不断宣称「真实需要」截然不同于被父权或资本主义所建构的虚假欲望。然而这两者的区分却充满了沙文主义的色彩——什么是「曾纪芬」口中的「真实需要」？说穿了，「我的（没有）欲望就是大家真实的需要」！

某少女看了广告的手机或凯蒂猫就好想好想拥有，就有强烈的购买消费欲望（甚至因为没钱买，后来就用援交来换取）。这就必然表示此少女被洗脑、是主流消费的顺民、在政治立场上拥护资本主义吗？错！对商品的欲望本身并不是被洗脑的证据。有关狂想与欲望的心理分析说法也证实：欲望商品和政治立场无关。例如，右派也会有欲望购买《资本论》一书，女性主义者也会欲望男性沙文主义商品，批判A片与减肥的人往往照常看A片与进行减肥，更不必提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些人的欲望了。很明显的，欲望或消费不一定就是缺乏政治觉醒或「顺民（顺从）意识」的表现。所有批判消费欲望的人其实都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批判别人的消费欲望，从来不会自我批判！

## 八、购买与消费是市民的一种公共交往

左派、仿左的保守派与人文主义派等等所有空脑的批判家，只知道急急忙忙地去批判别人的消费欲望，但是却没注意消费欲望的实现过程——购买。

对的，离开家走到市场或街道上，与人交往，这个购买过程（不论最后成交与否）都可以产生欲望／认同／愉悦。换句话说，欲望／认同不一定是由「看广告」所引发的，购买（或不购买）的愉悦／认同也不必然和那个特定的商品本身有关，因为购买过程涉及了都市景观、室内与橱窗设计、购买流程、市民交往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就像去麦当劳绝不是只关乎电视上的汉堡广告与汉堡本身而已。以下我只简略地谈谈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交往」（intercourse——最早马克思与恩格斯用intercourse这个英文字或verkehr这个德文字来指商品的交换活动或商业人际交往，我在此沿用并发展此一用法，但是我的用法并不包括哈伯马斯所谓的沟通communication）。

早期现代的经济交往促进了平等主义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在市场经济发达的「陌生人社会」里，消费购买是公共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形式，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购买的经济交往其实并不都等于单纯的物物交换行为；许多时候，经济交往和原有的社会文化网络形成了交织（例如社区的网络、族群的网络、亲友的网络、次文化的网络等等，也与购买消费的网络发生关连）。即使在都会陌生市民间偶发的、「非私人化」（impersonal）的消费购买中，也常常伴随着或附加着其他意义的交往——至少，在这种消费购买行为中认可了既定的一些市民交往规范，维系了社会团结与秩序。

另一方面，消费购买也可能复制市民的既定差异与权力关系。例如高级度假场所内的观光客或高级餐厅内的顾客等等，其不言可喻的身分地位也是透过彼此无形的往来彼此印证（例如同在一个场所，但是彼此有距离的无涉，自制拘谨，衣着得体等等），并且用以区隔其他在场的「低级人士」。其次，一般市民交往的不成文限制或规矩也会反映在购买的市民差异中，例如，成年男人或许可以独自在玩具反斗城购物，但是却少在百货公司的女性内衣部门购物。

此外，从所谓消费者的「口碑」也可以看出购物消费与公共交往和人际网络的关系，因为「口碑」意味着商品讯息交换，以及更重要的，信任（讯息的人身保证）的可能交换。这种交换活动既是在特定的人际网络内进行，也就强化了那些人际网络。换句话说，人们透过购买消费来进行彼此之间的交往。

总之，许多不同意义的市民交往都可能透过商品交换来达成。用更简单的话来说：一个社会总是人和人在发生形形色色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有时是依附于或透过商品交换来达成。例如，社会内的各种「知识」，可以从购买中互相交换学习而来。（此处的「知识」除了指买卖双方所拥有的各类资讯、经验、意见、社会观察、价格评

量、语言等等，也包括了不必言明、默会可知的文化意义、角色扮演、规范、身体规训、礼仪、情感评价、互动仪式、自我认同、服装流行、风格、道德态度等等。）当然，这些「知识」也可以从其他关系中交换学习得来，但是消费购买乃是陌生市民公共交往的一个常见方式。例如，在台北敦南诚品书店买书，和网上购书绝对不同，在此处购物时，连身上穿的衣服与打扮、身体语言，都是某类市民交往（但不交谈）的重要成份。

从这个角度来看，谁是实际的购买者——谁的身体亲自出现在市场上与人交往——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这个购买者（如外劳女佣），而非指使她去购买的出钱者（如外劳的主人），在市场上和人做实际的交往、和他人发生关系、在他人面前呈现自我，共同维持并建构社会现实（独自躲在家里则不会参与到实在世界，实在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交往市场）（注7）。在商品社会中，贩卖者与购买者的特征或属性则会影响文化、市场、城市风景等等的某些层面。（例如，倘若外劳都不外出购物而均委托他人代购，虽然同样的商品被购买消费，但是此社会的公共交往就会有不同的面貌。）以下让我用女人与青少年为例，来说明购买作为公共交往的意义。

## 九、女人与青少年的购买／交往

早期在消费主义成形时，家庭消费是大宗。因此此时的消费主义主要以女人为诉求目标，内容也以女人的家庭角色为脉络，被视为强化了女人属于家庭的刻板印象，于是「消费主义—女人屈从」成为批判的焦点。但是消费主义也同时给予了女人权利意识，让她们可以以消费者身分在公共领域中与他人交往；同时，女人被视为家庭购买方面的专家，比其他家人更擅长购物，因而在家庭里拥有力量与权力，购物也成为乐趣的来源。这种家庭妇女的消费主义状态

至今仍然相当主流，但是已经乏人批判。

虽然钱是男人赚的，但是购买却使女人走出厨房，在公共空间流连忘返。购买常是女人彼此交际的方式，也是「女人文化」的一部份，更是使女人和社会普遍发生关系的媒介——购物是女人的「滥交」：购物让女人处处可去、到处都去，也使女人多方面地进行社会交往。

同时，购物也使市场以女人成为家庭消费的实际掌权者，是市场交往中的平等／头等公民。男人只好借着「不屑家务采买琐事」、「幕后指挥」等说法，来掩盖其在市场交往领域中身体的缺席事实。（空脑的男性理论家则以为购买无须智慧、脑袋空空也可购买，而且误以为无须身体与情绪、「空有脑袋」的理性沟通也可以造就早期现代以来市民交往的秩序与意义）。

发达的青少年消费对青少年也有类似的正面效果：青少年借着消费购买过程，合法地现身于公共空间，并且取得（与成人一样）占据或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合法享用公共资源等等。（根据统计，美国青少年在「血拼魔儿」shopping mall中常常只是消费那里的空间与形象、聚集人气和交友钓人约会、只逛不买。）但是更重要的，青少年经常在和购买相关的一系列相关交往活动中，不但建立次文化的人际与认同网络，还建立起次文化的商业网络，校园附近贩卖盗版补帖或光碟的商业网络即是一个例子。又例如，有些地点的顾客们（弹子房、泡沫红茶店、网咖等）可能彼此都认识，或者都会光顾其他消费地点等等。另外在像台北光华商场的商业交往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电脑商家并非只是单纯「贩卖」而已，而是透过贩卖来形成次文化；次文化与商业网络互相支持渗透。许多青少年的购买与消费也常常在「次文化－商业活动」中转化为贩卖与生产：例如相互买卖补帖或放心药，又例如在青少年的便利商店或速食店打工文化中，其

「顾客／打工者」身分经常互相转换，其身体规训也彼此学习渗透（参见何春蕤，〈台湾的麦当劳化：跨国服务业资本的文化逻辑〉一文）。一般来说，青少年商业中由于员工也多是青少年，所以顾客／员工身分很容易转换，这种转换也促进两者之间的进一步交往，以及人际交友、工作介绍等圈子之形成与扩散。

## 十、次文化的商业网络——社运应该商品化

次文化内的商业网络事实上是次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力量，例如飙车族的文化与交往绝不只是限于街头狂飙，而同时是在机车改装等商业网络内受到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某些青少年次文化即使被视为偏差（如使用放心药psychedelics，俗称吸毒），也很难被公安力量所根除——因为次文化（以及其所包含的狂野、颠覆、挑战、抗争、腐蚀、进步）正如吸血鬼般地依附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商业网络内。这么看来，具有激进运动性质的偏差次文化必须积极自觉的与主流文化互相渗透、利用主流的制度、组织、商业交往网络等等来吸取资源和从事实践。

许多社会运动组织偶而也会涉及商品买卖，但是多未能建立商业网络，也因而难以壮大其运动次文化。这些运动组织即使只卖纪念品、书籍等，仍然是以腼腆的态度来面对「运动商品化」的指控，而不能振振有词地指出「商业化」才是未来运动的理想出路，只可惜缺乏人才、资金、网络门道与精力而已。更广泛的来看，有些运动的次文化商业网络是自发形成的，例如同志运动相关的酒吧与书店、艺廊等形成的网络，而这种商业网络与同志次文化、同志交往有密切共生、共同壮大的关系。总之，社运如果要发达壮大，就必须发展商业网络，这样的网络也才能够孕育人才、发展次文化、有助于草根组织和动员。

然而许多运动组织即使经营书店、咖啡餐店或贩卖东西，也从未正视运动的这个商业部份，并将之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讨论其意义。19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与嬉皮运动也曾有其商业网络（放心药、二手货、手工产品等），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正视与认可（McRobbie）。事实上，那些贩卖现场经常是由女人与年轻人在经手，有身段的男性社运大老们则忙着处理「大事」。在这方面，社运论述中忽略或轻视商业活动，也意味着对女人与青少年的贡献之忽略与贬低。

总的来说，男性社会理论家对于「再生产领域」一向是忽略的，不但忽略性／性别／家庭，也忽略消费／购买、以及交往。上面谈购买时，我没有多举「贩卖」的例子，其实贩卖者的社会交往也常被窄化为「图利」，而没有被更深入的探究，此处暂不深谈。此外，购买与消费虽然都可以成为公共交往，但是购买与消费是不同的行为与概念。

在这几节中，我之所以提出「交往」（intercourse）这个观念乃是因为在简化的左派分析中，像购买这种实际的身体实践往往在标准公式的「（再）生产—消费—流通」这些环节中被忽略，左派只看到抽象的市场或交易、商品、广告、洗脑……，却没有更具体地去探视购买，以及与其相关的其他可泛称为「交往」的诸实践，和交往所在的环境脉络——特别是那些可以成为某类人或某群人聚集交往的买卖场所或服务场所。商业的交往不只是价值的交换，而是意义的交换、身体的互动；商业交往可以衍生很多其他形式的交往，而性交（intercourse）则是其中一种交往形式。商业交往不只被商品价值规律所控制，还有意义、规范、权力的控制。马克思的思想隐含着对非商业交往的向往，却又悲观地认为商业交往将使所有交往形式都被商品价值交换所控制或「污染」。虽然马克思也正确地看到商业交往促进了交往的范围与扩大交往的形式，但是却没有进一步地发挥个



中可能的抵抗或解放意含。

下面让我们看看除了「交往」以外，消费的其他面向。

## 十一、主动消费

晚近的消费文化使得消费不是只消费物质或服务，而还消费象征符号；对象征符号的消费有时甚至是消费的全部原因，或至少是主导原因。这使得消费主要是文化场域的实践。

事实上，所有消费几乎都是文化实践：人们在消费中积极主动地创造或维持某种身分认同（个人或集体的）。由于认同必须自我自力主动地建构，故而消费从不是简单地反映生产，商品消费的文化形式与意义因此不能被化约到阶级／经济／生产。正如Mica Nava所说：「消费不但是经济活动，也是交往与对立、形象与认同、梦想与安慰。」

上述「主动消费」的观念，强调的不是主动选择商品或消费者主权，而是说，商品的意义必须在消费过程中才能实现，而这则给予了消费者主动介入诠释的可能性，使得商品的意义不一定是生产者所意图的、所强加或决定的。

「主动消费」是理解通俗文化的一个关键：文化研究将通俗文化，特别是次文化，视为大众主动消费商品的结果：人们利用凑合借用（bricolage）商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创造／复制／建构意义、形象与认同，而这些在文化场域内的主动消费也与通俗文化互相构成。通俗文化的拼贴／挪用／凑合／赋予意义等则是创造力的表现。

换句话说，文化工业提供了文化商品，但是人们却在使用文化商品时生产出通俗文化。即使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无异议地接受了商品事先设计的现成意义，人们也需要主动地「启动」这样的意义才能

完成消费。文化消费本身就是意义的生产，而人们必然处于一个赋予意义的能动位置，并且往往借由这样的行为来培力、得到愉悦或者抵抗。

## 十二、通俗／次文化的抵抗与培力

上述的结论在各种次文化中更为明显：次文化把日常普通的事物挪用与重新诠释，这种文化借用也是一种「收编」，但却是由下而上的收编（Fiske称之为「编出」excorporation，相对于收编的吸纳「编入」incorporation）。

次文化风格之所以会具有反叛的因素，乃是因为「风格」就是借用拼贴（bricolage）而成的：将符号象征从其原初脉络抽离，商品重新被串连，这是个自我定义的活动，对原初意义或生产者的意图自然形成抵抗，并很容易在被压迫的情境中产生反对意义。例如，青少年次文化透过各种行为（音乐品味、追逐偶像、做身体、黑话或内行等等），以符号象征形式来反抗师长与父母文化，文化工业则有可能将青少年次文化进一步商品化。

成年人一般看到的只是文化工业在操纵青少年，在制造流行或「带坏」青少年，以为「流行」都是从上而下强加于青少年的。成年人之所以有此印象，乃是因为成年人往往透过与青少年文化划清界线而奠定本身的「成年人」地位，结果因隔绝而并不熟习青少年次文化，以为文化工业网罗了一批深懂青少年心理的广告行销高手与创意人员，所以能够让青少年如痴如迷。

其实，文化工业所创造的新一波流行，往往是对次文化旧一波流行元素的收编，但是文化工业却赋予了这些元素或符号一种正当性。结果，一方面可能使它们原初的反叛或偏差意义减弱，但是同时也使得这个商品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被消费与流行，因而具有文

化接受性（cultural acceptability）。另一方面，被削弱的反叛与偏差却也有可能因为被认定而得到正当性，并因为扩散而形成另一波编码的可能素材和榜样。这个抵抗与收编的过程，可以被看成是不同主体权力协商过程，也往往带来真实的文化变迁与符码意义的变化（注8）。

### 十三、意义无法被「霸权宰制」或「反对抵抗」的任一方所独占

这不是说通俗文化必然是培力与抵抗的，正如我们并不否认有时候消费是顺从生产者所意图的意义，有时候文化工业也极力在其中操纵。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两点：

第一，正如性产业的力量不能决定性产业的文化影响/效应，文化工业的权力也不能等同于文化工业的影响/效应。例如，一个资产庞大的跨国唱片公司可以使〈爱如潮水〉必然流行吗？或许。（其实统计指出，失败的促销例子更多）。但是他们能使〈爱如潮水〉变成「使异性恋女性臣服于一夫一妻意识形态下」吗（如果就文本字面来分析，好像如此）？可是结果却不是（爱如潮水曾是同志国歌）（请参见本文A计画之附录，本书54页）。

第二、意义和愉悦很难被独占与控制，意义并不终止于商品交易的结尾（注9）。文化领域总是意义争战的场地；意义就是社会实践与社会斗争。商品符号在消费实践中被赋予意义、被选择、被着色、被重组、被挪用，这些既是认知的、也是情感的、身体感知的过程，都包含着创造的元素。当然我们不否认〈爱如潮水〉的生产（作曲词者、歌唱者、包装行销者）是有创造力的，但是谁又能否认消费者将之变成同志国歌的创造力呢？意义信息不是生产者单方传送/消费者照单接收，而是在消费中被再度制作或加工；故而de Certeau把消费称为「二度生产」。生产者的意向与产品的文本并不能决定消费的效果。（亚洲青少年的同人志次文化经常将流行或通俗文化的成

品加以延伸改编、恶搞或谐拟，例如把可能原来是阳刚的异性恋男主角变成BL（boy's love）风格；这个例子生动地显示了这几节的诸论点）。

事实上，商品的使用价值无法在事先确定，只能在每次实际使用中才体现。资本家要交换价值，消费者却要使用价值（或符号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对资本家而言只是可以交换，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却有很多不同的使用价值。此外，由于个别资本家也常常惟利是图，而不会关心产品「落入坏人手中」——亦即，不关心该产品是否会被转换其意义而不利于资本家整体——这也是为什么消费与通俗文化领域可能会出现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矛盾。

之前曾提到Bell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一个因素便是享乐主义文化。Bell曾说：「享乐主义的世界是时装流行的世界，是照片、广告、电视与旅游的世界。这是个让你信以为真的世界……上个十年最成功的杂志被称为playboy（游戏玩耍的男孩）不是偶然的……其成功主要在于这本杂志鼓励了男人性猎艳的狂想。Max Lerner曾说，性是美国生活最后未开发的西部边疆，在这个强强滚的社会（go-go society）中，性成为成就动机的最高峰。1950到1960年代，性高潮的秘教崇拜取代了财富的崇拜，成为美国生活的基本热情」。Bell这类分析的反动性，在于未能重视文化意义的多样诠释与变动性质，其实际效果便是掩盖与压抑了矛盾和可能抗争。

例如，在Bell所描述的这个男男女女都要性高潮的1950-60年美国文化中，要如何看待同一时期曾经发挥影响力的激进性政治的高潮论述呢（W.Reich的《高潮之功能》）？难道这是激进派性政治与体制共谋的证据吗？在同一个时期也有「中立」的性科学（马斯特与琼生等关于女性高潮的论述），这也是享乐文化的共犯吗？可是女性主义不也立刻转而把这个通俗的「享乐的」高潮论述激进化，成为女同志分离

主义的弹药（Anne Koedt〈阴道高潮的神话〉）吗？

由这个例子来看，文化战场的「编入（收编）」与「编出（挪用）」是不断进行的，没有人拥有最后的意义、诠释。对批判体制的人而言，重要的是如何从通俗文化编出激进与抵抗的论述，而非哀叹激进与抵抗的论述已被体制收编。

易言之，批判者要做的，不是寻找liberation可能是libertine的蛛丝马迹，而是从libertine积极编出liberation。（注：libertine即是自由随性、任性放纵的意思。Liberation则是解放。）

但是为什么有些左派的欲望却总是在liberation中寻找可能是libertine的蛛丝马迹，想把两者界限区分清楚呢？

我认为左派这种态度建立在以下的假设上：资本主义是单一巨大的并且能够吞噬所有反对，把所有的异议都齐一地占用为一个同质的主宰文化。因此，收编必然是一个全面化的过程：被收编的就不可能是真的反抗，真的反抗则必然无法被收编。在这个前提之下，「商业化的文化反对」与「真正的文化反对」的区分必然须是清楚的；「真正的抵抗」和「与体制共谋」的界限也必须是清清楚楚的。

左派这种假设有其政治上与知识上的许多盲点，此处只需指出意义是无法被宰制或反抗的任一方所独占。其实，liberation与libertine必然共享许多意义元素，也不可能区分得清清楚楚，即使区分清楚也是一种无益的实践，因为从libertine积极编出liberation才是有用的。

#### 十四、通俗文化vs.高等文化

许多左派视通俗文化为另一种「人民的鸦片烟」，认为通俗文化提供人民安逸的愉悦，让人民宣泄了不满因而顺服现状。这样的观点忽视了文化领域内「两种文化」的矛盾对立，以及由此矛盾而来的阶级斗争、年龄斗争等等。

在文化领域里，一方面有官方的与高等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有通俗文化。官方的文化通常有直接的政治目的，在打造国族认同时表现为一种国族文化，这种国族文化与上层阶级的高等精致文化关系密切但是不完全相同（注10）。相对于高等文化的国际或西方成份，国族文化则有许多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成份，但是这些成份也会借用高等文化的符码与呈现形式，故而官方文化有时与高等文化的界限模糊。国族文化也可以关连到族群或种族的斗争，不过，此处我只谈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矛盾。

高等文化常有道德规训的意含，通俗文化则是嘉年华式的。前者是严肃的、精神升华的、静态的、美术或博物馆的、国家支持的等等；后者则是欢笑的、肉欲身体的、动态的、市场或街头的等等。

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两者也代表了不同的品味与阶级意义。在Bourdieu的讲法里，品味的高下在于一种美学的目光，也就是能否和事物的实用价值与实际操演产生距离的目光——这种目光则从关注事物的功能转移到其形式。不过，这种有美感距离、纯美学的目光，是透过美术馆才被制度化的，因为在美术馆内静静摆设的事物已经失去实用功能，只剩下纯粹形式供人沈思与凝视。换句话说，近代高等文化品味的美学目光其实是一个随着美术馆等艺术建制诞生的历史发明。

相对来说，通俗的美感与品味则多半是实用的、多元的（系谱复杂、凑合借用、互相指涉）、非「永恒的美」，也不放诸四海皆准，可能存在于不法的、乡野的或次文化的小圈子中，或者被商品化而有文化接受性。通俗品味充斥于通俗文化、商品设计与边缘次文化中（却被评为低俗或甚至恶俗），但是却是多元美感的真正来源（在此我们已经找到女性主义苦寻不着的多元身体美感与性感的文化资源了）。

高等文化的创造者是少数的一群文化菁英或艺术家；通俗文化的创造者就是大众，人人都是艺术家，这是集体的努力生产的结果。文化工业提供了原料和半成品，但是大众才有活力与创造力来加工生产通俗文化。大众产生出来的，也许会被收编成为新的商品，但是这不是故事的终了：正因为永远都有新的创造，所以才有不断的编入（收编）与编出。总之，我们不应该假设创造力只存在于文化工业，也不应该假设：通俗文化完全是文化工业操纵符号与意义的产物，而大众只会消费接收现成的意义而无创造力。

不否认大众的创造力，不把通俗品味视为低下，强调通俗文化的参与性与民主性，于是有了「普通或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的说法。这是一个有复杂历史的观念（起源于菁英主义、同质的共同体社会等观念），但是Raymond Williams将此说法与这些观念分离，而注入了参与民主的观念。Paul Willis则更肯定通俗文化作为共同文化的民主、抵抗与培力意义。不论如何，透过资本主义的商品消费，为「普通或共同文化」铺平了道路，这是文化的平等，品味的多元而无高下。

高等文化、通俗文化与官方或国族文化，当然有互相收编渗透的情形。这些需要逐个地历史—社会的考察。例如，云门舞集起源于高等文化，但是在诉诸群众的室外场地表演时，其实又扮演起国族文化的角色。一般来说，虽然以高等文化形式来收编通俗文化内容（如古典音乐乐团演奏通俗乐曲等等）比较常见，但是在像美术馆、国家剧院、经典、高校与大学课程这些高等文化的主要建制方面，通俗文化的渗透仍然少见（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课程与经典方面）。不过，通俗文化与高等文化的高下之分并不因为彼此边界的渗透而消失。

## 十五、青少年与电视广告

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的高下之分，除了有阶级斗争的意义外，还涉及年龄斗争，因为一般青少年不但普遍被视为缺乏高等文化教养与文化品味，而且通俗文化还主要地被视为青少年的文化。

一般在谈到青少年文化时，特别是消费与影像文化时，青少年常被视为被广告操纵洗脑，比较容易受骗上当花大钱。Mica Nava却指出青少年其实很不好骗，因为事实上，青少年广告比较sophisticated（上道），比较繁复，比较多镜头变化／快速剪接／多样打光配音，比较压缩更多符码，更多抽象与脑筋急转弯，和那些诉诸家庭主妇的广告不同。这说明了青少年的文化技巧很高——只要看MTV就知道。

青少年之所以有较高的文化技巧，很少是来自正规教育，而多半是因为他们自幼就熟习电视广告与影像文化。广告的文本乃是从其他文化产品来，如政治、电影、广告，这些符码交互指涉、谐拟……，用典愈多则愈难解码。此外，广告与媒体的自我解构、自我解码，更使得青少年的文化技巧高超，也拉大成人（包括学术份子）与青少年的距离。Fiske因而指出，儿童很早就是电视广告「怀疑的读者」，反而是父母的禁看妨碍了儿童电视识字解读能力的发展。

由此来看，那些断言「青少年被电视广告操纵」的大小批评家，显示的不是青少年的智商低下，而是批评家本身的痴呆程度。

## 十六、青少年与身体

当代对于身体的重视（装扮、减肥、饮食、运动、性、养生、整型等）有许多社会—历史的因素，包括所谓的「文明化过程」（N. Elias）、个体化权力技术（M. Foucault）、个人主义化（U. Beck）与对身体的反思性筹划（A. Giddens）等等。这些都还需要其他文章来说明，



而不能像那些没有学问的空脑批判家那样归诸于「广告物化身体／身体情欲商品化」等大掰咒。

现代的身体规训在规模与细致深入个体方面，是传统上从来没有的，而且儿童青少年与边缘人首当其冲。可想而知，对于身体规训的抵抗，也必然集中于身体规训的实体——身体，与形式——规训，因此，身体必然就是这个抵抗规训的战场。当然，有力对抗官方规训的往往是另一种规训或身体管理，然而在这种抵抗中，主体却得以操作其中的矛盾，而重申对于其身体的控制权。

青少年的反抗与（次）文化经常是集中于身体的。正如Hebdige所说：「如果青少年不能拥有什么，至少拥有自己的身体。如果青少年无法施展任何权力，青少年至少可以在自己身体上施展」。外表的酷异作怪或刺青，是在普遍失业与从不就业的环境下，公然宣告无意参与抢饭碗的行列，自断后路，在社会把你淘汰前，先把自己葬送。Hebdige这样的解释正是把身体次文化联系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

不过总的来说，各种各样的身体流行或者具有性别特质的风格，其实没有内在意义：例如男性特质风格可以被女性挪用，刺青贴纸可以因不同年龄而有不同等级的偏差意义等等。总之，符码是非常易塑的，可以不断地被「做」或修正——例如，化妆可以使女人更正经或更偏差。此外，许多看似与身体无关的消费也可以透过论述而连结到身体管理，故而身体的抗争也是非常普遍多样的。

之前曾经说过，青少年不论走在哪里总是在成人的监视下，上课时间或甚至放学后穿着制服在「不良场所」的游荡，或身体彼此的亲热，更立刻引来亲权的凝视。青少年对这个时刻被监视的反抗，不一定只是躲避隐藏，反而有时会故意作怪和爱现，以吸引更多的目光与凝视，从而将被监视的不安，转化为被观看的愉悦。事实

上，青少年次文化往往就是在监视与逃避监视的空间中成形，故而其文化风格趋向招引目光的作怪或甚至残虐身体的奇观，这是对监控的反抗：要反客为主地把被监视的处境转换成表演的奇观，产生操作他人凝视的愉悦。这正是Hebdige所说的「躲在亮处」。

## 十七、文化激进主义

青少年一直有两种被建构的形象，例如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将工人阶级的青年分成两类：「乖的／罪犯的」，「有道理的真穷／不知上进的懒穷」，「不良的／坏透的」，这个二分趋势一直存在，后来的「好玩欢乐／麻烦」也是一样。这些二分往往是透过具体形象来被呈现与被建构，如果我们分析现今的许多青少年广告或媒体影像，我们会发现同一个影像主体可以瞬间交替出现两种形象，或者可以同时有这两种方式来解读。这是否代表着这种二分建构可以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呢？绝非如此。

广告或报导中的「偏差与乖顺」、「上进与颓废」、「阳光快乐与阴暗犯罪」的瞬间交替与同时并存，只是粉饰两者之间冲突的乌托邦狂想，而这两者的矛盾关系则时常被置换为官式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紧张关系。但是不论是禁欲规训的官式文化，开明禁欲的教育改革，着重享乐的通俗文化，理性规划「工作／休闲」的新伦理与机制（如周休二日和休闲工业）等等，都不能使青少年和谐平顺地同时内化以下两种生活风格与人格——亦即，在官式文化的场域内服从、禁欲、勤劳工作读书等等，但是在通俗文化的场域内有节制的放纵、享乐、接受现有休闲与娱乐产业的安排等等。换句话说，在每个场域中总是同时存在着踰越、违规、颠覆、抵抗、挪用、错置等偏差行为。

从青少年解放的立场来看，偏差不是社会问题或不当的社会

化、缺乏管教；而是抵抗，也有时是生存策略。偏差充满了诠释的空间，或至少可以被连接到抵抗。

我曾经在〈政客的性道德与国家的理性化〉（注11）一文结尾处，提倡「文化的激进主义」，也就是倡导偏差的人生风格并瓦解主流价值和家庭（例如以败俗前卫的艺术、严肃的学术论文、运动文宣或座谈、低成本的自拍、口号、小报、网站、T恤、同人志、纪录片、报导文学或任何想得到的各色各样的文化产品来正面呈现此刻的援交、性工作、嗑药、跨代恋、变装、乱伦、刺青、换伴、通奸、畸变恶形、恋尸等，但不限于这些）。这种源自现代主义文艺的文化激进主义，它的反禁欲主义乃是愉悦与好玩的过度或滥用（the excess of pleasure and playfulness），而这种过度或滥用不但和以劳动生产为中心（productivist）的主流制度与价值尖锐对立，也不同于「有节制的享乐」式的休闲娱乐产业之工作伦理。

文化激进主义这种抗争策略的选择，是我和另外一些谈流行文化与消费者最大的不同处。后者的文化研究与政治总是选择「安全」与「洁净」的策略：「安全」，因为它总是在已经被知识份子所接受的批判常识内操作，而不是干犯众怒地替偏差与变态辩护；「安全」，也因为它对激进偏差／保守反动都保持距离，各打五十大板的维持学术客观中立，而在它的文化政治中，被警察法律权力监视的文化激进主义亦被描述为一种危险的权力。「洁净」，因为它总是优雅与拘谨地迎合高等文化的趣味／品味；「洁净」，也因为不是替罪犯丑怪恶形辩护。

事实上，这种安全与洁净的抗争策略正呼应着资本主义的新工作／享乐伦理。当代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需要生产与消费，游戏与工作。浪漫主义与清教主义是资本主义所需的孪生文化，这两种性格典型（character ideals）都需要被编入同一个人格（personality）

中，而这个双头的伦理显然此刻在中产阶级身上已经被制度化（Stephens）。

不过，我认为就像所有的伦理要求一样，资本主义的新工作／享乐伦理总是充满力有未逮、难以内化的实行困境，对于青少年而言尤其如此。换句话说，我们不应假定这个新伦理能将当代的工作伦理与享乐伦理轻松地缝合并维持区隔——特别是，文化激进主义将直接影响这个新工作／享乐伦理所想要保持的平衡、所要调和的张力。

## 十八、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通俗文化的动力

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说法，曾经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历史难道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与天才的创造吗？同样的，通俗文化与次文化难道不是文化工业、行销、广告创意、明星偶像、节目制作、特技音效、美术设计等等的创造与操纵吗？

我在上面曾经以主动消费、二度生产、「次文化与文化工业的互相渗透、循环再生产」来说明我的论点。此处我只做几点简单的补充以总结本文。

首先，青少年的流行文化本身也是年龄区隔（建构）的一种实践。如果一种流行风格太大众、太普及，以致于不分老少都流行，那么就无法区隔年龄，故而此时我们必然观察到青少年对这个流行的进一步改造、挪用、变化（或甚至扬弃），以维持自我认同。此处的改造挪用或许是细微巧妙的差异，也可能有偏差的意含。我要强调的重点是：年龄建制本身会促使青少年创造次文化。

次文化不但经常有反抗主流文化的可能意义，也可能被富于想像创造力的社会运动挪用。例如，Afro黑人的大蓬头发型在黑人民

权运动中兴起，就是「黑即是美」新美感风潮的一部份。另外，现在也有颠覆旧男女关系与形象的各类影像、广告与商品，之中有以跨性别美感来重塑男性身体者、有以破除禁忌之女性自由精神与语言来行销者，不一而足。这股建基于新欲望的商业风潮比起女性主义的论述更为有力与吸引人（例如晚近「身体听妳的，世界也会听妳的」广告），而且可以开发出新的情绪和身体、引发社会矛盾或建立性／别次文化。

其次，一般对于通俗文化经常采取一概而论的批判，例如「少女漫画书都是复制父权」等等，文化研究则显示漫画这类大量生产的产品必须逐本分析，而非一概而论。同样的，一种流行文化的社会效应也是很难一概而论的，例如日本的视觉系艺人在台湾的文化效应究竟是什么？或许是青少年本身性别认同暧昧的投射？但是也有人说这造成青少年一窝蜂的模仿抄袭，但是这种批评却看不到很多跨性别者以视觉系来偷渡自我身分或自我正当化。

有人或许认为，一个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都很庞大的促销活动，将会使该文化产品的意义完全符合生产者的意图。但是事实上，即使是强势的、极权国家支持的流行文化产品也必须经过主动消费的协商（negotiation）或妥协过程。例如曾流行于中国的「血染的风采」一歌，既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意含（因而满足国家的宣传需要），但也让人民表达了对中越战争的悲伤哀痛（因而满足了人民的反战情感）。

再者，从商品的成功赚钱与否、广告的动人与否等来衡量其社会效应与文化意义，显然是不相干的：因为商品可以象征地或符号地被拥有（无须购买），被不断挪用（不是只使用一次），这些都和成本或利润无关。例如，台湾泛亚手机一系列勾动外遇的广告电影之文化效应，和这个手机的市场成败是两回事。同样的，周星驰的东／

西游记（大话西游）卖座惨败，但这部电影作为被消费的文化产品，却产生无法预估的次文化效应与庞大影迷。

历来对影迷、歌迷、Hello Kitty迷等等「迷」（fandom）的刻板印象，都是把她们当成完全失去理性而被业者或偶像操纵的一群人，尤其是因为「迷」代表一种不能自己的行径，所以更被视为没有自主能动性。但是文化研究也显示这种刻板印象的错误：迷哥迷姐们不但团结力量大，可以影响业者与偶像，而且还可以借着许多种不同方式来重新改写原本文化产品（如电视节目）的意义（Jenkins）。此外，由于网路的发展，各种「迷」与次文化认同更容易聚集、影响、改造原有文化商品的意义：不论是电视节目、电影、罗曼史小说、电子音乐或Rave派对、流行音乐、偶像、星座等等网路讨论与交换，都呈现迷哥迷姐们自我建构意义的景况，原来的生产者并不能控制这些派生或新生的意义与文化，反而有时会被「迷」（台湾称「粉丝」）的回应和活动所左右。

近年来的科技发展使得操弄影像的技术门槛降低了，人们可以自行创作影像音乐等，也可以「实体的」二度创作现成的文化产品（青少年的MAD次文化则更自我标榜「二度创作」），例如撷取现成的电影片段、影像音乐等等，加以改造改编。例如，大陆的地下光碟将电影《卧虎藏龙》重新配音，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的《台湾论》被改写成具有性／别歧视意味的对白，而网路更便利了另类文化产品的流通等等。不论这些挪用改造是否为了谐拟或其他目的，左派都应该捍卫其自由变造及流通的权利，抗衡无限上纲的「智慧财产权」。毕竟，这些发展都将是次文化社运更进一步发达与介入挪用主流娱乐工业的机会。

凡此总总都在说明，一般左翼或流行的媒体批判都没有掌握到青少年通俗次文化的复杂权力操作、多样社会效应与可能抗争意

义，特别是由于各种主流的建制并不是彼此一致而无冲突，这些内在的冲突与社会矛盾反而有可能促进主体的反思（*reflexivity*自折回应）与能动性。事实上，现代制度与个体都愈趋知识资讯饱和的反思性，个体所面对的往往不是缺乏选择或机会，而是被选择所淹没、却又无能近用最有利的机会。在权力操作方式转变、强制性减少的情况下，社会运动在政治—论述策略上，与其继续以「自主性」来质疑消费与通俗文化内的行动者，倒不如积极介入与挪用消费与通俗文化，来使行动者得力壮大。

## 十九、左派必须转向主体

可是传统左派为什么不能接受这样的政治—论述策略？这可能有很多原因，此处我只谈一点。

在传统左派的看法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只在于其强大的生产力，但是这个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会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故而其生产力水平只能达到某个最高极限，接着就只能带给人类灾难（如经济危机的循环、长期景气衰退、失业、浪费、社会不平等、军备竞赛等等）。相较之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却能够比资本主义更进一步能解放生产力，故而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契机。

以上这个传统左派的分析只聚焦于经济生产的领域，我认为这是不够的。因为这忽略了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内的解放力。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政治、劳动市场与雇佣、教育、管理、全球通讯传播与金融、贸易等「结构的转变」之同时，进而也开始改变更基本的社会构成关系，也就是「主体的转变」，亦即，家庭、人际关系、性／别、伦理、文明礼貌、童年、人性（情感）、道德、身体、公私领域区分等「主体建制」的改变。在后者所属的文化领域与私领域，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巨大的解放潜能（注12）。

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官方左派）有兴趣的只是官方文化或国族文化，但是1980年代末苏联与东欧的人民却被消费社会所吸引，也加速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至于一般左派则总是假设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与通俗文化是反动的，资本主义除了解放生产力之外没什么其他好处，故而资本主义所带给文化领域的改变也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易言之，左派不但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资权力关系），也不看好资本主义的商品（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与消费之影响。我认为左派在此完全缺乏深入分析，因此对于我所谓的「主体的转变」很容易持负面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带来的是人性扭曲、人际冷漠物化低俗纵欲功利等等，因而堕入感伤怀乡田园诗的人际关系与主体。

文化与社会价值领域的斗争（主体的解放）和全球化等结构的转变，如何相关与如何介入，都是进步的社会运动所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 二十、青春睿智和写长文之间的关系

我写这篇长文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回应什么文章，而是不忍再看到已经在思考问题的年轻人受到空脑的「批判大掰咒」影响而日趋愚笨化，只能不断想像群众（甚至自己）是「体制结构的受害者」。这种轻松不费力的古旧想像有时替懒人找到无能为力的借口，有时替妒恨者正当化法西斯或歇斯底里的行径，有时促使人将战场放在国家、法律、公民社会等中心地区，以及管理／决策／规范等「向上提升」的位置（亦即，从制度面——从上而下地改造群众），而不是「向下沈沦」地在通俗文化与商业体制之内充满想像／愉悦／欲望、为主体培力的边缘战斗。这篇长文因此要丢出一些新的思考资源与论述，提示人们寻找新的抗争路径。

关于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还有许多议题我没有写到，



可以深入的面向实在太多了，但是文章长只能长到一个地步，写作者只能写到一个地方。之后，就是读者通行无阻的地带，读者开始写作的地平线。以此与大家共勉。

——原载于2001年2月28日《左翼》第16号；2001年3月31日第17号。（原文首次刊出时有些文字脱落，此次均已改正，还有少许文字的修饰和更动）

## 注释

1.

反性派	性保守派
	激进—文化女性主义派
	后现代的新保守派
性自由派	自由主义派
	自由至上派
性激进派	性解放派
	后现代的激进派

2. 有关这方面，下面这篇文章有很初步的整理。张玉芬，〈台湾青少年的发明——法律、学校与年龄政治〉，「2000新生代论文研讨会」，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主办，2000年6月11日。有关西方的青年的社会形象与地位之转变，例如19世纪开始青年社会形象的提升（希望与发展的象征），青年政治运动的勃发（1830年代的青年美国，马志尼的青年义大利运动，或者Young Turks——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典故用语），还有，中世纪青年与现代青年之对比，均可参看Bryan S. Turner, *Medical Power and Social Knowledge*, second edition (London: Sage, 1995). 119, 122.

3. 奇怪的是，文化研究在台湾至少也有十年以上的历史，可是为什么这些主流批评能大刺刺地忽视文化研究的取向呢？这些主流媒体批评的简化观点难道就不怕文化研究的学生的讥笑吗？我认为这之中有两个关键。第一，文化研究在台湾还是比较学院化，而由于运动性与尖锐性很难见容于学术（例如学问功力第一流的赵刚却在升等时被否定。像本文这样的文章不能作为学术积累晋升之用，只是浪费研究时间），因此文化研究的批判火力根本没有充分发挥，而且，研究文化研究，未必就是从文化研究（新葛兰西传统）来做研究。第二，文化研究并没有在台湾一般非学院知识份子圈中广泛扩散，也没有在一代代年轻学子间流传生根，故而文化研究取向尚未成为常识；相反的，由于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文化研究社群时时对各种文化现象以及本身的相应论述进行尖锐的辩证分析和批判，以形成文化研究深化和细致化的基础，因此还有人以为只要口念「商品化、物化、消费主义、结构限制……」等大掰究，就是在进行文化研究的「批判」工作了。

2004年后记：本文原来发表于2001年2月与3月，自2001年4月起，台湾文化研究学会开始定期举办「文化批判论坛」，并且建立网站积极扩张影响，经常介入现实文化现象。因此本注脚已经有些不符事实了。

4. 根据马克思，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下层经济结构之矛盾，这个矛盾是否会反映或如何能反映到文化领域，是一个和此处我的论点不甚相关的问题。我只是要指出：**如果文化领域内存在着矛盾，那么文化领域便不可能简单地保证经济结构的再生产**，除非有人能说明为什么矛盾所包含的不同倾向都能够达到同一结果（亦即，文化领域的矛盾，不论斗争结果为何，都不会真正影响到经济结构的再生产）。
5. Bell把社会分成三个领域，技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文化（10）。但是这三个领域无法彼此配合，是造成资本主义矛盾的主要原因。文化与技术—经济结构之所以会在当前形成冲突，乃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新教工作伦理——被腐蚀：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内部的发展，也就是大量消费所造成，而大量消费乃是由大量生产、市场营销、分期付款与信用而来（66），分期付款与信用可以使人不禁禁欲或延迟享乐——储蓄与禁欲则是新教伦理的重点。另一方面，Bell认为新教工作伦理被享乐文化腐蚀，乃源自现代主义文艺。现代主义文艺之所以能颠覆布尔乔亚阶级传统生活原则，是因为现代主义不再模仿现实（110），不再有美学距离，而是强调反智、反理性与个人本能的表达（84）：前卫、求新、叛逆、不断超越、否定一切旧风格等

都是其特色，而这些都有颠覆传统的作用。把现代主义的逻辑推到极致，便有Bell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出现（51），因为现代主义的创造力已经透支殆尽了——Bell指出现代主义原想搅扰与震惊现状，1890到1930年是其探索与实验的高峰；但是日久之后，其搅扰与震惊效果就日渐减弱，反叛资产阶级的冲动变成了主流并且被制度化，前卫实验的形式于是成了广告与设计的符号学（20）。Bell还认为，传统的现代主义无论多么大胆，仍然局限在艺术领域内，不论妖魔或谋杀，其狂想仍然是透过美学形式的原则来表达，结果艺术虽然颠覆社会，但是仍然加入秩序与理性的形式的那一边（虽然只是隐含的，而且不是在内容上理性）。相较之下，后现代主义则泛滥或溢出了艺术的容器，把边界摧毁了，并且坚持将后现代主义「走出去」到艺术以外的其他领域或日常生活中。来自现代主义与波希米亚次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充斥于日常生活的通俗文化与1960年代激进政治的反文化中，其基调就是表达个人与本能的享乐主义。顺便一提的是，Bell对于社会现代化与现代主义文艺的分裂的解释，和哈伯马斯不同；后者认为这种分裂乃是来自经济与行政管理的理性不断穿透生活世界后的防御性反应。

6. 传统还有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vs. 敌我外部的矛盾」的区分说法，这其实也是假设了有一种简单的矛盾可以区分出「敌／我」，可以指认出谁属于人民内部。在台湾1990年代初期的人民民主论述时，我就曾在《台湾的新反对运动》一书中批判过这个区分说法。
7. Goffman说「实在世界其实是一场婚礼」，也是同意思。
8. 正如张玉芬所说的一个例子：成人以为吴宗宪的低级笑话与其代表的人生态度带坏了乖小孩，但是其实这些笑话与态度早就在青少年之间流传，反而是吴宗宪挪用了青少年在各种场域中流通的自创素材。在我看来，吴宗宪所做的，主要是让能讲这类笑话的坏小孩在同侪竞争中赢过乖小孩，故而乖小孩的父母必须阻止吴宗宪为坏小孩培力。
9. 正像《资本论》一书所带来的愉悦、意义与文化影响，并不是止于购买者买到书的那一刻（那一刻也许会带来愉悦——买到减价的，意义——我终于也可算是左派了，文化影响——文化工业新近策划的左派商品大展促销成功等等。但是显然一个左派次文化也可以从人们消费《资本论》开始）。
10. 关于台湾的国族文化与高等文化的区分和关系，可参看叶富国，〈「假台湾人」专辑说明及书目〉，《岛屿边缘》，第八期，1993年。[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alter\\_native/index.htm](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alter_native/index.htm)

11. 甯应斌，〈政客性道德与国家的理性化〉，《性／别研究》5&6期合刊，「性侵害性骚扰之性解放」专号，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1999年6月，444-454。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sexwork/activity/ning.html
12. Habermas也注意到国家为了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干预介入社会文化领域，也因此改变了主体的动力意愿（motivation）；但是Habermas比较强调由此引发的正当化危机与动力意愿危机。在Habermas看来，国家与商业权力进入文化与私领域乃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不具有任何进一步解放的潜能。

## 引用书目

- Bell, Danie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1978.
- Bocock, Robert. *Consump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 Bradley, Harriet. *Fractured Identities: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Oxford: Blackwell, 1996.
- Dikötter, Frank.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5.
- Featherstone, Mik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1991.
- Ferguson, Marjorie and Peter Golding,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1997.
- Fiske, Joh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 Habermas, Jürgen.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 Haraway, Donna J. "A Cyborg Manifesto."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49-181.
- Hebdige, Dick. *Hiding in the Light*.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New York: Methuen, 1979.
- Jenkins, Henry. *Textual Poacher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McRobbie, Angela. *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 Nava, Mica. *Changing Cultures: Feminism, Youth and Consumerism*. London: Sage, 1992.

Slater, Don. *Consumer Culture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1997.

Stephens, Julie. *Anti-Disciplinary Protest: Sixties Radicalism and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1998.

Storey, John.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Second Edition. London: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1997.

Willis, Paul. *Common Cultur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卡维波，左派装可爱

林深靖

卡维波自称是左派，而且是可爱的左派。在《国际边缘》网站里，他极力劝勉我们「左派装可爱」的必要。在〈青春睿智的左派？成年痴呆的左派？——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见《左翼》第16、17号）长文中，他也强调，对于商品消费和通俗文化的挪用，即是要求左派「搞笑可爱性感」，是「考验左派的创造想像力」、「挑战左派能不能做到青春睿智（而非成年痴呆）的关键」。

## 「历史终结」与「告别革命」

卡维波也在文章中展示了几个「挪用」的范例。譬如，给儿童看凯蒂猫打炮的图片，就是「挪用Hello Kitty以产生各种反抗与颠覆的意义」。譬如，一个上课打手机聊天、调情的广告，「有唤起学生抗拒不合理规定的权利意识之潜在可能」。当然，包括青少年「做身体」、嗑药、援助交际等，卡维波都看到了「抵抗论述」，「几乎无处不是战场」。

卡维波还演示了另一个「挪用」的范例。那就是把〈青春睿智卡维波？〉文章标题中的问号悄悄拿掉，「青春睿智」从反讽变成赞颂，然后，堂而皇之地挪用到自己的头上。由于卡维波在论战中的拿手招数是频繁地将「老化」、「弱智」、「痴呆」、「空脑」、「懒惰」、「无能」、「没有学问」……等诅咒性形容词抛到对手头上，因此，在文章

中要证明自己「青春」、「睿智」、「聪明」、「脑满」、「勤奋」、「能干」、「饱学」……就成为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任务。当然，对于像卡维波这样以「机器战警」做为人类未来理想的好莱坞影迷来说，在「梦工厂」里，一切「不可能的任务」，都可以「可爱」名之。

对于卡维波所不屑的「传统左派」，当然还少不了如预料之中的「化约」、「教条」等一阵乱棒。马克思在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时，曾经写道：「如果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其中，「英国人」是指搞经济的李嘉图，「德国人」是指搞哲学的黑格尔。如今，卡维波既不搞经济也不搞哲学，只不过，他在搞怪搞笑的同时，倒是把观念变成了棒子。

我在〈青春睿智卡维波？〉一文中已指出，「化约论」或「教条」的指控，既是绊倒左翼的陷阱，也是消解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利器。就像斥责对手老化、弱智以凸显自己「青春睿智」一样，卡维波似乎也认为，只要抛出「化约、教条」，就足以反证自己的思维是如何的「缜密、灵活」。

很可惜，卡维波的手法常常是粗糙地「化约」对手的观点，拙劣地将几个人云亦云的所谓「教条」概括他自己并未曾深入的马克思理论。关于消费与通俗文化，卡维波主张要「摆脱那些简化教条的说法，重新看待像减肥美容的媒体风潮、凯蒂猫、偶像追逐等等通俗文化与消费现象」，他遗憾台湾的相关讨论，「完全没有跟上文化研究这一、二十年来的发展」，而「英国文化研究的缘起其实就是对经济化约论（也就是马克思的经济下层决定文化上层）的批判。」

他说，「自从社会主义国家崩解，传统左派路线不再是一个有效选项而只是一个有效修辞。」卡维波如此急于宣告社会主义的失效，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和李泽厚的「告别革

命」说，看不出有什么差别。而他以经济决定论来「化约」马克思的思想，事实上是西方右翼学者自十九世纪以来的陈腔滥调，关于这一点，博学强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郑国栋所写的〈跳蚤「左派」的满纸荒唐言——评陈芳明的所谓左翼台湾史观〉一文（见《左翼》第15号），已有明晰的批判，我不再赘言。

## 不要让问号消失！

就像〈青春睿智卡维波？〉的重点是在那个后来被卡维波「化约」掉的「？」号一样，做为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我对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态度，可以很简单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不要让问号消失！

由于对既定体制的恒常质疑，对异质的、可能的替代方案的追寻，我们面对当前社会中一切障眼法、腹语术，忍不住要去戳穿；当许多人被快乐、希望、春天、花蕊、有梦最美……等甜蜜音符催眠时，我们很不幸被惊醒。我们不可能像卡维波所说的「当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处于商品消费与通俗文化内部的今日……还假装处于商品消费与通俗文化外部之某个战略高地」，我们只是有意识地「身」在其中，而不愿「陷」在其中。对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权力」与「钱力」交织的庞巨阴影，我们可能更为敏感，对于消费行为中的商品拜物教以及通俗文化中的偶像崇拜狂热，我们感受到更深刻的荒谬与荒凉。

当然，在卡维波的认识中，这一切都可能被「挪用反转」，而形成「零星的反抗」。卡维波基本上还是把对既定威权的挑战与挑衅视为一种价值，这是左翼进步论述的基础，但是他又很不屑地把所谓「传统左派」打为「成年痴呆」，是「青春」的反面，是青少年的对立面。比起文革红卫兵的「造反有理」，以及法国1968年学运的「禁止说禁止」（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卡维波所颂歌的青少年，也许稍显



苍白，但是由于拥有打炮的凯蒂猫玩偶和有WAP功能的个性化手机，他们的叛逆形式似乎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卡维波以「拼贴」(bricolage)来形容青少年通俗文化，事实上以他所举的例证，与其说是拼贴，不如说更像是「万花筒」(kaleidoscope)：随机聚散、偶然、不沾黏，基本上局限于一定的空间，变化万端，但绝不出格。

## 遗产与阶级再生产

卡维波采用「年龄政治」的观点，以二分法区隔「青少年」与「成年人」的世界，前者睿智进步，后者痴呆保守，彷彿世代之间是断裂的，彼此各成自主、封闭的领域，完全忽略了遗产与阶级再生产的关系。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世代之间的传递继承，更甚于同世代不同收入者之间的横向摊派。一个自幼即拥有数千万长辈赠与的陈家待嫁少女，我们很难期待她参与反高学费的街头抗争；同样的，一个不用当兵的青年医生驹马，与陪同失业父母到劳委会门口埋锅造饭的待役或待业青年，大概也很难期待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立场。无差别地看待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少年，就像当权者声称要同时保障东京贵妇金美龄和慰安妇阿嬷的「言论自由」一样的虚妄；林肯是这样做比喻的：狼和羊都同样追求自由，有人或许因此满足于两种动物之间消除了差别，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狼要的自由是吃掉羊，羊要的自由是不被吃掉。

卡维波以同样的二分法区隔「通俗文化」与「高等文化」，他说：「高等文化的创造者是少数的一群文化菁英或艺术家；通俗文化的创造者就是大众，人人都是艺术家，这是集体的努力生产的结果。」然后，卡维波又借用文化研究的观点，将通俗文化与商品消费联系起来，指出通俗文化是「大众主动消费商品的结果」，他说，「所有消费

几乎都是文化实践：人们在消费中积极主动地创造或维持某种身分认同（个人或集体的）……消费不但是经济活动，也是交往与对立、形象与认同、梦想与安慰。」

卡维波一方面将消费行为无限上纲，另一方面又将通俗文化移入圣殿，他强调通俗文化的「拼贴」风格即具有反叛的因素，「将符号象征从其原始脉络抽离，商品重新被串连，这是个自我定义的活动，从原初意义或生产者的意图自然形成抵抗，并很容易在被压迫的情境中产生反对意义。」

卡维波的分类和定义，无疑是导引向「青春就是美的，流行就是好的」这种整体主义的观点，青少年通俗文化反可能因此走向民粹、媚俗的方向。青春固然是值得赞颂的，但是，对青春和「现此时」（the present）的过度揄扬，却也可能造成对历史和「既往」（the past）的轻忽和蔑视。近年来，日本否定侵略战争的漫画书动辄销售上百万，右翼势力在漫画世代中声势浩荡；美国选出了被认为对历史极尽无知的鹰派总统小布希；欧洲新法西斯政党在法、义、比、奥等多个国家崛起……多位学者已指出通俗文化与民粹主义的依存关系。同样的，流行固然是可欲的，但是过度追求流行也可能产生神圣化收视率、眼球数、销售量、民调支持度的结果，台湾这几年来政治和媒体的民粹、媚俗倾向（政治人物、影视明星竞相「装可爱」），与整体通俗文化的气息和温度明显是相互感应的。

## 蹦极游戏

大教授卡维波这篇占了《左翼》30余页篇幅的长文，华富炫丽地点缀着文化研究、酷儿理论、后现代的学院名词，如此彷彿肌体刺青一般醒目耀眼的文字，一方面展现了「青少年通俗文化」逐浪追潮的风采，另一方面，在骂起「那些没有学问的空脑批判家」时，显然

更为铿锵有力。只不过在这个生活方式选项超市化的现代社会，在这个诸说混同的新时代（New Age），在这个蛮横、猎奇、高效率的新自由主义与恣肆、享乐、嬉闹的新自恋主义难分难解的新世纪，他惯性的二分法思维模式，以及奔赴既定事物另一个极端的叛逆典范，不禁让人想起高空弹跳（中国大陆称为「蹦极」，是更形象化的用语）的游戏：一个可爱的左派，在山顶和山谷之间迅猛起落，其间充满了刺激（刺眼激进）、惊骇（惊世骇俗），但是游戏者知道身上很安全地绑着坚固的绳索，他很清楚自己终究会回到山顶的「控制台」，擦擦冷汗，卸下绳索，然后，出发寻找下一个玩乐的景点……

——原载于 2001 年 4 月 30 日《左翼》第 18 号

# 反卡维波论述提纲

汪立峡

卡维波在《左翼》16号和17号上发表了他反驳林深靖的长文《青春睿智卡维波》一文见于《左翼》第15号。我猜测对于卡维波这篇长文，恐怕没几个人真正从头至尾，一字不捺的仔细读过。卡维波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根据我耐着性子细心披阅的结果，大致而言他说了四个方面：(1)传统左派只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忽视生产过程以外的消费文化领域(2)消费／通俗文化现象并不都是资本家意图的实现(3)消费／通俗文化领域本身就是战场，在这里可以通过想像力和创造力，挪用和转换商品原来的意义(4)激进社会应该介入，挪用消费／通俗文化的意义，并进一步转化为政治行动。

本文不打算就卡文的繁琐论述逐句评论，那种吃力不讨好的纠缠混战，只会让读者认为是两个无聊文人在意气斗嘴（尽管我所作的夹批和札记加起来的字数不会少于卡文）。我只想提纲式的说说我的看法。

卡维波说他撰写那篇长文的目的是「要丢出一些新的思考资源与论述，提示人们寻找新的抗争路径」，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来研究分析一下他是否真的丢出了一些新的思考资源和提示人们寻找到了一条（或某条）新的抗争路径？

## 一、马克思主义传统与性政治

卡维波在他的文章中一再攻讦左派（不管是「传统左派」或「台湾

左派」)不懂性政治和年龄政治,似乎只要任何左派没有像他那样重视(或正视)消费文化的「挪用」和「抵抗」效应,就是无视于性政治的存在。卡维波这种自以为抓到左派「把柄」的讥评论调,不仅对别人有欠公平而且暴露了自己的知识傲慢。

任何的约略涉猎过马恩著作的人都知道《共产党宣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或多或少谈到了性与阶级政治的关系,而且被公认是「性政治」论述的源头活水。这表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突出生产领域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但也并没有忽视性/性别在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与意义。

在马恩之后,马克思的几个女儿以及罗莎·卢森堡甚至列宁等人也都可算是性政治的奠基人。更特别的一个是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就高倡「性政治运动」,将政治解放和性解放结合在一起。赖希率先提出「性革命」能「成为新社会的助产婆」,能制造新的社会形态。为青少年的性解放振臂疾呼的也要数赖希是领航人,在赖希看来,社会对青少年的性压抑的严重性和残酷性超过了对社会任何一个阶层的性压抑。他甚而要求给青少年提供法律保障,以反对双亲、教师和政府当局的「性暴政」,还主张为青少年的性满足创造方便,包括为青少年实现性要求提供必要的场所和工具。

赖希于二十岁那年(1927)加入奥地利共产党,此后即以精神分析学家和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从事活动。他不只是嘴巴说说而已,更亲身参与德国工人运动,在工人群众内部发动了一场「性政治运动」。赖希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仅从生产领域着手还不够,必须在生产领域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场「性革命」,他相信「性革命」是摧毁现存社会的一颗重磅炮弹,可以作为阶级斗争的补充。

不论从理论的创新还是实践的激进来看,卡维波这类性政治论

述者都难于说比上个世纪初的共产党人赖希更为超前。其实，卡维波所津津乐道的那一套观点源自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所谓「激进民主」流派，卡维波和他那一伙人偏好叫作「人民民主」（关于这个「人民民主」在下文我还会多说几句），「性政治」则是激进民主的论述策略之一。这一派的观点和赖希最大的歧异在于他们排拒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生产领域和阶级斗争，认为人有许多欲望需要无法纳入经济范畴内被解释，性的欲望需要和身体管理的欲望需要就是他们认为最显着的例子。这一派主张消费文化领域以及属于这个领域中的「性」和「身体」等问题，可以独立于生产和阶级领域之外自行运转并产生「自我建构意义」的能量。舍此之外别无新意。

## 二、「到处都是战略」，但问题是：敌人是谁？

卡维波们自称「文化激进主义」或「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十分相信在消费通俗文化中「到处都是战场」，认为资本家无法垄断商品所意图生产的意义与认同，相反的，任何商品消费的意义都可以不断地被挪用与转换，甚至形成对抗或抵抗的意义与认同，远远超出资本家的意料之外。卡维波为此列举一些电视广告、流行歌、网路情色……为证，不认为青少年消费者「被洗脑」或被创造出「虚假的需要」。他还特别以一则手机广告说明「广告商比左派更深入学生生活」，「这个广告也有唤起学生抗拒不合规定的权利意识之潜在可能」，「此外便是激进社运可以而且应该介入的地方：把手机文化更进一步地转化为政治行动」，而他所说的「政治行动」不过是「唤起青少年的反抗与权利意识，制造真正的矛盾与官式文化管教上的困难」。

如果卡维波真的相信如此这股「挪用」商品的意义及其所产生的

「对抗」作用，就可推进他们所向往的「人民民主」，那么这个「人民民主」必然落得「资产阶级民主」的下场。这是不是把话扯远了？是有那么一点。话得绕回到文化激进主义所执着的消费通俗文化战场来讲。一个远离生产过程和经济，孤悬在外的消费文化战场，所能实现的「民主」是什么属性呢？

「民主」的定义从它的源头，即古希腊城邦政治来讲，指的就是多数平民统治的政治，相对的则是少数统治的「寡头政治」。而历来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喜欢民主，因为那意味着把权力交还给人民大众，包括政治权力和经济生产权力。法国大革命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英国是另外一个例子）在面临新兴无产阶级要求民主的压力下，端出了政／经分离式的民主，即在政治领域给予人民「民主」，在经济领域仍然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泾渭分明的「绝不民主」，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说到这里，话已经很清楚，连系到卡维波们在自绝于经济生产领域而致力于消费文化领域的「挪用」、「抵抗」战场时，所能企及的「人民民主」充其量也只能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内打圈子。

### 三、「挪用」的迷思与实际

我们现在来谈谈消费／通俗文化战场的「挪用」效应问题，因为这关乎到卡维波所说的「性政治」、「年龄政治」以及「性」和「身体」论述的核心策略。

卡维波承认学校、家庭对青少年是一种「师长规训」，商品市场对青少年是一种「消费文化规训」，又迷信后者可以「挪用」来「抵抗」前者，试问，既然两者都是「规训」，以其一对抗另一，其间青少年的「自主」究竟是什么属性？卡维波喜谈辩证法，请问在这种不断被「挪用」的「抵抗」与不断被「收编」的「抵抗」之间所产的自主性，还是

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主人-奴隶」关系的辩证颠倒？或只是「奴隶-奴隶」关系的形式变化而已？卡维波是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他所信奉的「挪用」原则，实际上是一个无止尽的同义反复「怪圈」罢了。

#### 四、只见「身体」，不见历史

卡维波同林深靖的论战是从「做身体」（塑身）开始的，按照卡维波对「做身体」的定义并不限于「塑身」，举凡戴耳环、刺青、养生、慢跑、打坐、洗澡、修指甲、化妆、做头发、打扮……等等，都包括在内，总之就是「身体管理」。既然「做身体」是这个意义，那么可见「做身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做身体」的花样，并非如卡维波所以为是「晚期现代」或「晚期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古已有之的现象，历来都同年龄阶级、身份、地位、财富有不解之缘。晚近的「身体」理论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关注最多的事物之一，西方国家书店里充斥着这一类的东西。过去的列宁主义者现在是彻头彻尾的拉康主义者，每一个人都从生产领域转向「性政治」；切·格瓦拉的社会主义也在一夕之间让位于福柯之流的「身体论」。性和身体现在已经变成所有时髦东西中最时髦的一个，而且从私领域进入了公领域，举目所见几乎都和「性」与「身体」有关，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顿（Terry Eagleton）所指出的：「对身体健康的关注现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精神疾病」，若说这是「性拜物教」的结果也不为过。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无论现在或过去，「身体」不管怎么「做」，只是一个反映特定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而已，从来不具有被卡维波以后现代思维所描述或所指望的「战场」性质和作用。当然，在卡维波们看来，这种论调「厌烦了！」「了无新意！」，但是事物的发展和事情的真象会因为你们「厌烦了」而改变



吗？一个理论的有效性会因为你们认为没有「新意」而失效吗？若是把每个时代都会有的青少年与成年人的紧张关系，即青少年对成年人「规训」的反抗表现说成是「性」或「身体」文化的「挪用」与「抵抗」，甚至是对体制的潜在变革力量，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吧！

## 五、究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还是「虚假的需要」？

卡维波在文中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卡维波的原意是想利用这段话来否定有所谓「虚假的需要」的存在，即需要根本没有真实和虚假的问题。然而，马克思这段话的前提明明指的是「必不可少的需要」，不知是卡维波没看清楚，还是故意忽略了？「必不可少的需要」当然是真实的需要而不是虚假的需要。但是，「必不可少」并不是任由个人主观决定的，而是「历史的产物」。卡维波显然把这段话错误的理解成只要工人阶级有怎样的习惯和生活要求，那就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关键端在于什么是历史的产物？这一提问的重要性是在指出「虚假的需要」也会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并不是只会制造真实的东西，这是常识。所以「必不可少的需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是「虚假的需要」。

这个问题有点类似关于「自由的选择」争辩，有没有「自由的选择」这回事？人们总以为有自由的选择，因此就算我们明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也必须假装有自由的存在，因此很多选择事实上是强迫性质的。

卡维波在另一处还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指涉商品交换活动和商业人际往来的「交往」（intercourse）概念。「交往」这个概念用来描

绘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和消费文化的全面图景：复杂、多样、虚假、迷惑，以及进步的一面……的确比「交换」、「沟通」、「消费」、「交易」这些概念更周严、更精准，这在卡文关于这个概念运用的长段描述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概念同青少年消费俗文化的「挪用」策略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由卡文本身的论述来看，「交往」概念适足以证明「挪用」的无效性，而不能证成「挪用」的「抵抗」效应。实际上，「交往」概念更容易帮助我们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著名的命题。

## 六、异化的当代形式：对日常生活的普遍控制自觉的反异化斗争是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卡维波一直强调「积极介入与挪用消费与通俗文化」，大有将此策略视为变革社会的突破点的意味，因此在他的论述中令人讶异的发现，似乎媒体广告都潜藏有革命的信号，而青少年俨然都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下党，这究竟是他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天真幻想，还是理想主义的冲动焦躁？卡维波相信「意义」无法被霸权宰制，也不会被「反对／抵抗」的任一方所独占，这话没错，但又如何呢？《爱拼才会赢》这首闽南语流行歌曲早被工人运动「挪用」为「抗争」意义的工运战歌，但任何一个工人都知道仅凭这首歌曲是「赢」不了什么东西的，决定输赢的到头来还得看阶级意识的觉醒程度和集体战斗意志的坚决力度。连生产领域的工人运动在「挪用」消费文化的意义时，都只能止于「挪用」作用的本身而已，更何况茫茫人海中不特定的青少年呢？

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例如卢卡奇就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文化逻辑中，不论是谁，也无分男女老少，都挣扎在由资本和商品所控制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现今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和通俗文

化中，充斥的大量扭曲和支离破碎个性的异化现象以及空虚感和无聊感，正是卡维波所再三颂扬的「挪用」、「错置」和「颠覆」，用卢卡奇的话来形容：「正是这种生活的表面上的无忧无虑的产物，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必然造成的令人感到日益压抑和无聊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否认「压抑」、「无聊」、「焦虑」或逃避性的「欢娱」……等等异化现象潜藏着变革现状的可欲能量，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化现象通常是以扭曲的个性，通过寻求刺激、冒险、麻醉、放纵、作怪……等行为表现出来，扭曲的和支离破碎的个性无论怎么「挪用」既存文化的「意义」，都无助于其重塑「完整的个人」的个性，只会加重个性的扭曲和异化的内在化而已。

作为当代左派的严峻课题，首先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形成的巨大文化矛盾和异化现象，以及这些矛盾现象的产出根源规律和人们身处其中的困局，从而激发人们自觉的反异化斗争的热情和勇气，为重塑完整的个人和个性而战斗。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文化战线的反异化战斗绝不能是孤立的，它必须同时和反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政治斗争与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可预期的效应。关于这一方面的看法与策略，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只好留待必要时再写了。

——原载于2001年5月31日《左翼》第19号

### 三、女性主义的 身体政治



# 塑身运动、厌食症到胖妹骄傲 的思考

——一个女性主体与女性身体的提问

黄咏梅

## 前言

本文以网路电子布告栏的减肥社群与胖妹家族作为田野观察对象，试图从女性塑身行动中并发的厌食症现象、与以「性感胖妹」为其认同集结的讨论板，探询女性主义历史中女性主体与客体化身体的古老命题。文中欲处理两个女性主义路线的典型冲突：一是情色女体的主动性与客体化问题，二是女性关照自己身体的独特感官与多元行动／解放策略。简而言之，本文要回应的是几年来台湾「国家派」妇女团体与「市场派」妇女团体的典型争论——在「政策妇女团体」们不断要求更严格的情色管制、强力批评平商业媒体煽动年轻女性的瘦身风潮之时，另一派的「解放妇女团体」则几乎全然的站在此般政策建议的对立面，强调情色女性、塑身女体对年轻女性在抵抗传统父权的解放之路上之积极意涵，并指责压制色情的政策路线与父权传统同构的反动性格。在这样的争议之下，女性个体如何对待、管制、打造、形塑自己身体，以及此间真实行动的内涵与感受便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本文欲处理的重点。针对这个部分，本文从塑身主体、以及塑身知识所并发的厌食症现象中（注1），关

照出的是一种不同于政策女性主义所理解的主动与抵抗意识，也从「胖妹骄傲」的集结抵抗读出一些商业贯穿的塑身意识之压迫线索。塑身认同与胖妹骄傲所标定看似在光谱两极的两种主体、以及期间的流荡反复、交迭暧昧与不确定性，是本文所欲觉察反省、并与既有之女性主义相关论述产生对话的主要关注。

## 肥胖与过瘦——医学与社会「问题」的范定

2002年11月19日，实践大学营养系系学生会组织的「肥胖纠察队」，在媒体采访下以行动剧宣誓「将肥胖赶出校园」，并在校园当中随机拦下一位小胖妹，将之团团围住并众口一心的询问：「请问妳不觉得妳太胖吗？有没有想要减肥呢？妳知道肥胖对身体不好吗？」小胖妹因此被吓哭。这个相当煽情的画面首度正面引发台湾媒体关于「肥胖歧视」的讨论，以及网路上大幅动员的邮件抗议行动，事后实践大学校方亦为此事公开出面道歉。

「肥胖纠察队」事发隔日，联合报（11月20日）便公布了一项调查数字，新闻标题为：【大学女生过半太纤】。内文引述如下：「政治大学大一新生的体检结果发现，91学年度新生中，有39.59%的女生体重过轻或瘦弱，男生体重过重或肥胖的比率则有33.9%。清华大学大一女生体重过轻的比例高达51%，体重过重比率只有6%。淡大则有44%女学生体重过轻或瘦弱，体重过重者约占12%。」而根据1995年的十大广告商品排行榜显示，瘦身美容业的广告分占了当年排行榜中的第一、三、四名（注2），由这些广告所主要诉求的对象（年轻女性，而非医疗单位所经常性发出警告的「过胖」群众）观之，这里所显示的问题便是我们媒体所强调与打造形塑整个社会对「肥胖」的高度关注，与此般调查所呈显的事实之间的高度落差——最被视为与「减肥」

议题相关连的族群恰巧就是那些已经医学过瘦的族群。

同样的结论可得之于本文在网路减肥瘦身社群的观察——可见的、在网路上积极交谈分享减肥心得或方法的使用者多半以大学在学、体重低于医学标准（注3）的族群为主，「医学过重」的比例反而相对不常见，甚至有相当的一部分成员「有意识地」表现有饮食失调（厌食／暴食症）的部分征状。

此间社会对待女体的「集体暴虐」现象事实上已是数十年来女性主义者高度关切而且讨论繁多的问题——女体总在受压迫。然而我们首先注意到的却是「医学」在此出现的两面性：它可以为我们范定一个「科学的」健康范畴、范定何谓过与不及、定义出科学有效的减肥方式、也定义出「失调（失规范）」的减肥或节食行为（厌食／暴食症）；但同时以有系统的医学知识为基础的身体控制论述也为所有我们所熟知的一整套繁复的塑身美学／道德／技术框架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与支援。也就是说：所有将塑身风潮视之或斥之为非理性的流行拜物、或甚至性别压迫的论据，其实都来自于医学标准所提供的知识与证据（塑身「有害」身体健康）；但吊诡的是，所有构筑这个塑身风潮的行动、与行动背后的支援与基础也都是来自同样理性与标准的医学知识，而医学定义下的「厌食症患者」甚且经常是最娴熟这一套知识与技术系统的人。

若先搁置关于女体与男性凝视的权力角力，转而谈及现代性的「身体与认同」时——纪登斯认为在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当中，身体之所以可能成为一个解放的场所，在于个人与身体的持续反思与协商改造的过程所构作的认同关系（Anthony Giddens, 1991）——医学作为主体与身体相互介入与对话的过程，便非常具体的提供了我们一种接近当代身体图像或者身体作为「认同」场域的工具或媒介。也就是说，就目前我们所可掌握的现象而言：作为集体的风潮，我们的



社会对于肥胖的高度关注（表现在媒体对年轻女体的关注，或者年轻女性对自己身体的焦虑）完全显露的是一种现实基础的匮乏（事实上，年轻女性大半过瘦）；而作为个体行动，这些看似荒谬或者「主体匮乏」的焦虑与被压迫关系则又吊诡地确实是一种「主体浮现」——个体有意识的经由身体去介入其社会关系或自我感觉的过程。「打造身体」的主体浮现，便是本文主要的问题意识所在。

### 「女体」作为压迫与反抗的论述操演

2000年12月18日，张锦华教授与其学生黄浩荣共同于中国时报发表〈还童的女性？弱智的男性？〉，以媒体作为父权压迫之体现的理解与基本立论，严词批判并揭露当时轰动一时，由「最佳女主角」美容公司董事长黄河南先生重金斥资所拍摄、以十三岁女星王瞳为主角的童话／化广告的「父权凝视」与「商品化（少）女（身）体」的邪恶真相，也带出了一阵妇女团体积极撰文抗议资本家对「童女」身体的剥削行为的热烈讨论。

这篇明确标示以商业／父权剥削为其主要批判对象的评论立即引爆了台湾女性主义内部激烈的左／右派论争（注4）——由自我确立为左派立场的女性主义批判与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为首的「性权派」女性主义的「性感权力」之号召，展开了一段长申论战（注5）。在论战主轴的文章中，左／右两造抢夺的看似是身体自主权的意义与论述范畴，但当我们将此争论置于女性主义更广远的脉络来看时，更容易发现的却其实是国家父权与商业父权之一体同构的两面性——卡维波用以直接反驳张锦华论点之〈老化的媒体批评·弱智的女性主义〉一文中明白指出：媒体监督、控诉剥削式的女性主义批判所复诵的压迫图景，实际上正是恰巧扣合上「父权凝视」的女体观看角度（只看到女人的胸部与女体的性意象、只关注男人对女体的关

注），并同时与「父权结构」对女性身体的压抑与限制（不能直视自己的身体、不能卖弄、不能展示）同构了。这样的发问立场与其自我标举的「性权派」立场——支持各种性与性感实践、拒绝与对抗国家介入、或者反对反色情（因为所有反色情都必须涉及并诉诸一种国家权威的监视）——其实是相当脉络一致的，女性的敌人是作为「父亲」同时作为保护者与管制权威的国家角色。然而若我们反向发问，其实也就如林深靖或者黄宗慧等人隐约指出的：此般拥抱青春女体的性感想像所立基的、对国家权威的抗拮其实也同样吊诡地导向了与商业父权之女体崇拜的谋合（反抗的身体居然是要丰胸细腰性感惹火的）！在这个「反商品化」的立场中，女性「真正」的敌人则又应当是作为剥削利用女性身体的窥淫者。国家威权与商业市场各自占据压迫与剥削的两头，「女性」在这之中似乎再也冲撞不出真正有效的反抗空间。

因此就女性主义内部论争而言，左／右派的划分与争执实际上是对「敌人」之认识的论争，而非对主体界线的争夺。「谁才是主要敌人」，乃至于是谁必须与其联合之的次要敌人，这正是奠基于女性符号作为集体反抗的政治或运动想像。赖英宏在关于瘦身议题的女性「主体型构」的讨论里便开宗明义的点出，这场论战的焦点所触碰的应在于女性主体的「代表性」问题——谁可以代表、定义「女人」这个类属？是拥抱瘦身、从瘦身行动当中得取快感的女人？或是拒绝瘦身、天天自觉被媒体的瘦身讯息所压制所强暴的女人？（赖英宏，2000）如果说揭发瘦身广告的剥削性质之论述观点所导向的行动结论只能与国家父权对女性身体的压制一致，而从日常生活实践对身体的介入改造、继而赋权（empower）女体性感权力的结论也只能跟商业市场所要求的合格女体一致，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女性主体（行动）与女性身体（身分）之间变貌多样的辩证关系？

事实上，女体的持有者——「女性」——本身若果不以「男性凝视」为其生活中主要的困扰与压迫来源，那么女性主义长久以来对「父权」压制、扭曲女体的说法究竟还能够到什么意义上是真实的？这就相当有可商榷的空间。本文因此不拟将焦点锁定在「真正的」女性意识之探求或者对「真正的」父权压制之揭发，而试图借由对「常民论述」（everyday accounts）的接近与对「瘦身」或「反瘦身」两种女性主体之自我陈述的直接观察，试图描绘、拼凑起女性意识在性感实践并同时抵抗「男性凝视」与「父权管制」的行动原貌。

## 田野选择与观察意图

本文所设定之对女性行动的观察场域以两个BBS（电子布告栏）讨论区为主，一是以瘦身资讯、瘦身心得交流为主的汪汪大学BBS站台；一是设在KKcity之下，以各种性弱势之认同与解放政治的诉求为号召的【花魁艺色】成人站台内的「胖妹板」，分别作为取得瘦身主体与反瘦身主体之日常自我陈述的观察空间。

「汪汪大学」是一个其下设有百一十四个包含各式生活资讯与娱乐交流功能讨论板的站台，按照讨论板性质的「群组别」分为「体育学院」、「生活学院」、「娱乐学院」等等二十个类属，其中每个类属下分别有三到七个讨论板不等，唯有「医学院」当中几乎清一色的瘦身资讯交流板占有十九个板面之多（注6），讨论食物热量、塑身运动、饮食障碍、节食菜单、减肥心情等等。简言之，这是一个可以被当作诸如「戒酒团体」般成员彼此之间相互鼓励、提供建言，共同为减肥目标努力的社群形式，成员在这当中纪录心得或进度、也相互给予生活上的支持，或者抱怨生活感情工作，交换各种「女生的」讯息。本文这部分的观察约莫以【1LoseFeeling】减肥心情、【1BulimiaNerv】饮食障碍、【1LoseDiary】节食日记、【1Losefood】饮食讨论（注7）等板面文章

为主要的讨论对象。

KKcity号称为一个BBS「城邦」，内设有分站系统，下设诸多理念不同的分站站台，当中有两个成人站，一为【花魁艺色馆】、一为【天龙古堡】。花魁艺色馆是一个显着以各种性解放运动为其宗旨的站台（注8），也是这当中每日出入人数及文章数量较多的站，设置于其中的【Fatlady】胖妹板（注9），则是在进板画面明文以「促进胖妹之力量、平反肥胖之污名、建立胖认同」为其建板宗旨，讨论板则以聚集胖妹成员，讨论分享生活各种话题：饮食、购物、健康、感情、工作、家人朋友的相处或者因为身材而经常遭遇的特殊处境、应对策略等等。

资料搜集的进行方式以讨论区板面的记录观察为主，不拟以与成员的私下互动作为访谈网络分析材料。由于网路讨论板属自发集结，其中「社群」成员彼此之间日常互动的性质在此作为一个承载常民论述的空间被看待，我们从所选定的网路空间中企图取得的，便主要是瘦身或反瘦身女性在此般日常脉络中、经由「身体」所形塑的自我观感与关于其行动选择的自我陈述。由于本文的发问意图不在于女性主体的「代表性」问题，亦不在于寻找出正确的、因应于身体策略的「女性集体」（或者「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所应该选择的身体立场（瘦身或反瘦身），因此这些观察纪录的主要用意亦非在于揭发一个样貌一致的父权压迫痕迹而谴责之，而是在女性主体真实（有时看似相互矛盾）的行动选择中，探求其「主体」体现的样貌与过程。

## 抵抗与摆荡——瘦妹忧郁与胖妹焦虑

### 壮烈史诗般的瘦身故事——「审美医学」的行动理性

所有对女性瘦身风潮的批判性研究几乎都共同指出媒体形象对女性瘦身行为所造成的重大影响。研究亦指出：对女性身体纤瘦、骨感为美的主流审美观实际上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趋势。1920年代

服饰宣传由图画改以真人照片在大众媒体中出现的商业行销模式，形成了身体被服饰／流行所定义的风潮与基础（Gordon, 1990; Orbach, 1993）。女性身体的「纤瘦但健康」成为年轻、自由、挣脱束缚、不受拘束的象征与流行趋势更在1950、1960年代之后便不再违反（Orbach, 1993）。到了1980、1990年代之后，电视女星敢于长出且秀出玛丽莲梦露般丰腴肥白的手臂的景况——尽管那以当前的影视标准看来过于多肉的身体其实也已在医学标准体重的标准之下（注10）——更是不复见。

「纤瘦但健康」的理想——时尚美学与流行医学共同打造的「健美」神话——于是可见诸琳琅满目的健康食品／减肥商品的广告模式，可见诸纤瘦骨感的女星们一遍遍代言所有健康与活力商品、体育或所有歌颂青春征象的价值与意念：诸如三度代言乳酸菌饮料、为职棒冠军赛拍广告的萧亚轩（注11）；拍运动饮料、优酪乳广告，并是区运代言人、拒烟之星的张惠妹（注12）；以健美形象著称并同是拒烟大使、乳酸菌广告明星的李玟（注13）等等。女星作为美丽标准的具体形象、参和了商业系统活力十足地打造所有正向特质不断复写于其上，成为所有瘦身女孩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放弃的强烈欲望。在汪汪大学【1LoseFeeling】板当中搜集了数十位当红女星的身高体重资料，作为女孩们订立减肥目标的依据（注14）。资料中所显示的除上列「健康」形象的女星体重约莫在其标准体重值下限之下的五到七公斤之外，无论以美貌著称的萧蔷、青春有型的ASOS或者新瘦身典范蔡依琳、孙燕姿，「正常」的美学身体（也同时标志着健康与自信的）几乎都在标准体重值下限之下的八到十公斤左右。这个「标准」打造了汪汪大学减肥女孩们的最终极梦想，【1LoseDiary】板中的身高体重变化纪录常见如「迈向41公斤」、「讨厌的46公斤」、「让我成为骨感美人吧」之类的宣言。可观察的是，这里所有热中减肥的女孩子都对外貌高

度敏感、对「健康的」体重标准值几乎不屑一顾、体重在正常标准值内的女生经常自称小胖妹。没有人想要依赖或遵从正统医学所提供关于健康的建言：「我」才能决定我将成为的样子、「我」知道我几公斤叫肥、几公斤是「健康」、「我」将用我的方式达到理想——这些我所知道的事情医生不会知道。

「健美」神话的全部内容于是成为一个几近荒谬而巍巍颤颤、却也坚固又牢不可破的三一律：美感、医学与道德三者合一、汇集在「身体」这个独特的位格上。——让身体成为你的神，要具备足够的健康知识（广告医学、身体控制的技术）、毅力与自我控制的决心（「为自己负责」的现代性道德律则），女人便可以将身体（自主地）维持在「医师建议」的健康体重下限之下（至少，五或六或七公斤吧？），成为美的（但却无论如何都是不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瘦、纤瘦但健康的任务，成为身体作为自我整合场域里头最困惑人心的命题、最艰苦的战斗。当媒体间所有令人艳羡的美少女都被连结上了青春与健康、成功与自信的一切价值之后，医学标准体重的「健康」定义则变成一个需要在瘦身实践当中被戳穿、克服，或者忽略、超越之的虚假命题——使我们美丽的那个「健康」才是真实的健康，视觉可辨识的肥胖身体（尽管在标准体重之内）则需要动用一切（已被广告化的）医学知识／技术加以矫正之。

健美神话于是构作出了两个层次的操作原则：「健康」是技术性问题和、而要达致这个「健康」则需要严格的感官训育——这就是一个切切实实的道德命题了。【Ilosefood】板上首先充斥着各种食物热量换算的知识交流（怎么吃可以最「节省」热量？），再则就是如何在无损及「减肥」的大目标下解决、克服过瘦所并发的月经迟滞、骨质疏松，以及营养不良所引发的抵抗力不足、皮肤干燥等问题。而所有这些对健康技术与知识的认识，则就构成了所有感官训育、道德原

则的核心内涵：如何「正确」的感觉饱，如何敏感于进食、排泄与「洁净体内」的关系（排泄与干净的「感觉」需要从反复的经验练习当中提炼），练习在生理（对抗饥饿感）与心理（对抗食物提供的愉悦）上不需要食物——如果还是忍不住吃了，不要慌张也不要焦虑（慌张与焦虑的情绪是有害减肥／健康的——情绪的控制同样需要锻炼），要去运动（务实地消耗热量）。

这些技术知识的来源之广泛，遍及于西方医疗的系统性知识、中医或民俗疗法的各种秘方、也包括了报章杂志的各种减肥广告（所附带的技术性说明／咨询）、明星的减肥偏方等等，构作成整套的作息规律与「生活风格」的教条——要细嚼慢咽，因为吃得慢才容易饱；要躲避调味料，因为口味重会吃得多、且盐分导致水肿，要缓慢的感觉及「享受」食物、还要训练对「调味物」的敏锐（这样外食时才能分辨得出不能吃的东西）以及嫌恶感；早起要喝水（或黑咖啡或优酪乳）要找到让自己容易固定排便的方式；要在进食之后或之前的两个小时运动要持续半小时以上，心跳率要足够才是「有氧」且规律的运动、练习呼吸、练习喝水——这些是「健康的瘦」的基本内容，都包含了人必须训练自己可以「感觉」身体变化的能力：感觉食物进入身体、感觉肠道排便的征兆或反应、感觉运动与饮食的关系。进阶则包括了如何面对月经前后的体重波动（注15），如何经由刻意食疗的补血或者有效地吸收钙质来弥补脂肪流失可能导致的闭经、月经量减少或者过瘦所导致的骨质疏松，如何解决因为吃得太少、肠道蠕动过慢而可能导致的便秘（且便秘又是减肥的大忌），如何经由运动让身体变得（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强健有活力，如何度过长期因为种种禁欲规范所引发的沮丧感（比如适时「点到为止」地让自己吃一顿大餐），避免松懈饮食带来体重增加的灾难，让这些生活规范可以长时间的持续。

所以我们看到：「超佩服蔡依琳的，每天光吃苏打饼配茶叶蛋就能过日子（注16）」，「而且她吃烫青菜不加酱油喔，真是超强的（注17）」，而「郑秀文说她自出道减肥以来就没吃饱过一顿饭（注18）」则虽是典范但也不可取：「她好有毅力喔，但那样不是会把身体弄坏吗？」

从事女性美容手术研究《重塑女体——美容手术的两难》一书的作者Kathy Davis在研究中描述那些决定从事美容手术的女人（无论自我认同为女性主义者或者不），多半都有操作「交叉使用不同论述」（女性主义、身体主权、健康或审美、心理学或者自我认同的叙事）的能力，来说明为何手术干预外貌会作为她们当下生命情境中最好的选择的原因。在这个理解下所有对外貌的认知及干预选择都将使得这些女性确实的成为「行动者」：她们需要清楚认识情境，也需要理性作出决策。由此我们必须从新商榷一种「女性主义式」的传统批判立场，它将女人所有对这个社会之「美貌崇拜」回应、顺应的行为及现象，全都归诸父权阴谋或者女人对此社会情境失去理解与判断力的表现（Davis, 1995）。

我们引述【1LoseDiary】当中一位瘦身少女goya（注19）一天的饮食纪录做为此处的案例讨论：

goya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女生，在期中考的第一天，goya早上起床为了考试所需要的体力而喝了一罐鸡精，吃了一颗蕃茄与一片低脂起司，以在不增加任何不必要的热量摄取下补充蛋白质等营养素，但在两个小时之后因为耐不住饥饿与考试焦虑所以又吃了三颗芭乐。下午考完试后的五点半，冲进便利商店（在极短的时间内衡量满足饥饿与食欲的焦虑必要与所摄取的热量后果）买了一



个御饭团、一颗茶叶蛋、一罐老虎牙子，吃过后觉得很撑，可是仍然要按捺荒芜的想吃东西的情绪。再一个半小时过后忍不住吃了三包海苔，然后到学校操场跑两千公尺减低对食物的罪恶感，来抵销想要去催吐的紧张。

她的月经已经四个月没有来，医生说月经没有来的原因是她太瘦，她因厌食症定期在精神科门诊看诊，同时仍每天在减肥板post进食日记监控自己的饮食，她希望能再减轻三公升的体重，这个星期她的暴食复发两次，催吐一次，医生说她表现良好，她很高兴这周她的体重没有回升。

这可能是最典型的「健美神话」的实践故事之一。goya必须一面与体重拉距，一面与医生拔河：她所接受的厌食症治疗目标正是在于将体重拉回健康的标准值，而她迫于「月经已经四个月没来」的事实而必须服从医学对于「饮食障碍」的矫正——虽然，称之为障碍，但我们实在无法分辨「主体选择」在这里所扮演的意义或是否真的「无意义」。因之主体对于自我形象的理想在此处遭遇最惨烈的挑战：她选择表现得乖顺（医生说我表现很好），但持续地暗自往那理想迈进（体重一点也没有上升喔）。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尽管是在公开的板面空间贴「日记」，对这些神话实践者而言却都具有某种告解般的疗效：「ps.偷偷告诉你们喔，其实我的月经已经四个月没有来了，妈妈跟男友都叫我不要再减肥了，可是我还是希望再瘦三公斤就好。」（注20）在这里一切的脆弱或丑陋、一切埋藏在理想的外观下不能告人的无奈都可以放心的说：我偷吃了、我今天又暴食、我去催吐、我知道这样不好、我好讨厌我自己——而也都能得到支持与回馈。

我们试图以Davis的理解途径理解这些瘦身女孩，或者便稍可接

近「瘦身意识」的完整真相：这些瘦身女孩们所面临与思虑的，其实远远超过各种女性主义媒体批判立场所宣称的「瘦即是美」的「迷思」本身，而类似于Davis所称「英雄传奇式的自我叙事」。无论减肥或不减肥，这些女孩们在面临选择时都各有其对抗的东西（「昨天我发现以前的裤子都穿不下了，就和我的男友大吵一架，都是因为他一直骗我说我没有变胖才害我变成这个样子。」），对于生活情境中的权力不均衡、各自真实遭遇的「宰制」处境亦各有其判断与诠释（「我妈说我很笨，他一直哄我吃东西让我从辣妹变胖妹就不会有别人追我了，我就会被他吃死死。」），而她们对此类「对抗」也都能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我要把之前为我男友留的头发剪掉，也要把体重给减了。」）（注21）Bordo指出当代对理想身材的追求其实彰显的是对「控制」的追求，严格的控制身体与作息，意味的是去除掉身体中一切「多余」的物质（Bordo, 1993）。亦即，事实是：最惨烈的瘦身行动让女人感觉有权力、感觉生活得「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亦即身体不仅仅是身体，它攸关个体整体生活的成功与失败（「我决定要每天摇呼拉圈五百下、念书四个小时。」）。在这里，逆反女性主义一贯理解「在男性凝视下扭曲的身体」，我们几乎看不见瘦身女孩会同意自己减肥的理由是为了顺应那「男性凝视」——反而在板面上出现「男友（或爸爸或哥哥或者班上的男同学）嫌我胖」的抱怨时，几乎都会得到一连串「妳该如何反击」的建议——我的身体我评断。「做自己」做为现代性要求个人主动「构筑自我」的教条伦理影响着所有人，当然也是一样地在影响着这些瘦身女孩。

## 肥胖焦虑与胖妹战斗——「视觉道德」的对抗性认同

同样致力于女性整形手术研究的Kathryn Morgan则认为美貌崇拜、整形手术的巨大工业所体现的是社会对女体的殖民行动，也因

此女性主义立场对这整个殖民情境的回应就应该展现一种「反向实践」的抗议决心：拒绝消费市场所提供的美丽选项、提高「丑」的市场价值，乃至反向利用美容手术所提供的技术资源（把脂肪放到身体里增肥、增加皱纹、把乳房拉垮下垂而非现行的「集中托高」）（Morgan, 1991）。事实上，很多不同的研究与女性主义论述都出现过类似的、对于女性应当以「行动的拒绝」、构作不同的身体范型来摆脱媒体所建构之美貌神话、美貌宰制的具体建议（Chapkis, 1986; Bartky, 1990）：「反性感」意味着反对那在男性目光下被扭曲的身体规范——回归「女体本然」，或者想像一个女体本然，至少可以创造不同于男人要求的那种女性身体，几乎是这类论述的某种初衷。它所回应的是一个道地的政治问题：还给女体被剥夺的自由。而其所谴责的则自然是所有美貌崇拜的信服者，无论他是男是女、无论他是美貌的论断者还是实践者。

因此，回顾「提高『丑』的市场价值」（Morgan, 1991）的建言，便很容易发现其所反射的其实是一个战争姿态，它要求刺激「恶感」，以恶感作为挑衅——不是单单「做我自己」就够了，而且还要制造攻击，要让你（男人）讨厌、恶心，不惜牺牲（我本当有的）可能的愉悦。「去性感」是对「性感」所发动的战斗，诉求的则是女人的集体受害意识（我们是被殖民者），并创造出真正的敌方（他们是殖民者）——男人。

我们其实难以估算这种「运动」真正的效力：「真正的丑陋」对美丽的威胁会是什么？「真正的愚笨」对聪明才智的威胁是什么？在女性主义者决定「唱反调」之前，我们的社会真的缺少过那些不合乎主流美感的丑陋身体吗？然而「丑陋」的存在真的撼动过什么呢？若只是单纯地相信「唱反调」作为战斗的确实价值，那么女人对美貌的执迷崇拜，甚或「经由追求美貌而感觉有力量」就的确是个不可理解的

现象。只是，在决定采取这个姿态之前，我们其实必须首先面临的一个困难便是——如何确定谁才是压迫的真正「肇事者」？诸多不同的社会、人类的长久历史经历了多么多种不同形貌的女体崇拜，即使可以宣称所有的这类崇拜都必然导向对女体的压迫，似乎也难一言以蔽之的确定这些不同形貌的女体崇拜都来自于男人的喜好。如同在瘦身的段落里我们所观察到的个别女性经验：许多瘦身女孩甚至是在男友、父母的一致反对与说服之下仍然坚持要减肥。「打造身体」的行动同时也在打造个体的生活风格与生命型态；「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也同时意味着可以为自己负责、具有力量开创更好的生活。

于是有关「女体的自由」，来自当代媒体健美神话的压迫便可能需要更为复杂的理解与诠释：「纤瘦」同时作为性感（男性凝视）、自由奔放（社会崇拜的身体意象）、也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力量」（做身体、做自己）的展现时，「肥胖」——尤其是女性身体的肥胖——就会同时意味着这三方面的失败。亦即，我们很容易发现四方而来的谴责或歧视，男人的讪笑、求职或各方面生活的不顺遂、甚至于女性之间的谴责与排拒，就决不只是「男人的扭曲」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而还进一步涵括了「瘦」的「做身体」是为一个主体浮现、主体介入生涯与自我认同的想像，对比于胖的「不做」身体是为一个放弃姿态的道德意涵。

因此一个值得玩味的有趣现象是：【花魁艺色馆】作为一个宣称要「平反一切性弱勢」的情色站台，除了同性恋、跨性别等各种性少数的讨论板之外，不同形貌的女体也占据了许多的讨论区空间，这当中有「飞机场」（小胸部女生）讨论区、大胸部讨论区，却只有胖妹板而看不见对应之的「瘦妹」板。「瘦」的当然优势（其实想不出有什么好平反的）似乎也在这当中可见一些端倪。但「胖妹板」看似作为瘦身

教派的光谱另一头，所采取的却则是比Morgan的「全面战斗」更为迂回婉转的抵抗路径——胖性感、胖美丽、胖崇拜、胖活力、胖的正向价值。亦即，这里的反抗并不诉求对价值本身的攻击，而是抢攻「价值」所标定的内容与意义，松脱那些歧视的教条与他们自身特质的关联。

胖女孩战斗（如果要稍嫌武断的这么说）的对象与重心于是也不全关乎男性宰制，而是更复杂多样的生活情境——从生活经验的分享与讨论中长出对抗的行动策略，操练出相抗于「健美神话」的反面论述——她们非但不拒绝「女性特质」，甚且可能主动地以审美、医学的多重论述策略创造与瘦身女孩抢占「女性特质」的局面：「瘦得没胸没屁股一点也不像女人」、「女生因为要保护子宫，所以小腹脂肪层比较厚才是正常的啊」诸如此类。「论述」抢夺之外，胖妹们也都不吝在板上以公开自己的性感经验、或者成功的爱情生活作为「胖魅力」的真实佐证。「抢攻意义」所必然面临的尴尬是：我们怎么对抗（即使是广告化的）整套医学常识／知识呢？我们怎么对抗由这些常识／知识坚定背书的价值判断呢？我们怎么对抗胖「本来就」不健康，或者胖「本来就」不美——而且这个「美」的内涵与客观性可能还有各式奇怪的实证论据作支持（注22）——因而「抢攻意义」的战斗只能被理解为、只能得到某种自欺欺人的嘲笑与攻击呢？

我们可以梳理胖妹板胖妹们的集结，以及有意识构作反抗行动的轨迹：自分享各自遭遇的歧视情境的描述练习，从而发展出反击或自我平反的交战守则；到互贴照片网址相互给予支持与赞美的表达练习，从而具体地打造「胖性感」的内涵意义以及「胖认同」的正向力量；乃至于「杨贵妃是几公斤？」（注23）的讨论或者胖女星、胖典范的树立。胖妹板从一个普通的连谊、交谊，相互认识相互喜欢的互动群体里头发展「对抗意识」的路途，就是一个试图以「集体行为」创

造「文化变迁」的尝试——尽管这个「集体」从未以明确的组织型态浮现，而其所开发的「文化变迁」也是非常小范围的变迁，仅及于胖妹成员的生活周遭、仅及于网路的论述空间所可能遭遇之处。

也就是说，胖妹们作为被媒体打造瘦身崇拜所「压迫排拒」的群体，事实上更需要一种媒体／文化批评的批判意识。这些批判路径可能就是最常见的社会评议的语言：「媒体对审美观的渲染形塑了社会的价值观……，那些价值观虽然不见得是对的，但我们还是会被错误的讯息所影响（注24）」；找出让自己生活不快乐正确归因、找出「使我为了身体而感到不快乐」的压迫源（我的爸妈说……、我的男友说……、今天我同学对我……、路上的人又……、我找不到衣服穿……，为什么大家都只喜欢瘦子？为什么他们都这么肤浅？胖难道是一种错吗？）、认为「人不应该（只）在意外表」、或者「女人的自信不应该被别人决定」之类。这些论述途径也许简单，但是有用；在胖妹板内使用这种「大批评」的语言实际上经常只做为对个人情境的理解资源之用，不见得都诉求到社会更广远的结构性改变（「爱美毕竟是人的天性。」、「那个男生不喜欢漂漂的女生呢？」）。「媒体审美观的渲染」对胖妹而言的有效，在于胖妹可以用它指出父母老师或男友同学甚至路人甲的不义之处，可以给胖妹理直气壮说出「这些是压迫、是错的」的力量。人类学者James Scott在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变迁给农民带来的结构性压迫与农民的日常反抗中，便将这种个体情境范畴的「有用」视之为「弱者的反抗」（注25）、个人式的情境理解、或者个人式的压迫归因（「他」不道德、「他」这样对待我是错的）；事实上便已是「弱势个体」最直接可以改变自己所遭遇情境的方式（Scott, 1985）。当个体不能期待（或者不能直接着力于）大结构的改革来平衡其日常生活所遭遇的磨压处境时，作为日常生活细节搏击手段似的抵抗便是最「有效」的抵抗——亦即，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是「单独的弱

势」，而我们必须面对的歧视或迫害事实上也仅来自于那些单独的个人。于是，胖妹也借「主流」之力将减肥女孩的「塑身」行动当中「做自己」的意涵经由对「从众媚俗」的谴责途径剥除——那不过是些没有自我没有特色又没有判断力的女人罢了——于是创造出了「胖身体」积极「做自己」因而也是一个努力「介入自我认同」的坚持之类的论述途径，也就顺利创造了一个勇猛的抗议形象，合乎于「为自己负责」的现代性道德对个人「主体打造」的道德要求。

「抗议」与「运动」要摆在攻击与冲突的脉络下阅读才有意义。在花魁站「平反性弱势」的立场下，胖妹板就极易成为「边陲／反抗的胖价值」与「主流／压迫的瘦价值」两造的交锋场——或说，其实是一个在社会铺天盖地的「瘦身霸权」中，长出异见论述的培养皿。胖妹板过去遭逢最典型的冲突事件与挑战便都可以作为这类交锋的范型观察之。

典型的冲突模式约莫可归纳为两种类别：一是「瘦身传教」，二是恶意挑衅。胖妹板的「局外人」不见得都不具备「胖妹」的身分，但多半都不能理解或同意「宣扬胖价值」的行动意义，于是「瘦身传教」的冲突模式就约莫以「表现出同理心的辅导姿态」、或者「高姿态的道德谴责」两种态度，前者就是：「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胖的确实有诸多缺点（不美观、不健康、引起疾病、妨碍社交）」，后者则相当多的（仍然）诉诸自主性道德：「胖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毅力（注26）。」如前所述，网路讨论区作为「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便在于是类「论述交锋」的机会，在于从瘦身传教的言说当中去发展如何对抗「瘦身三一律」的实际论述——破解美观、健康、或自主性伦理的霸权式教条。

反驳健美神话最釜底抽薪的方式当然是戳破那「健康的瘦」的虚假幻觉，发展「健康便美」、「自然便美」甚或「快乐最美」的图像与意义连结，甚且可以带出正统医学论述作为其论述资源：例如过瘦的

身体与疾病关系、例如引证当代审美标准的「病态瘦」与虚弱形象对比于胖身体的不受规范，甚或借各种「胖子乐天、温暖、善良」的刻板印象为胖价值的正当性作辩护。简言之，由「一个」好的特质带出其他的好特质，并且经由各种互动练习或者论述操演——例如在公开分享相簿连结时互相赞美「我觉得妳真的长得好可爱啊，谁说一定要瘦瘦才能美呢？」——来发展对于各式恶意攻击的反击——如在伙伴抱怨歧视经验时打气道「妳的同事真过分，下次妳该这样跟他说……」。如同前述：胖妹板的胖妹其实比瘦身少女更需要一种有意识的批判语言，从引证「美感标准」的社会建构或历史变迁引证肥胖与疾病的不确定关系（或过瘦与疾病的确定关系）、乃至批判当今「视觉道德」（用外貌来评定一个人的道德）的不道德之处。这些论述交锋的精采处都需要一些比常识更高一层的批判或陈说能力，而这种集体轮番交锋、说服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所可能观察的「小规模文化改造」的过程，甚且可能是为胖妹们生产现实生活中对外说辞的过程。

「恶意攻击」、刻意找冲突的文章（注27）则就更为接近胖妹们日常生活可能遭受的歧视情境。从国小时被男同学欺侮的经验到长大后被同侪奚落的成长历程，同样的挫折都在胖妹们的生涯中重复地出现——而她们在各自的情境里却经常感到无能为力；网路空间则恰巧会是一个更好的空间，让胖妹们感觉一种集体力量作为她们的背后支援，摆脱生活情境里单独面对攻击时的畏缩及恐惧、也借由能够从容构思反击方式的文字媒介操作「吵架练习」，平反生活里的歧视冤屈。

2003年年初，报纸登载一则有趣的新闻：鉴于二十年来大众平均身高体重的改变，法国的成衣业征召千人量身，重新订定成衣尺寸的新标准（注28）。有趣的地方在于，这其实显示了「胖妹运动」与一



般的性弱势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对肥胖的压迫源实际上主要是来自于「消费社会」的强制性排除而非公民社会的排除——胖妹所受到最具体的歧视与剥夺是「买不到衣服穿」、因而不能打扮、不能借由外貌的营造而显示自己的特殊个性或「性感可爱」的压迫，是打造自我形象、自我认同感的剥夺，而不是公民或社会权力的剥夺。「性感可爱」才是她们欲望而不得的东西，胖妹板的氛围所显示的欲望与「女性特质」的竞争压迫所显示的亦是这个部分，因此所有迂回的论述路径所要回应的也就是新形象、新意义的打造，或者消费力（此处的消费力不只在经济能力的意义，也包括了「打造意义」的能力、品味及勇气之类）的锻炼等等，抽象的女体自由或者「向丑认同」于他们而言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不可理解。而当我们开始眼见肥美的影视明星典范一个个出现、大尺码流行女装品牌愈来愈多——也就跟着需要更多的肥美女体典型（注29）——时，商业社会就正在回应这些胖妹的实际问题，我们也就看见「胖妹骄傲」作为社会运动的真实力道。

### 静默的流窜——瘦身少女与骄傲胖妹的犹疑回返

当本文试图将「瘦身少女」与「骄傲胖妹」作为论述中对比存在的两个群体时，一个立即可见的危险便在于我们如何区分两种群体的差异或确认那「对立」的真实性？

首先必须提及的事实是：在汪汪大学的「过瘦群体」当中也实际地存在着「真正的」胖妹，就如同胖妹板也时有标准体重以下的女孩来抱怨自己因为「过胖」而遭受的挫折情境。亦即，在打造身体、追求性感外貌的大范围下，其实两个群体的「集结宗旨」或行动内涵本身并无不同，无论瘦妹或胖妹，都在借由对身体的一再确认重整个体的自我想像（或者对抗那种想像）。然而，另外一个事实也可能帮

助我们认识两个群体界线的模糊与不确定——那就是本节标题所称的「静默流窜」。

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在胖妹板表现得政治正确（至少顺服于「反对瘦身」的）的使用者同样地出现在汪汪大学的讨论板询问减肥操作的细节，也在汪汪大学的诸多心情聊天中见到关于「瘦身迷思」的犀利批判。由于我们无法细究这些「流窜主体」的内在状态，然而可能由现象本身所推知的是：对于这些流窜主体（或者绝大多数的女性主体）而言，两种主体样态的选择事实上都不会是完整的选择，瘦身少女或骄傲胖妹，其实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可以意识到「对面群体」的存在也都在试图回应这些「对面群体」所主张、所提出来的重要问题。

「胖到什么程度才需要减肥呢？」——胖妹板的使用者对「胖价值」的焦虑与紧张来自于：所有的胖妹都长成于「健美论述」的科学逻辑中，她们所希冀的是「进入社会」而不是与社会为敌。胖妹们（即使不言明的）多半不希望自己显得「太极端」，于是板上的论述经常导向「我也不是说瘦不好」、「其实胖胖只要不要胖到很夸张、或者妨碍健康的地步就可以啦」的保守态度；而许多典型冲突当中所激出的反省声浪也直接显露了这种困扰：「是不是只要想减肥、或者不够胖的女生在这里就该被你们骂？」、「妳们也许很有自信、觉得自己不需要减肥，但大多数的胖妹们都是没有自信、想要减肥的。」这些论调多半对胖妹板鲜明的「运动」走向质疑或者不满，也怀疑崇奉「胖价值」的板风可不可能走向另一端的沙文主义。简言之，对革命或运动理想没有兴趣的胖妹所感到的是这个板的「偏激」与排他性，她们感到不安的是自己在这个空间里头无法自在的说自己的感觉（我想减肥、我没自信、我讨厌我的胖身体）而不被批评。但对于花魁站或胖妹板的管理者而言，这则成为一个在其所坚持的「解放运动」脉络下不得

不然的选择（或者某程度不得不规避的问题）——毕竟「胖妹」作为定义下的性弱势时，我们面对的敌人很清楚、而所能站的立基却是薄弱而模糊的；在人为构作的网路空间之外，支持「胖性感」或「胖美艳」的社会条件其实并未成形，而使之成为全盘荒谬的论述却随处可见。

于是相较之下，汪汪大学反而是一般女孩抒发对身体的挫折经验而言更为友善的管道与空间。【1LoseFeeling】心情故事的精华区里充斥着各式血泪斑斑的「肥胖奋斗史」（且搁置此间的肥胖究竟是何种定义的肥胖），【1BulimiaNerv】当中则放恣着一股对身体狂躁的焦虑感受，而这种狂躁所激发对瘦身教条的批判力道也有时显得猛烈而直接：始终达不到目标的瘦身女孩抱怨「我好想也得到厌食症啊」，得到一阵激烈的、指责她不懂事的撻伐声浪，厌食或暴食症在这里被严词地视为对节食、无尽身体自虐的反扑与惩罚，此时「减肥道德」被必须不过度、保持自然健康、不能伤害身体的「自律道德」所取代——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身体负责的义务，「瘾」的概念在这里不作为对不正常食欲的谴责（你没有克制对食物的欲望），而是作为对贪得无厌的「想瘦」欲望的谴责（你让瘦的趋力控制了你，而非经由「瘦身」的动作主宰自己的生涯！——那不是「做自己」）。

「瘦了没有比较快乐」是【1LoseFeeling】当中一位男性使用者所写的自白文章，他描述道：「本来以为瘦五公斤就够了，结果还是觉得自己的脸圆，又瘦了八公斤之后，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克制的时刻都在算卡路里、算热量消耗，从前单纯的生活、对食物的快乐再也回不来了，即使穿上小size的衣服也无法弥补，瘦了并没有比较快乐。」以此理解女孩们的厌食情结，对外貌的焦虑与努力，或可补充一些当代「做自己」的响亮口号之积极允诺背后的阴暗面——一些研究者认为饮食失调的心理症状与低自尊有关（Charles & Kerr, 1986;

Chesters, 1994) , 然而我们观察发现的是: 许多「减肥成瘾者」原先「只想瘦一点点就好」的愿望其实不尽然与他们的负面自我评价相关, 反而是在积极投入减肥行动、积极实践「健美神话」并以之作为时刻自我检查的内在道德尺度的过程当中, 才促发了强烈的自我厌恶感。亦即, 「低度自尊」其实只与「不断扩张的道德规范」有关, 或者, 在瘦身教条的例子当中, 「厌食症」几乎就是**知识所引发的疾病**。我们在汪汪大学、对厌食女孩诸般「高度理性行动」(注30)的观察与分析, 似乎也仅能导向这样的结论: 只有在个体从事瘦身行动、在脑中装满了所有瘦身知识的诸般细节, 到了「减肥」已成为不需思考的反射动作的时候, 「厌食症」才有可能。

厌/暴食症少女所经历的主体内在张力实际上是尖锐到令人难以想像的——几乎如同人类吃了知识之果便进入罪的恐怖逻辑: 要进入神话健美的状态只能依赖庞大的医疗知识(同时一面与此神话健美状态相抗的也同样是这些医疗知识), 然而真正的「罪」却又是主体放任自己一步步走入「病」的过程: 「美学的」肥胖作为病、饮食失调作为病的内涵意义其实完全一致——那便是个体不能良好的控制自己身体与意志的稳定状态, 「主体」溃散了, 然而这个驱使主体如此溃散的力量却正是那个「成为主体」的愿望本身。

简言之, 「对身体的骚动不安」几乎是本文所观察描述的胖/瘦妹完全一致的心理征候。汪汪大学瘦身少女所致力从事的「身体矫正」的事业与花魁艺色馆胖妹(某程度被带领、训练出来)所呈显高度自觉、高度主动性的战斗意志, 之于女性对抗其对身体必然的焦虑不安, 其实功能完全一样。而本节「静默流窜」的观察所可能揭示我们的便是此间的暧昧复杂。如同Davis所言, 她们没有人是单纯受一种意识形态所贯穿、荼毒的个体; 这些行动选择所需要、所体现的也是她们对自身处境多层次的复杂理解。换言之, 对身体的压迫当

然是一个真的问题，但她们所承受的压迫从来不是只来自于单一方向，自然单一的行动或政治选择也无能解决她们的问题。「性感」的展演从来不是「芭比娃娃」般的天真状态、也不会是霹雳娇娃式的神勇「能动性」表征。对每一个（无论瘦身或者不的）个别女性而言，个体所真实存在其中的情境与限制种种就是她们必须时刻面对、处理与对抗的议题。由此回到前言所提出「女性」的代表性问题，在此究竟还能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真」的问题，或者在什么意义上有可能处理到真实女性的经验与处境，便是本文进行至此最大的不安感所在。

## 结语

### 「商业化」的身体——女性主义问题的总结讨论

对「女体商品化」的批判，毫无疑问已是女性主义者讨论身体议题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意识。当把「想要变性感」的欲望单一的理解为一种落入取悦男性的弱势处境而不自知的时候，「左派女性主义」（注31）对瘦身行动或瘦身主张的全面拒斥、进而拒斥整个可能的女性性感展演或打造身体的行动本身的立场，就变得可以理解起来。当把「成功的性感展演」天真地推成为一个女性「赋权」而无碍的情境时，对于左派女性主义拒斥身体之立场的嘲弄反驳也显得合情合理起来。然而我们从胖妹与瘦身少女的言说观察里得到的事实是：「性感」其实是两组群体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并且性感于她们的意义其实远多于「性魅力」、或者增加身体在「性市场」上的竞争力本身；它同时包括了个体对自我生涯、生活的控制感，也是个体积极打造自我图像与创造自我认同的重要行动——女体商品化当然无疑是一个真实的命题，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商品化力量对于女体之于女性认同的重要性所产生的影响，然而这些「行动中」的女性本身对此也并不

非全无反省或疑虑，无论是瘦妹的忧郁或胖妹的焦虑种种，其实都不难观察出这些行动女性的焦着及冲撞、以及「选择」的尚未完成。

易言之，除却「拒绝身体」的选项之外，积极皈依瘦身教派或者反面实践对瘦身教派的抗拒意识之间，所有的抗议及「运动」的可能都正透过对身体的意志贯彻而发生。回应「女性代表性」的问题：若我们必须给经验世界中的诸多女性一个固定的「实相」，那么我们目前仅能达致的结论事实上只能是「女人们尚未作出决定」；或者「决定」其实不需要达致，所有揉杂着浮动与反思的行动本身，其实就已经是这些女性主体之浮现、之实践的全部了。

——首次宣读于2003年11月29-30日年全国社会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并曾于2003年12月15日第三十四期文化研究月报刊载。此次刊出有少许文字的修饰和更动。

## 注释

1. 塑身知识所引发的厌食症现象将是本文田野与论证的一项重点，本文将不在医疗的病理化体系下观照此一现象，亦不站在女性主义对「父权凝视」与「客体化女体」的一般解释将厌食症单纯视为一种女性受迫的结果；而是将厌食主体的意识、自述与「时时虫又刻刻」的身体打造过程作为对塑身主体的完整理解。
2. 张锦华，《女为悦己者瘦——媒介效果与主体研究》p.306，附录三。第一名：最佳女主角、第二名：民主进步党、第三名：媚登峰美容沙龙、第四名：菲梦丝国际美容、第五名：NISSAN SENTRA汽车。
3. 根据亚太肥胖医学会议在2000年制定的肥胖标准，亚太地区肥胖标准为BMI（Body Mass Index，身体质量指数：体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平方），指数18.5~23，为正常体重标准。

4. 左／右派的归类当然是一种相对性的化约，而非严格的关于诸种论述的学术立场的描述与理解——是以反塑身／支持塑身的政治立场为轴，将视塑身工业为商业霸权而意欲对抗之的女性主义立场划归为左派女性主义立场；以视塑身工业为主体消费之能动性实践，因而主张拥抱之的女性主义（性解放）立场划归为右派女性主义——而不是一个具有固定内容指涉的学术名词。
5. 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卡维波随即撰文〈老化的媒体批评·弱智的女性主义〉回应，主张女性主义必须还给女性身体关注与性感主张的权力；后林深靖又分别在南方电子报及《左翼》杂志第十六号上以长文〈青春睿智卡维波：率性与任性〉对性解放对身体与商业逻辑的天真迎合立场做出批评。整个论战延烧近半年，完整论战文章可见国际边缘网页的搜集：[http://www.intermargins.net/Forum/2000/body\\_shape/index.htm](http://www.intermargins.net/Forum/2000/body_shape/index.htm)（文章均收入本书中）。
6. 当中有十四个减肥讨论板、一个丰胸讨论板、一个一般性的医疗问题讨论板、一个美食板与两个生物化学的讨论板。
7. 【】内的为原英文板名，其后的中文板名则为免混淆，为作者根据讨论板的主要走向所加注，不采用原板名。
8. 进站画面里站规第零条：「本站为性别站台，支持色情合法，反对污名歧视，站方认定对性少数族不够友善者将永久禁止进站，请使用者慎思后再决定是否进入。」
9. 原中文板名：月半女未权益促进会。
10. 玛丽莲梦露：身高166.4公分、体重53.2公斤，健康体重应在54.8～67公斤间。资料来源：<http://www.people.com.cn/BIG5/channel6/34/20000218/3375.html>
11. 萧亚轩：身高162公分、体重47公斤。标准体重值：52～63.5公斤。
12. 张惠妹：身高158公分、体重42公斤。标准体重值：49.4～60.4公斤。（在【1LoseFeeling】板原被误记为48公斤，网友回文纠正：「丫妹哪有这么肥…丫妹是42公斤啦」）
13. 李玟：身高162公分、体重45公斤。标准体重值：52～63.5公斤。
14. 文章标题为：「po些女星的身高体重资料激励妳们，我都是酱的喔。」
15. 月经前两三天女性身体易水肿、囤积脂肪，体重会上升一至二公斤，月经过后则会恢复寻常体重。
16. 注13同标题讨论串回文。
17. 同上。

- 18.同上。
- 19.为尊重当事人意愿，此处ID为作者更改后的虚构ID。由于该讨论板的属性与成员间的贴文习惯使然，原文是相当简单的条列式陈述，但为了便于阅读，本文将之改写为散文式叙述，唯所描述的情节与内在思维都忠实参照个案主的自我叙事。
- 20.引用文章原句。
- 21.【1LoseFeeling】标题为「改变」的讨论串。
- 22.板上许多文章引述过Discovery或者其他的报章资讯，强调人的「美感」感受性的生物或科学性证据。
- 23.【fatlady】板，文章标题为：「杨贵妃有几公斤」讨论串。
- 24.【fatlady】板，文章标题为：「是不是这样呢」标题原文。
- 25.见书名《Weapons of the Weak》——弱者的武器。
- 26.【fatlady】板，精华区：12.〈争议事件〉→4.〈走错板的文章〉→3.〈胖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毅力〉标题文章讨论串。
- 27.一名不断变换代号的「仇肥胖者」，反复地在胖妹板发表各式唱反调的挑衅文章：「肥得像黑熊」、「胖妹会美？不如说母猪会上树」、「又肥又丑、臭得像猪、还整天躲在这里互相安慰。」在胖妹板已经到了恶名昭彰的地步，这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 28.2003年1月24日，〈建立成衣新标准 逾千人接受量身〉，《联合报》，杨年熙报导。
- 29.近一两个月胖妹板出现数则大尺码女装征Model的告示，召集了一些常贴自己可爱相片的胖妹成员结伴前往应征。
- 30.见「审美医学」一节中goya的饮食日记。
- 31.见注3。

## 参考书目

- 张锦华，2002，《女为悦己者瘦》，台北：正中。
- 张锦华、黄浩荣，2000，〈还童的女性？弱智的男性！〉，《中国时报》，12月18日。收入本书，页3-5。
- 卡维波，2000，〈老化的媒体批评·弱智的女性主义〉，《南方电子报》，12月21



- 日。收入本书，页7-10。
- 卡维波，2001，〈青春睿智的左派？成年痴呆的左派？（上）、（下）〉，《左翼》杂志，第16、17号。收入本书页33-93。
- 黄宗慧，2000，〈主流性感标准与片面身体解放〉，《中国时报》，12月22日。收入本书，页11-13。
- 林深靖，2001，〈青春睿智卡维波〉，《左翼》杂志，第15号。收入本书，页19-26。
- 林深靖，2001，〈卡维波，左派装可爱？〉，《左翼》杂志，第18号。收入本书，页95-100。
- 何春蕤，2001，〈想要饭碗就少吃饭：节食与工作伦理〉，《不同国女人》，台北：自立，页166-170。
- 赖英宏，2001，〈主体型构，能动性 with 政治抵抗——以国内塑身论战为例〉，东吴大学政治学系，硕士论文。
- Bartky, S. (1990) *Femininity and Domination: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Oppres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Bordo, S. (1993)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pkis, W. (1986) *Beauty Secrets*.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 Charles, N. and Kerr, M. (1986) 'Food for Feminist Thought',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34(3): 537-571.
- Chester, L. (1994) 'Women's talk: food, weight, and body image.'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4(3): 449-57.
- Davis, K. (1995) *Reshaping the Female Body: the Dilemma of Cosmetic Surgery*. London: Routledge. 《重塑女体：美容手术的两难》，1997，张君玫译，台北：巨流。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002，赵旭东、方文译，台北：左岸。
- Gordon, R. (1990) *Anorexia and Bulimia: Anatomy of a Social Epidemic*. Oxford: Blackwell.
- Grogan, S. (1999) *Body Image: Understanding Body Dissatisfaction in Men, Women and Children*. London: Routledge. 《身体意象》，2001，黎士鸣译，台

北：弘智文化。

Morgan, Kathryn. (1991, 2003) 'Women and the Knife: Cosmetic Surgery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The Politics of Women's Bodies: Sexuality, Appearance, and Behavior*. Ed. by Rose Weitz.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bach, S. (1993) *Hunger Strike: the Anorectic's Struggle as a Metaphor for Our Age*. London: Penguin.

Scott, J.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减肥瘦身」的女性主义标准答案错在哪里？

——从「饮食消费与现代性」到「性感美貌的多元与普及」

卡维波

## 前言：食色性野

数年前要是走在街上问任何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对于减肥瘦身美容的看法，不论男女都会告诉你一套标准答案：「减肥塑身风潮是媒体在物化女体，美容事业的广告是剥削女性，它们灌输大众单一的性感与美感的标准。女人应该追求自然、健康与多元的性感和美貌」。

这是一套深入人心的常识教化，知识份子都能琅琅上口，但是就像所有的标准答案，它根本不是人们实践的现实。人人口头上都反对塑身减肥，但是减肥瘦身风潮并不因此而立刻消失，相反的，后来越演越烈而成为「全民运动」，以致于现在连上述标准答案都快被人遗忘了。不过这个标准答案曾经还是有其功能的：它给了人们一个良心，在少吃一口与还想再吃的挣扎中，人们可以咒骂减肥塑身广告让自己失去自主能力（agency），怨忿「世俗标准」压迫我们从众地装扮身体。

也像所有的标准答案一样，这套常识教化是社会控制的一环，让人们继续生活在虚假的神话内：它宣告周围的一切并没有改变，以便漠视既有社会趋势与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最终当现有社会趋势获得完全主宰时，原来那个漠视现实变化的标准答案也就完全被遗忘与埋葬（就像国家教条随着国家消失而被遗忘埋葬一样）。然而在

社会趋势变化中真正需要被挑战与被质疑的权力操作，却被那些不碰触到现实的「标准批判」所折射。

如果女性主义者看不出这套标准答案的错误，不去发掘它所意图掩盖的差异和敌意，不去放大它与现实的矛盾与对立，而只是安于标准答案所提供的主流现状，那么女性主义就失去了边缘实践的能力，不再是颠覆社会的革命力量。

\* \* \*

本文分成「食、色、性、野」四节。前两节「食」与「色」指出：减肥瘦身的实践基本上是饮食控制、个人运动、使用药物与身体整型，我将以「饮食控制」为例来说明这些实践与论述和晚期现代性（注1）的密切关系，以及这些实践在社会互动中的社会控制意含。

女人减肥瘦身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动机就是追求苗条身体所代表的美貌性感，本文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肇使这个动机存在、并使减肥瘦身的诸多实践方式成为可能的现代动力与趋势，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主流女性主义基本上认为：性别权力的不平等（透过媒体所呈现的苗条性感身体）造成女人减肥瘦身，而由于权力本质上就是压抑宰制的，因此减肥瘦身的女人是不自主的受害者，即使她们自觉是自主的，那种自主也是需要被质疑的。我则认为现代身体是各种知识／权力（不只性别权力）的战场，这些权力可能互相矛盾，因而给予主体抵抗的机会；另外，这些新形态的权力技术在性质上也未必都是压抑或强制的，甚至还有积极生产的，因此可能会对主体形成培力（empower）的作用。本文认为，当代减肥瘦身的动力不是外在力量的强制（男权支配或媒体洗脑），而是来自主体自身（所处的现代条件），例如来自自我对饮食消费的控制管理；减肥瘦身实质上就是身

体管理与自我控制。这涉及了现代性的诸多动力所形成的现代自我特色：一方面是自我监视、自我规训，另一方面则是自我肯定、自我能动（「能动」就是能够主动作为，是行动主体的意思）。因此在减肥瘦身中，女性经验到的身体管理与自我控制会给我带来自主有力感，但是也可能会带来焦虑或失控感。这些经验并非只存在于减肥瘦身而已，而是现代生活普遍的一种存在状态，反映着新形态的现代权力所带来的转变。

以上的分析是在一些粗略的历史叙述中才得以完整展开，特别是：自由婚配所形成择偶追求（courtship）文化对外表身体的重视，文明化过程（civilizing process）使外表身体与内在自我逐渐紧密结合，美貌工业使性感美貌普及化，性感工业则既使女「性」商品化、也使商品女「性」化，性感青少年进入公共空间与择偶市场等等趋势现象。这些都会在本文篇幅最长的第三节「性」中显示和减肥瘦身相关。

有些女性主义者为了抗拒所谓「单一性感标准」而提出「性感美貌的多元化」的口号，我在第四节「野」则批判了这个抵抗口号的可能陷阱与遮蔽，并且以另一种方式重述了本文之前的结论。

## 一、食

饮食就是饮食消费，控制饮食就是控制消费

一般女性主义者批判减肥节食或瘦身塑身时，主要的焦点是媒体所呈现的女体形象，但是却忽略了人们如何减肥塑身与控制饮食的实际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了身体与饮食本身两个层面，特别是饮食作为一种消费文化、以及身体作为一种权力战场的意义。

我们知道控制饮食乃是减肥瘦身的重要内容，但是减肥瘦身的

批评家却根本不谈控制饮食的实际过程与当代的饮食文化，这就将使她们的批判完全落空，也完全悬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批评者常常强调媒体所塑造的女人身体影象乃是对女人的诱惑与洗脑（虚假欲望的制造），并且说这是女体商业化的一部份、也是男性凝视（父权控制女体）的权力表现。但是批评者没有看到的是，饮食（背后则有食品工业与相关的商业利益）也同时在媒体中对人们产生诱惑与制造欲望：从可口的零食到添加营养的饮料、从健康食品到社交饮食（「快乐时光」的饮食），商品化或商业化的饮食无时不在向我们的欲望招手。而对于这种饮食商品化的抵抗方式之一，当然就是控制饮食。很明显的是，饮食消费文化所创造的诱惑欲望，在减肥瘦身中是会被遏制的，从这个抵抗饮食欲望的角度来说，减肥瘦身非但不是简单的「被洗脑」，反而是一种「反洗脑」。在这样的脉络内，减肥瘦身所进行的控制饮食乃是「合理的」（理性的）消费行为，也是基本与必要的生存之道。

饮食其实是「消费」的最基本原型（英文的「吃喝」就是用「消费」consume这个字），人类过去最基本的生产就是食物，将生产物消费掉就是吃喝饮食。对于饮食（消费）的控制也渊远流长，早在世界商业化之前就有控制饮食的现象；控制饮食的宗教动机与「养生」（健康）动机则是两种颇为普世的现象。在养生动机方面，禁止过度（excess）——过多或过少——历来是饮食伦理的基本教条，这个教条可以暂时在宗教动机（包括节庆与民俗仪式）中被松弛，人们可以在宗教仪式或节庆中大吃大喝或全然禁食。这个基本的原型似乎仍然在当代已然商业化的消费文化中留下遗迹，在特殊日子中的「XX大餐」即是一例；社会学家则将女性节食追索到宗教实践中的女性传统（注2）。

当然，一般消费伦理基本上仍然是谴责过度的两极：消费过度者（过多或过少）甚至会被当作心理病态的表现。不过，个人的消费

过度倘若能够与各种世俗化的理想呼召（cause）挂钩，例如为了体验非洲灾民的生活而进行饥饿绝食的活动，或者为了慈善或爱国目的而参加暴饮暴食的大胃王竞赛，那么社会可以谅解这种消费过度。又例如，目前社会中依然有尽量避免消费的人，如果她能提出绿色环保或清贫生活方式的说法来为自己辩护，那么就不一定会被视为过度，或可以免于「怪人」、「窖藏人格」、「与时代脱节」之类的污名。相较之下，入不敷出的消费者、刷爆信用卡等等消费过度行为，则被当作病态的购买狂。

总之，从「控制消费过度」这个角度来看，控制饮食乃是控制消费的一部份，这之中既有「反对过度」的传统伦理因素，也有资本主义下的「理性计算」特色。值得提出的是，这个理性计算往往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相关知识／权力的变化而对「过度」、「合理」有着不断更新的诠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过去认为收支平衡的消费是合理的，但是近年来，扩张信用也不见得就是「过度」，甚至对于何谓非过度的合理消费，也不一定存在着共识（例如追求名牌是否过度还是合理）。同样的，饮食消费的过度或合理与否，也随着社会富裕程度以及相关的营养学知识和医疗权力而有不断改变的诠释与标准。个人在其中往往有些许空间去挪用权力或抵抗，例如在冲突的专家意见下去做有利自己的取舍，或者将自己可能被视为偏差的表现整饰为「自我独特性的表现」或甚至「理性的从众表现」。从这个历史的与知识／权力的脉络来看，我们不能用「自主／宰制」二分来清楚界定减肥瘦身的权力现象。

社会理论家Giddens把厌食与暴饮暴食连结起来，将两者均视为个人在创造与维护一个独特自我认同时所产生的副作用或「意外伤害」（参见注2）。这里就涉及了身体作为诸方权力的战场，以及饮食方式、身体外表既建构又表现了个人生活方式或风格、个人认同等



等复杂动力。本文认为，很多女性主义比较关注厌食症，把暴食当作因厌食而起的恶性循环，进而将厌食、暴食等饮食失序现象都当作父权美感的受害者，这种分析是不周全的。

本文认为，厌食与暴食固然应该放在一起分析，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虽然两者的病理化均沿着相似的知识／权力轨迹，但是却有不同的社会与历史建构。西方历史与传统中一向就有所谓禁食（fast）与贪吃（gluttony），禁食和宗教实践相关，贪吃则是一种宗教罪衍；贪吃（或大吃大喝）与现在所谓的暴食（bulimia），并没有什么真正差异，但是传统的禁食与今日的厌食则颇为不同。在西方历史上，肥胖作为上层富裕的身体特色并不曾被当作偏差，但是从十八世纪开始，特别是十九世纪，就有「现代」医学对过度饮食与对上层社会的过度肥胖之关怀。然而即使在十九世纪末期，也还有书籍文章教导中下阶层如何把自己吃得胖一点。饮食与阶级的关连不断变化，在今日西方，过度肥胖与暴食主要被当作下层社会的标志（例如在美国，肥胖是黑人与「垃圾白人white trash」的标志），青少年（特别是青少年）的过度肥胖则被更密切的监视（远超过更为普遍的中年妇女肥胖）。总的来说，暴食问题多半被归咎于心理原因、或过度补偿节食的恶性循环，比较少从饮食工商业的发达角度来分析（例如吃到饱的餐饮业盛行、点心零食的发达、可口食品的烹调方式等等）。

本文基本上将当代的厌食与暴食现象当作消费过度的一种现象，可从现代性与消费的诸种关连去理解，个中所涉及的政治因此不可能只是性别权力的单一因素。女性主义将年轻女孩的厌食归诸父权美感的宰制，正如将年轻女孩的出家归诸于宗教迷信一样的简化。有些女性主义从亲权（母亲）立场出发，看待年轻女孩的厌食时难免会因急切的保护心态（因为厌食可能伤害健康或甚至致死），而进行对厌食的谴责式分析，将厌食者视为无力的受害者。这种分析

方式略过了厌食者比一般人更为坚决的饮食控制，但是另外一些类似的现象——如宗教禁欲者、年轻运动员或所谓年轻天才极为坚决的自我控制——却从未被当作偏差行为或受害来分析。

不论如何，在今日的社会文化脉络之内，女人的厌食或过度控制饮食（使自己过度瘦削）已经和两性战争无关：厌食的变形丑怪身体不是为了取悦男性，而是女人和自己身体的战事（warfare），it is personal（是自我和自己身体的私人恩怨），亦即，是个人心理生活历史的多种因素造成的。Bryan S. Turner认为厌食现象是中产阶级家庭内部的战争，是被家庭过度保护的女孩想要更能控制自己身体，从而更能控制自己生活的追求自主行为（注3）。无论是家庭战争或私人战争，这场战争有时甚至惨烈到没有俘虏存活——不一定是杀死身体（控制身体不成，只能消灭身体），也可能是旧我的死亡与自我的新生，而这个旧我的死亡与自我的新生则是心理疾病者与宗教情怀者（禁欲或禁食）的共通目的。

总之，当代的减肥瘦身或控制饮食现象不能离开「控制消费」这个理性计算行为，其所涉及的知识／权力也有别于女性主义所强调的父权单向宰制。易言之，本文认为，控制饮食的减肥瘦身文化其实是整体当代消费文化的一部份，饮食消费和其他种类消费的基本现代动力是相同的。

## 二、色

色就是一切

减肥的节制饮食就像是面对各类商品时仔细盘算如何控制消费一样。这种控制消费有时会以诸如「聪明的（理性的）消费者」说法出

现：不论是理财或买手机或吃蛋糕，除了参考市场资讯与该商品的知识（如手机特性或某基金的利率或奶油的热量）之外，消费者都必须节制欲望，不能盲目跟随宣传或广告。易言之，消费者必须「表现」为理性自主消费的样子，如果没有表现出「掌控」的样子（例如只要见到喜欢的新手机就去买、看到蛋糕就吃，但是却不能以某种自我呈现方式来掩饰这种欲望（例如宣称自己是手机收藏家、或说自己喜欢与接受自己的肥胖），那么就会被视为偏差，其作为「正常人」的身分就会被质疑。

我们必须指出，在这个分析角度下，减肥瘦身其实就是展现具有基本控制消费能力的「正常人」样子。「样子」就是自我呈现、外在表现或「色」（所谓「色」就是表象的意思）。这解释了为何目前控制饮食（不仅仅节食减肥）几乎是一种「全民运动」，因为这是消费社会的必然现象、是消费文化所鼓励的一种能力或一种自我呈现的样子。消费社会召唤自主的消费者，**自主是消费社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

作为「自主的」消费者（正常人），减肥的控制饮食当然是必要的：因为「自主」消费者乃是以充分的营养与医疗知识来做明智理性的商品选择，克制过度的饮食欲望。在这方面，减肥与其他控制消费的行为并无不同，可以预见的是，减肥或控制饮食在未来将会变成相当普遍（不分男女老少）例行循常（*routine*）的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只是单独挑选出减肥瘦身作为批判对象，而需要更广泛地针对消费社会，分析「自主消费」中复杂的权力。

「正常」的「自主」消费者既然是必须表现能够控制消费的样子，那么不肥胖的外表（「色」）往往就是具有理性自主之饮食消费能力的表面证明（*prima facie evidence*）；相反的，肥胖的外表则经常被联想到欠缺控制饮食的自主能力。不过，那些因为体质而不会发胖的人，即使不控制饮食消费，也不容易被他人视为偏差或缺乏自主能

力。由于这种凭外表来判断自主能力的文化常识有其任意性质，因此是一种对于肥胖外表的歧视。（同样的，对于某人是否具备控制消费能力的判断，往往会受到其阶级、年龄、性别、身分的影响而有变易或双重标准）。

不论人们是否在某个场合或某个时间无法控制自己的饮食消费，人们还是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掩饰自己不能控制饮食的偏差：例如在人际交往时积极谈论控制饮食、表现出关心身体胖瘦等等。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不必实际或认真地从事减肥或控制饮食，他只要常常提及这个话题或偶而出现在健身房、减肥班、运动场等等，就可以蒙混为「正常」。这解释了为何人们总是到处谈论身材变化、节食减肥的成败经验、声称「今天的大吃大喝是偶一为之、下不为例」。因为光说不练也可以让你从偏差成为「正常的」（即，理性控制）饮食消费者，这是最低成本最便宜行事（形式）的减肥法，**talking is cheap**。

不过从本文的理论观点来看，「光说不练的减肥瘦身」和「身体力行的控制饮食」并没有太大差别。光说不练并不比身体力行更自主，身体力行也并不比光说不练更受到消费文化的宰制。毕竟，控制饮食或饮食消费可以容许不同的形式，重要的是有控制饮食的「样子」。样子（「色」）就是一切。

当然，身体本身的样子（如一个非常肥胖的身体）会背叛我们所想要呈现的其他样子（满身大汗的运动、绝口不吃蛋糕、满嘴的减肥经、自称天生体质如此、或尴尬地说自己该减肥了等等）。然而再怎么拙劣的掩饰「偏差」（即，被他人认为其实是缺乏自制以致于非常肥胖），也是一种自制从众的诚意表现，值得其他「正常人」的同情，大家可以假装对其偏差视而不见；借此，有秩序的共同社会交往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只要肥胖者还想继续维持社交生活，她就会感到

控制饮食与控制身体肥胖的压力；只要正常人不「放弃」肥胖者，肥胖者就必须努力表现出自制从众（即，尊重社会对控制饮食消费或控制身体肥胖的要求）的样子。

总之，控制饮食消费这个层面的减肥瘦身活动，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广泛，不是只限于实际上身体力行的控制饮食而已，还包括了与此相关的各类言说与社交行为。女性主义想像社会中存在着一些被媒体呈现所洗脑的减肥实践者，以及另外一些清醒的批判者或不减肥者，但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维护「我们彼此都是控制饮食消费的正常人」的样子，也因而都在从事（在广泛的意义上）控制彼此饮食的活动，这是社会控制的一部份，所有的人都是「共犯」。

在各种减肥方法或身体话题的谈论中、在对肥胖者无意中透露的贬低里，肥胖身体会随着肥胖程度、与肥胖者的自我呈现策略（如用谈论自己的减肥经验来显示自己的自制努力），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这个歧视可以说是清楚地表现在对过度肥胖（obesity）毫无掩饰的歧视中。

由于控制饮食涉及了最基本的理性自主消费，因此界定了社会交往时的正常／偏差秩序：当人表现出无法自制消费的样子时，或者四周的人无法装作看不见这种偏差样子时，互动秩序就无法维护下去——这就像你可以数天不洗澡，但只要看来还算干净就还能蒙混下去，不过如果你的样子就像肮脏的乞丐，他人就难以与你互动。同样的，过度肥胖者由于几乎无法用任何方式去掩饰偏差，因此无法免于社交互动时的被歧视与尴尬，也就因此成为公共场所的奇观；故而过度肥胖者的策略往往就是根本从公共生活中撤退，这没有在他人在面前如何去自我呈现的问题了。长期困于家中的过度肥胖者，起先并不是因为体重超过负担而无法上街与他人互动交往，而是因为**社会排斥**。

从上述讨论来看，减肥瘦身（包括相关的日常言说与社交互动）的一个重要面向其实是对「过度肥胖」这个偏差现象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控制；若我们将之与「对同性恋偏差的社会控制」来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相似的控制机制（事实上也和所有偏差行为的社会控制相似）。首先，同性爱的连续体被人为地画出一条「真性变态」与「假性变态」的区分界线；易言之，同性恋被分成「真的」（无法救药的病态偏差）与「假的」（即，暂时的、情境的、可改正的、会自我克制同性恋倾向的、心理想变成异性恋者的、正努力尝试实践异性恋的、尚未发生同性性交关系的…），真同性恋乃是全部人口中的少数，其他人（包括假同性恋）则都属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异性恋（即，正常人）。一些同性恋的特征（如娘娘腔、男人婆、与同性亲热等）不但成为取笑或嫌恶的对象，而且也是被（自我与他人）监视规训的对象，是应该从公共生活与日常互动中被消除的特征，借此来吓阻人们从假同性恋变成真同性恋。

同样的，肥胖连续体也被人为地画出一条界线，区分为「真的过度肥胖」与其他不同程度的肥胖，或「假的过度肥胖」（即，暂时的、情境的、可改正的、会自我克制肥胖倾向的、心理想变成苗条者的、正努力尝试实践减肥的、尚未真的过度肥胖的…）；「真过度肥胖」是人口群中（被病态偏差化的、被社会隔离的）的少数，「假过度肥胖」则仍属于大多数「正常人」，但是必须在外表身体与日常言说互动中表现为「正常人」。不同程度的小胖、中胖、大胖必须在公共生活与日常互动中消除自身和「真过度肥胖」的相同特征，如肥胖身体、贪吃、懒惰、不运动、动作迟缓、不减肥、坐着不动等等（或者至少要表现出努力消除上述特征的样子）。基本上，表现出减肥瘦身的样子，是小胖、中胖、大胖们与「病态可怕的」真过度肥胖者有所区别的重要标记之一。整体而言，对于肥胖的取笑嫌恶与监视规训

（包括自我监视与自我规训），对于肥胖的多样社会排斥（例如公共场所的座位过于狭小），都是社会控制人们滑向偏差的「过度肥胖」的手段。因此，现代减肥瘦身的面向之一是对「过度肥胖」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排斥。

故而，在批判减肥瘦身时，必须先探讨过度肥胖者被社会排斥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追究到现代人必须有个可以适宜呈现的样子。这个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和另一些社会排斥是直接相关的：亦即，自现代以来，为什么色情的、酷异的、病态的、畸形的、丑怪恶形的（诡态的）、狂／野的、「人性」的（生殖与排泄、死亡与睡眠）……身体，均不宜出现在公共空间里（注4）？很多人谴责公众对过度肥胖者（或畸形残障）的排斥与歧视，但是却同时自我矛盾地谴责公共空间中的色情变态丑怪等（如谴责报纸刊登死尸照片等），其实这些社会排斥都有同样的源起（即，那些被排斥现象都被认为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公共不宜），而当这些社会排斥的解决或解放没有被放在批判视野内时，对减肥瘦身的批判恐怕根本忽略了现代身体所座落的社会脉络，而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将减肥瘦身的意义局限于父权对女体的控制，其实忽略了晚期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饮食／消费趋向自折回应的（*reflexive*）（注5）与个人主义化的（*individualized*）（注6）。所谓自折回应的，就是在面对层出不穷的资讯知识专家与众多选择时，相应的不断做出回应与再回应，这个回应可能是相当远虑或熟虑的反思，但是也可能是膝盖反射般的立即反应；这些反思或反应则又成为再度回应的对象。然而，何以晚期现代个人不再由家庭代为抉择、不再被其族群阶级背景或文化传统所决定，而必须不断参照各方资讯知识专家与选项呢？这是因为在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上，个人自我的一切（身分认同、生活风格、独立生存等）已经不必受限于他所在的文化传统、

家庭、阶级、族群等等，而是由其所做的「自折的」选择所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化」。不论个人如何抉择，即使是放弃自我而由家庭或他人代为抉择，个人也必须独自承担后果，亦即，所有的抉择都将会形塑自我的人生与认同。

首先，饮食／消费之所以趋向自折回应的，乃是因为有太多选择被制造出来，加上资讯泛滥、知识专家彼此冲突，这使得（饮食）消费者不得不具有很强的自折性，也就是对于（饮食）消费不可能是简单的接受，而是不断反思（涉及吸收资讯、听取专家意见、相互比较评量等等）或者反应（根据原有的或有限的资讯知识，或甚至随便任意的判断）的选择过程；当然，这个选择的后果会折回到个人身上，造成影响，而迫使个人再度做出回应选择。由于自折回应能力（即反思与反应的能力）和控制能力直接相关，因此（饮食）消费的自折性增强，意味着控制（饮食）消费的增强。

其次，在（饮食）消费个人化方面，不但个人消费进占了家庭消费的市场，而且个人消费也成为表现个性的管道，个人可以透过消费的选择来表现个人风格与生活方式。怎样的消费，就是怎样的人。更有甚者，由于作为个人门面的外表也趋向个人化（即个人外表显示透露个人的品味、个性与自我——门面外表和内在自我愈来愈紧密的结合），因此，影响外表呈现的（饮食）消费，也需要选择与控制。

总之，在晚期现代，个人化与自折回应的能力变成存在之道（即，生存的基础），其关键是充满（国家、商业、专家、制度机构、媒体、性别…）各方权力角力的「个人选择」，其战场就是个人身体，其蕴涵则是个人需要更多的自我控制（包括身体管理或治理）。减肥瘦身活动，如控制饮食、个人运动、药物使用等，就是晚期现代人的存在之道或存在方式，这是独立于所谓父权控制女体的权力因



素。这个分析的角度将减肥瘦身之动力归诸于现代自我的存在方式，而非外在强迫（如父权或媒体）；减肥瘦身者不是受害受制者或被洗脑者，而是有力量的能动者，透过控制与管理身体来使自我能动有力。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自我存在方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权力形态的重大转变：现代权力需要的是自动自发的身体，而不是被动顺从的身体，因而使得个体与权力有了协商的空间，从而给予个体能动或甚至抵抗的可能（注7）。

女性主义只注意女性减肥现象，但是减肥论述其实也扩张到其他群体，甚至成为「全民运动」，很显然，女性主义无法对不分性别年龄的减肥论述提出适切的分析或批判。例如，儿童肥胖现象越来越成为相关知识／权力关注的对象，就这个现象而论，本文所指出的思考线索一方面指向富裕社会的饮食文化与饮食工业对儿童身体的影响，例如，为了食品加工、生产与流通的便利效率、品管、保存和扩大市场与利润，饮食产品往往不考虑是否会促成肥胖。在这方面，儿童与成人都是潜在的「志愿受害者」——但是没有证据显示儿童或妇女特别脆弱与容易「受骗」（被饮食工业所操纵），毕竟男性成人也有啤酒肚、脂肪肝、高血压等问题。此外，儿童也和成人一样，有在控制欲望的间隙中存在的「吃的愉悦」，以及追求这种愉悦的能动自主力量。

另一方面，虽然和减肥相关的医疗权力已经扩张到儿童身体，与父母对儿童身体的管理有着可能一致或冲突的规训目标，但是儿童减肥也是一种控制消费能力的作为，关乎其未来在消费社会的生存之道，因此日益扩散的儿童减肥论述，以及儿童肥胖身体成为权力的关注与规训目标，等于是及早训练儿童的控制消费能力，是儿童的身体规训的新增内容。当然，父母及社会对儿童的饮食一向就有所规训，但是近年来开始这种自折回应的（涉及的资讯知识并非传统

俗民智慧的、而是健康医学知识的；例如早期着重母职的过度喂食 *overfeeding* 论述、与后期的营养论述、母乳论述等），个人主义化的（凸显儿童个别性，过去的时代并没有突出儿童的个性），则是晚期现代性发展的一个趋势。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谈了减肥瘦身的控制饮食消费面向，还没有讨论运动、药物、整型（如抽脂）这些方式的减肥瘦身。但是基本上后面这三者均可以在本文所提供的架构下被解释。众所周知的，个人运动逐渐成为当代自我身体管理的一部份，也具有着自折性和个人化特色；药物与整型的减肥方式也是如此，我们在其他地方曾经谈过这些问题（注8）。为了避免本文过于冗长重复，此处就不再细论，但是会在下两节相关处简单地再提及自我身体管理，也就是身体成为权力战场、但是也因为权力而得以自主能动这个面向。总之，本文的重点是：对于减肥瘦身的理解，必须回到控制饮食、个人运动健身、使用药物、身体整型这些实践的具体当代脉络，我们发现在这些脉络中的权力操作与社会动力，主要是来自可被广泛称之为「（晚期）现代性」的趋势，而不是只如主流女性主义所想像的男性权力。

我相信本文所提出的诠释架构对当代减肥瘦身现象不但在智识上提供了更適切与深虑（*sophisticated*）的解释，也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培力女性的解释。因为主流女性主义将女人普遍的减肥瘦身现象视为（男权宰制下）失去自主的行径——在女性普遍独立自主、妇运与女权颇有进展、女性的性别意识逐步高涨的社会状况中，这似乎是一种极为奇怪的矛盾。本文则将女人的减肥瘦身当作身体管理和自我控制的一种积极主动的作为：即，在控制饮食消费上去形塑身体和自我、表现自我的能动自主。

但是为什么女人比男人更在外表身体上着力去表现与形塑自

我？主流女性主义对减肥瘦身的「受害者想像」掩盖了什么重要因素？这就是下一节的主题：性。

### 三、性

#### 性不是性别权力的产物

如果说当代的减肥瘦身现象应该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脉络结构所产生的「现代性」的动力趋势中去寻求解释（这些动力趋势或结构力量显然并不能被化约为性别权力），那么，在多大的程度或范围内，女性主义对于减肥瘦身现象的性别分析是有效的呢？我将说明女人的减肥瘦身现象所溯及的性别不平等，终究还是和诸如女人的就业率、薪资水平、就业年限、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相关，而不是主流女性主义所认为的男性权力或媒体呈现将苗条美感强加于女人——后者正是一种性别化约论的观点。

「性别化约论」就是将性感与美貌都当作男性权力的产物，在这个框架之下，女性的减肥瘦身乃是父权宰制下的非自主行为。之所以称为「性别化约论」乃是因为它把「性」与「美」都化约为「性别权力」，易言之，性感或美貌都是被性别权力所决定的；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化约论」理论模式相似：性别就是基础或下层建筑，性与美则是无法独立自主的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性别权力关系，就决定了性与美的性质。在男性权力支配女性的性别关系下，性感与美貌就都是男性权力的产物，是为男权服务的。主流女性主义（沿袭英美基进女性主义）对于减肥瘦身、性感美貌的分析基本上就是上述的性别化约论。

台湾过去也有一些非「性别化约」的分析，例如，何春蕤曾就女

性减肥节食现象提出「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分析，她否定女性只是因为受到男性主导的新审美观的影响而追求苗条瘦削，更重要广泛影响的脉络其实是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关系与工作伦理之变化（注9）。本文对性别化约论的批评尚不止于此，而是批评其基本理论模式及其「权力」观，因为性别化约论将女性减肥瘦身当作是一个纯然受害的经验（而没有培力或其他正面作用的可能）、是不平等的性别权力透过媒体而影响女性审美的结果（但是权力与媒体真能造就身体的美感吗？），而且，性别化约论还认为：不平等的（性别）权力的作用下没有自主空间的可能，权力本质上是压抑的与负面作为的，例如媒体的洗脑宣传就一定会导致顺从的行为（注10）。下面我将更详细地对主流女性主义观点提出批评。

首先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主流女性主义的想法，就是（a）媒体呈现出一个美貌性感的苗条女体，（b）女人看到后脑海中就欲望并认同这个苗条女体的图像，（c）因而就开始以行动（减肥瘦身）来改造自己的身体。所以这包含了三部曲（a）媒体呈现、（b）心动接受、（c）身体力行。

不过，从（a）到（b）向来就有所谓媒体呈现的接收（reception）问题，也就是（例如）看了政府的宣传片后不是每个人都会心动接受的。

但是更有问题的则是从（b）到（c）；因为我们对某种呈现的欲望或心动认同，不一定能转化为行动或身体的实践。例如我可能欣羨某人有钱或有音乐才能，欲望自己成为那样的人，但是我不一定会采取任何具体行动；或者，我可能非常认同或想做个很美丽的人（或胸大的人、清纯的人），但是我仍然不会身体力行去改变自己，因为我可能也同时接受自己的本貌（或同时也接受自己胸小、风骚）。主流女性主义的错误因此是假设（b）「女人认同并欲望媒体呈现

中的苗条女体」到(c)「女人从事减肥瘦身」之间有个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文则认为(c)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减肥瘦身」基本上扣连符合了晚期现代的社会趋势与动力（涉及了多样的知识／权力、也就是多样的专家论述与制度机构），例如控制饮食其实是晚期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存在之道」，因此这才促成了人们身体力行的从事减肥瘦身。

不过，女性主义可能会坚持质疑：(a)或(b)难道没有性别权力的问题吗？女性主义会认为男性霸权使(a)媒体将苗条呈现为性感女体，而虽然由于「媒体呈现的接收reception问题」，女性主义现在可能会承认：即使(异性恋)女人想要取悦讨好迎合男性，女人也未必就会(b)欲望与认同媒体呈现的苗条女体。但是不论如何，(a)媒体宣传洗脑「苗条就是美貌性感(性吸引力)」这件事似乎有男性霸权在背后。

其次，女性主义甚至也可能会同意：我们不能认为由于(b)女人想变得更美、更性感，以便在择偶市场上竞争，因此就直接导致了(c)女人从事减肥瘦身。(b)与(c)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可能也有问题，因为若是没有晚期现代相关于身体与自我的知识／权力，以致于在自折回应的身体与自我形塑中，(例如)一方面将身体视为可被医疗(外科、药物等)所操作的对象、以及将身体视为自我的体现与筹划，另一方面则有用药观念的改变、医疗外科整型的发展，那么透过药物、身体整型来(c)进行减肥瘦身，是根本不可能的。之前我也显示由于控制饮食(消费)的现代性发展(如控制饮食消费与形塑自我认同的关系、召唤「自主消费」能力、饮食工业与健康论述等等)，才使得控制饮食成为普遍的(c)减肥瘦身实践。

但是，(b)女人的认同与欲望苗条女体，是否至少提供了一种心理动机去使女人(c)从事减肥瘦身呢？我的回答：只有在特定条件配

合下才是如此。这个问题可以用下面例子来说明：由于西方男性普遍地在全球吃香，一个亚洲男性可能会认同与欲望（幻想）成为西方男性，但是在没有「变种族手术」与相关的知识／权力变化前，很难想像此人有心理动机去「换脸变身」（因为这个行为没有相关的药物工业与医疗制度与法律的支持、没有变种族的流行故事与可实际达成的想像、可能无法进行人际互动或自我呈现、可能无法躲避污名等等）。因此，正是因为「换脸变身」（除了「变种族手术」外，还包括自我认同、社会制度的相关实践与论述、可实现变身的想像——如变身后的幸福或循常的生活等等想像）（注11）成为可能选择后，才会有此心理动机的存在。相同的，正是因为存在着与「减肥瘦身」相关的自我与身体的现代知识／权力，才会有从事「减肥瘦身」的各种动机。

很多人会自认为她们减肥瘦身的动机就是想要变得像媒体呈现中那样苗条或吸引男性目光，这当然是事实；不过减肥瘦身有时还有其他不同的动机（例如有些中老年妇女可能是为了休闲或养生，有些人是为了那是流行的风潮，还有人是追求新知新实践，甚至有人想要试用新产品）。重要的是这些减肥瘦身都采用了相同的身体技术（和控制饮食、个人运动、使用药物、身体整型相关的各类技术），值得提示的是，这些技术并不是专门为了减肥瘦身或苗条性感而被发明出来的，而是各自有其知识／权力的场域与系谱，并以不同的面貌被施用在其他事务上（例如记录与监视体重、计算食物热量等等都不是因减肥目的而发明的；更笼统的例子还有，控制饮食乃是控制消费的一部份，后者则施用在饮食以外的消费上）。

最重要的，这些技术及其相关的知识／权力同时也是构成现代自我与现代身体的技术与知识／权力。换句话说，不是因为凭空先存在着一群追求苗条的女人或心理动机，因而有了减肥瘦身的诸种

行为；而是因为先有了可挪用于减肥瘦身的多样技术与相关身体的知识／权力，故而才有愿意与能够采用这些技术去形塑身体、打造自我与规训行为的人，进行着许多我们目前看到和身体与自我相关的活动，诸如刺青穿洞、自拍写真、荷尔蒙治疗、割双眼皮、抗失眠、束胸、染发、变性等等的「做身体」行为。减肥瘦身只是其中可能之一。当减肥瘦身的知识／权力技术可以正当地被用来打造苗条身体时，为了追求美貌性感的苗条而减肥瘦身的心理动机也就出现了。技术与动机，两者互相开发、彼此强化，使得减肥瘦身益发地普遍。

有人说女人自古就是追求美貌的，但是前现代的女人却可能没有（动机）追求苗条，若说这是因为「苗条身体并不是前现代社会所界定的美感」，其实并没有抓到重点。我会说：因为前现代社会并没有现代社会才有的个人运动、药物使用、身体整型、饮食控制等等相关技术与知识／权力，所以前现代女人即使认为苗条身体是美的，也没有动机去实际减肥瘦身，因为前现代女人的自我与身体缺乏相关知识／权力技术，因而根本不可能进行减肥瘦身的自我或身体。前现代男性对苗条女体的欲望，并不能促使女人进行减肥瘦身；女人减肥瘦身的实践与动机是在一个当身体与自我都可以被规划与形塑的社会才存在的，自我与身体的筹划则是（在个人主义化下的）个人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专家、资讯、知识、技术时，不断做出回应的状况中进行的（包括对新资讯新技术完全相应不理的回应）。这基本上是晚期现代人的「生存之道」，并不单纯是专业支配（专家统治）或其他权力支配的受害、无力，而有着培力、能动与自主的成份。

有人或许会继续坚持，现代女人的减肥瘦身背后还是可以归结为：取悦男性欲望。易言之，如果男人认为丰腴才是美，那么女人

就会去增胖，毕竟，不论女人是减肥还是增胖，「女为悦己者容」嘛，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不过，在晚期现代越来越开发与筹划自我的动力下，造就了显着的自恋文化，因此最大的「悦己者」恐怕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更有甚者，想简单的以「追求美貌以取悦男性」来涵盖不同历史—社会的女性身体实践（其实也就是以「父权宰制」来解释所有性别现象），只能把减肥瘦身当作一个被宰制的、受害的、无力的经验现象，而无法看到减肥瘦身与现代自我的其他更广泛的身体实践之密切关连。

晚期现代人越来越把身体当作反思（自折回应）的筹划对象，也就是不断参照各种知识资讯，将身体当作一个可塑事物来管理和改变（我称此现象为「做身体」）。由于各种权力都对身体施以影响，身体可以说是诸权力的战场。值得提醒的是，这些权力并不都是压抑性质的、有些是诱发鼓动或甚至培力的。在像控制饮食、养生保健、规律运动等等这些身体管理中，对身体的控制与自我规训可以带来自主、有力、能动的感觉。这些感觉即使是幻觉，也是生存与反抗的基础资源。更重要的是，由于身体外表越来越和内在自我连结，「做身体」也就是「做自己」。我所谓的「做自己」并不是一般励志小品、妇运论述、广告宣传上所谓的做自己，不是「忠实于本我」的意思。「做自己」，指的是「将自我当作一个开放的、可塑的筹划」，亦即，以自折回应的方式形成自我认同、塑造生活方式或风格等，而这通常和身体管理密切关连。减肥瘦身就是做身体、做自己的一种实践。

总之，晚期现代的各种减肥瘦身实践，必须放在晚期现代社会本身的内在动力与趋势中去理解。仅仅用「追求美貌」或者「男权支配」或者「媒体洗脑」来解释减肥瘦身的动力与动机，显然是忽略了减肥瘦身这类身体实践所座落的历史—社会脉络。正是由于这个脉络



的存在，才使得「（追求美貌的）动机与（减肥瘦身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得以可能存在，而且这个脉络同时也构成了减肥瘦身的主体与动机。所以，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机械因果观来看待「晚期现代性」与「减肥瘦身」之间的关系。

但是，针对上面的（a）（b）（c）三点，女性主义可能还要追问：为什么（a）媒体将苗条身体呈现为性感美丽？或者更根本的：为什么只有女体才是性感与美貌的化身？为什么不把男体也性感化、美感化？这是否为性别不平等所造成的？其次，女性主义要追问：为什么（b）当代女人会认同与欲望媒体呈现中的苗条身体呢？还有，为什么（c）主要或多数是女人而非男人从事减肥瘦身？等下我会提出一些和主流女性主义相当不同的看法。

\* \* \*

让我先将上述想法更进一步地铺陈如下：

主流女性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男性权力支配」与「女人的减肥瘦身」之间有着强烈的因果关连，亦即，性别的不平等权力造成了女性的减肥节食。「权力」在此处被设想为纯然压抑与强迫性质的。不论如何，女性主义的基本前提可能涉及了好几个不尽相同的假设：1）男性的不平等权力，造成文化（或女人）以为瘦身苗条才是美貌性感的身体，亦即，女人的美感或性感是被男权所塑造或定义的。2）男性的不平等权力是造成女人追求美貌性感的原因，亦即，女人欲求性感身体或女人爱美，不是天生的，而是因为男性权力所直接或间接强制的。

至于女性主义将瘦身减肥议题与媒体批判挂钩，这也涉及两个假设：3）男性不平等权力决定或造成了大众媒体所呈现的性感苗条女体，亦即，媒体呈现是男性权力的体现或工具。4）大众媒体所呈

现的性感苗条女体造成了女性减肥瘦身，亦即，由于女性看到媒体呈现的性感苗条女体，而进行减肥瘦身实践。

这四个假设都颇有问题。但是借由它们，女性主义才能进行所谓的媒体批判以及对于减肥瘦身的批判，因为这四个假设建立起「女性的减肥瘦身」、「媒体呈现的苗条性感女体」、「男性权力」三者之间的紧密因果关连。

事实上，男性权力（父权宰制）是上述女性主义分析的原点：1）男性权力定义了女人的性感或美感，2）男性权力迫使女人追求这样的性感与美貌，3）男性权力以性感女体的媒体呈现为工具（或父权根本就化身在这种媒体呈现中）。由于上面三点，所以4）女人因媒体呈现的影响而进行减肥瘦身，追根究底其实是男性权力造成的。

本文的立场则是否认男性权力作为原点的分析（注12）；易言之，本文认为1）性感美感的定义、2）女人追求性感或美、3）大众媒体呈现单一性感样态的女体等等，其所涉及的权力与社会动力不能归诸于单一的「男性权力（父权支配）」。由于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全面探讨它们是不可能的，故而以下我一方面对上述女性主义假设的可能谬误做些简单的提示，另一方面则提出我的替代解释。我将先讨论1）、2），稍后再讨论3）、4）。

首先，如果女性主义主张「女人性感或美感乃是男性权力的产物」或者「男性权力决定或定义女性美」（即，上述的1）），这显然是一种相当粗浅的性别化约论；很多现象都表明：美貌与性感不能只归因于性别权力，美感或性感显然还受到阶级、种族、文化的影响或甚至建构。不过性与美似乎也有其独立自主的面向，例如生物决定论者就强调美的独立自主（不受文化社会影响）之生物面向，虽然其论点缺乏历史发展的视野。由于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尚称完整的解答（注13），此处就只简单提示如下：

我基本上主张，美感或性感既有其生物性别的起源和决定因素，也有社会文化的影响（因为不同文化会产生不同但也有共通处的美感或性感），但是重点是：特定社会的美感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或结构内的元素与规则虽然会变动演化，但是不会任意变化，这样才能解释不同历史时期美感或性感标准的差异演变。美感系统之所以会在商品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产生较大的变化而逐渐脱离生物性别的基础，其变化主因则是来自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以及美貌工业与性感工业的发达（下详）。在去传统化与个人主义化的影响下，个人对美感的操演也开始影响着个人的美感或性感呈现；这是晚期现代的个人在美感系统结构下的能动性的表现，其背后因素则是各个社会的美学系统的许多元素在全球化下开始「漂浮」，因而给予个人较大的操演空间。事实上，我相信：如果美貌与性感完全是由性别权力所决定的，那么男人（而非女人）才应该是美与性的化身与体现，正如同在一般的文化中，优势种族（而非劣势的被殖民种族）才会被呈现为美感与性感的化身与体现。

稍后，我还会再提到这个「美感与性感是被男性权力所定义的」问题，并进行更复杂的一些讨论。

其次，男性权力是否迫使女性追求美貌与性感身体呢（即上述的2））？从历史角度来看，当婚姻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转变为建立在当事人自由两愿的选择上时，男女的择偶以及延伸出来的公开社交（包括所谓的追求、谈恋爱）都使得外表的性吸引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自由恋爱的文化中，男性不再只是靠着拥有财产或地位身分家世，个别男性的青春外表变成了求偶的重要因素：十九世纪以来，许多爱情小说的标准情节都会安排女主角为了爱情而放弃年纪大但有身分财产的男人，而没有资产实力的年轻小伙子则是女主角倾心的自然对象。同样的，在自由恋爱的文化中，女人也必须在外

表上充分吸引男性，外表几乎成为女人在婚姻爱情市场上最重要的资产。

但是女性外表的重要性增加，是否只意味着女性在男权下的受害、女性身体的被物化宰制？

首先，我认为现代女性的注重外表，其实是「强化女性自我」的一种方式。让我解释如下：由于择偶追求文化的出现，外表与身体对男性女性都变得很重要，但是与此同时，现代个人化的自我（及相应的强调自我交流的现代爱情）也在急速的发展中。男性在公共领域的诸多活动强化了其个人主义化的自我，女人则相对的缺乏个人主义化的条件（例如，女性就业率、薪资水平、就业年限、专业发展一直较男性低，因此较难独立自主存活于世）。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也提供了强化个人自我的其他管道。由于文明化过程在现代的大幅进展，外表与个体自我有着逐渐紧密结合的趋势：亦即，以外表与身体来表达自我、表达个（体）性的知识／权力逐渐发展到位（注14），以及伴随着外表与身体的商业开发（服装工业、美貌工业）。其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一方面促使（也同时提供）女人在这个择偶追求文化中所追求的（也同时需要的）衣服与仪态、化妆与美容、整型与瘦身等等物质条件出现；另一方面，女人在公共场所或择偶市场上发展的争奇斗艳、突出自我、与人竞争的外表与心态，形塑也强化了女人的个人主义化自我。特别因为外表是个人必须经营的资产，而不是传统、阶级、家庭、身分地位所传承赋予的（*endowment*），女人因此在各种和外表相关的资讯、专家、论述下都必须高度自折回应地选择所需要的外表，也就是能够表达自我的外表（服装、化妆、风格、仪态、气质等等），有时还必须尽量排除原先传统、阶级、家庭、身分地位所赋予外表的可能限制，故而女人也可能借由这种外表的公共竞争来达到个人主义化的自我。值得注意的是，女人当然会因为比

男人更需要注重外表，因而对外表有更多的反思或自折回应的筹划，也因此带来比男性自我更多的、对外表的自我监视和焦虑，可是同时则因为对外表有更多的自主与操弄能力，因而也在体现美感和性感上远远领先男性。

上述的说法同时解释了：为何一般而言女人比男人更在外观身体上着力表现并形塑自我，以及为什么主要（多数）是女性而非男性热衷从事减肥瘦身。扼要的说：**女性比男性更注重「做身体」，是因为男性还有其他「做自己」的方式**；这个两性差异显然很主要的和就业率、薪资水平、就业年限、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相关（然而，更着力于「做身体」，本身并不是不平等或受害，反而可能是对于不平等和受害的一种补救或力争）。本文认为这就是在女人减肥瘦身现象中可溯及的性别不平等——亦即，在作为个人主义化的现代自我条件上，女人在就业市场的资源不如男人，但是更着力于「做身体」则可以强化现代自我。这个观点相当有别于主流女性主义的性别化约论：后者认为减肥瘦身所涉及的性别不平等，乃是性别化的性感或美感的问题，而不是个人主义化所需的经济条件问题。另外，由于女性（而非男性）是文化中美感与性感的化身，所以女人在使自己外表身体变得美貌性感上，比男人要着力更多；特别是，因为女人可以「上嫁」，所以女性有更强的诱因去增加美与性的资产。对这些现象本文也有着不同于性别化约论的解释（下详）。

照这样说来，现代的择偶追求文化有其复杂的效应（男女两性均开始注重外表只是其中之一表面影响），这个源起于「自由婚配」的历史发展，很难用诸如2）「性别不平等迫使女性追求外表美貌与性感身体」来总括。事实上，现代的择偶追求文化，包括相关的社交公开、外表身体（与连带的自我）之开发筹划、美貌工业与性感工业的兴起（下详），也是「性的现代化」的一部份，和本文所谈的「现代性」

动力有着间接的一些关系，此处姑且不论。让我先回到择偶追求文化与2)的关系话题来。

如果说之前媒妁婚姻的主导权在于家长与男人，那么自由婚姻的主导权则因为择偶追求的文化发展而开始逐渐由女人来分享。这个主导权力变化的重要的因素就是「性」。性干扰并打乱了男性权力的算计，女人则借着性吸引力来与男人争取权力。

女人的性吸引力，在一定范围内扭转了性别权力。原本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婚姻内，女人是被动的被男性（家长）选择的，女人可说一无权力筹码；现在在自由恋爱的历史时刻，女人变成了男人需要积极追求争取的性对象，而很多时候男性必须彼此竞争以赢取芳心，女人则可以借着外表或性吸引力来争取更多的权力；例如下层女性可以靠着美色来和上层男人进行经济上对男人可能不太合算的交换，而且，不只是这种「麻雀变凤凰」的上嫁婚姻（注15），也还有其它形式的不等价交换。总之，在自由婚配的择偶追求文化下，女性对自身美貌与性感身体的追求，不能被简单的归诸于男性权力的强迫，因为女性追求自身的性感美貌将带来实际的利益、与男性的权力拉锯、以及议价筹码。

不过，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把女人对美貌性感的追求当作男权支配的结果，所根据的理由则有好几种：例如女性是为了进入婚姻家庭才追求美貌性感，因而女性难逃结构性权力的支配；或者，女性对美貌与性感的追求是浪费心力时间的无用行为，使得女人无法像男性一样追求真正有社会价值的事物；或者，美貌性感的追求可能造成天生美丽者与丑陋者之间的不公平；女人对于美貌性感的追求，形成对自身身体的规训与不自由、不自主；或者，女人对于美貌性感的追求乃是受制于男人的美学观感与性欲需求（即之前提过的，男性权力定义了或形塑了女人的美感与性感）。

限于篇幅与文章的可读性，我不打算详细深入论证，而只约略地提示几点来回应上述理由。首先，我们不应该从「社会结构」（如父权社会这个观念）来论断所有的权力关系与现象（如婚姻家庭）都是一面倒的必然支配，这样的化约论断也无法说明反抗权力的来源（注16）。

其次，作为其他女人性对象的女同性恋，也同样地追求世俗所认定的美貌与性感身体，与一般异性恋女人并无显著差异。这显示美感或性感有其独立于性别权力的面向。

再者，女人对于美貌性感的追求虽然会形成对自身身体的规训，但是这个自我身体管理，既会带来焦虑脆弱与限制，也会带来能动有力与愉悦。很多人看到女人对于身体的开发与耕耘远胜过男人，因而认为女人比男人承受了更多的身体压抑与负担（注17），但是如果我们考察「性」此一身体面向，我们同样地发现男人对于性的某些方面之开发与耕耘远胜过女人，虽然这也会带来焦虑脆弱与限制（例如关心生殖器的大小与形状、性交的持久、勃起能力、对于性事的高度兴趣与性经验的丰富等等），但是没有人会认为男人因此必然沦于受害、被宰制、无力的境地（注18）。由此可见，对于身体的规训管理与开发耕耘（如商品化），并不能简单地视为结构权力强加于身体的压抑或受害。男人的健力士锻炼（body building）多年来也广泛地被女性所采用（注19），至于体育活动中的身体开发与规训也是两性均有，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参与这些活动的女人都是受害或被宰制的性质，因此我们也不应该从女性的开发与规训来推断女人必然受害与不自主。有人批评女人的「做身体」现象是「无主见的追随流行或丧失自我的一窝风」，但是正如之前我在讨论「外表」问题时得到的结论：女人在「做身体」方面反而比男人有更多的自折回应的筹划，因此这个实践其实强化了女人原本较缺乏的「个人主义化的自我」。

此外，女人所追求的性感与美貌并非毫无社会价值之物，因为美貌与性感身体可成为增加人生机会的资产，不但本身就可能直接交换到实质利益，而且还可以带来力量、愉悦等正面事物。在美貌与性感身体益发商品化的历史阶段，美貌与性感基本上只被女性垄断，这乃是增加女性的市场资产。这种性感女体商品化的意义，则是使女人可以依赖市场而生存，不必再依赖特定男人或家庭。性感女体的消费者并不只是男人，例如服装工业与化妆美容工业等等普遍地使用性感美丽的女模特儿，其诉求的消费者几乎都是女人。由于只有女人才体现美感与性感，所以就连儿童商品或儿童节目也会诉求女体；性感美貌女体的消费可说是不分男女老幼的——除非受到传统或「文明」的限制，如公共不宜、儿童（妇女、老年、病患）不宜等等。

另一方面，在一般日常或普通商品也不断的性感化的状况下，「性感工业」使女性有更多的出路资源或相关职业选择，也使女性的公共可见度益发提升——因为到处都需要性（感）来贩卖各类商品，sex sells！不只是漂亮的电视女主播逐渐取代了原本需要男性权威的新闻传播，还有许多原本与性／别无关的商品，如房屋销售的广告搭配着女体，产品设计使用女体形状等等。这之中有些可能是为了吸引注意，但是基本上和女体所代表的「性」在文化中既被当作压抑禁忌、却又被撩拨诱发有关，因此性的欲望成了商品欲望的源头活水。

这里所谓的「性感工业／工作」，就是实际或象征地生产或贩卖「性（女体）」的商品与劳务，这当然包括了狭义的「性工业／性工作」（如卖淫）。然而现今几乎所有商品与劳务都有「性感工业」的层面或元素，只是有些比较直接（商品或劳务内容就是女体），有些比较间接（如广告行销涉及女体）。当然，就像所有被商品化的资产一样（如音乐才能的商品化等等），女体的商品化也存在着可能剥削与「危险



的权力」，但是商品化绝非一面倒的压迫。

性感工作或女体商品化本身并不是压迫女性，但是当美貌性感只被女性所体现，因此性感工业只被女性所垄断时，固然在今日的商品社会中带给女性一些实际利益，不过也会引发「性感工作的文化意义或文化形象」的问题。亦即，性感（外表、身体、性等）在文化中不像「智慧」这些被看重的特质，而有着被贬低或甚至污名的问题：性感工作即使收入很高，却不如智慧工作在文化中有较好的形象或较正面的意义。其原因和文化本身是由不劳动的男性统治阶级所主宰的传统有关，所以「文化」重视心灵智慧，轻看劳动身体，重视内在升华，轻看外表本能（而女人、性、生殖都被视为接近本能）。（另外一些重要因素则还有文明化过程对性的压抑、婚姻霸权对性的垄断等等）。如果一种性感工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有较为绝对的性别区分，其在文化中的意义或形象便可能会倾向于复制性别不平等；这就是一些反对卖淫的女性主义者所持的说法，即，性工作大都是女性从事而男性消费，因而复制了目前文化中原有的性别不平等意义、即复制了男尊女卑（男主女奴）的形象。我认为这个「目前性感工作的文化意义复制了性别不平等，因此性感工作是压迫女性的」论证其实是难以成立的（注20），但是此处可以略过这个问题，而提出可能改变性感工作的性别文化意义的三个方向：

一、性感工作的消费者若能够不分男女老幼，则其性别意义可能会被淡化。其前提则是「性的公共化」、「文明的非正式化」这些趋势的持续，所以必须打破「儿童不宜、公共不宜」这类限制。

二、和上述这些趋势相关的「性开放」，虽然可能会使得性感工作的污名淡化，但是往往文化形象提升的只是一部份性感工作，也就是对应着具备文化正当性的「健康、正常、高级的性」（而非「偏差、变态、低级的性」）。因此，针对这种性的阶层化（高级／低级之

分)的「性解放」运动乃是必要的。

三，若是有更多想要消费男体的女人、以及更多从事性感工作的男人，虽然男人将因此而分食性感工业的大饼，但是却能改变性感工作的文化意义。不过目前少数开始体现美貌与性感的男性、或者被当作性客体或性工具的男人，恰恰不是女性所欲望的「新好男人」，而是被视为性变态、性偏差、女性化的男人。同样的，对消费男体有欲望的女人也被视为花痴、或女人中的「背叛者」。故而如果要改变性感工业的性别结构，对于边缘男体（如同双性恋、跨性别、小白脸、娘娘腔、男妓、BDSM中的男M或男奴、化妆爱美自恋男等等）以及「男性化的女性欲望」（男体的消费者）的性解放策略是必要的。上述有些偏离主轴的讨论其实是要显示：有关美貌性感所涉及的性别不平等，和性的压迫与解放密切相关，而不仅仅是男权压迫而已。

跟性感工业同步发达起来的，还有服装美容化妆整型工业——可简称为「美貌工业」。美貌工业使得美貌与性感身体从「天赋」（endowment）益发地转变为「资产」（asset），也就是使美貌与性感变成一种「选择」、一种「投资」。换句话说，美貌工业使得美貌与性感愈发地普及化，而不是只属于少数天生美丽或天生性感身体的女人。原本只是少数幸运者才能拥有的美貌与性感，开始变成几乎多数人均可得到的资产。虽然仍然有很多女人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近用许多「选择」（例如不愿意化妆或追求美貌的女人、或害怕自己成为性感的女人等等），但是美貌工业确实使得因美貌的天赋差异而可能存在的不公平人生机会得到了救济。

当然，美貌工业就像其他工业一样，在创造产品的丰裕普及之同时，也可能有着大量生产下的标准化的缺点（例如有些社会中的肥胖者买不到性感衣服）。然而美貌性感的多元化必须建立在美貌性感

的普及化基础上，毕竟，没有普及化的美貌性感（即美丽性感者只有少数），多元化既没有意义、也很难「多」元。所以，美貌性感的多元化（多样标准与不同典型的美感与性感）其实依赖着发达且不断演化的美貌工业。（稍后我会再阐释此处论点与减肥瘦身的关连）。

不过美／丑之分始终没有成为像性一样的权力关系：女人之间的美丑差异，并没有像良妇与淫妇的性差异一样成为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例如，美丑之分似乎并不决定个人的性爱机会，不是美女才拥有较多的性对象，真实与网路世界里多得是面貌平庸的性爱天后。一般人常认为丑女没人爱，但是Randall Collins的研究显示，人们在择偶时会选择与自己各方面条件相似的对象，易言之，丑女还有丑男或其他丑女爱，若丑女还有择偶市场上的其他良好条件，则会使她更容易择偶。而且，不论美丑，择偶都有某种不确定性在内，事实证明，美人不见得就能顺利择偶（注21）。美／丑之分是否对个人的人生机会在目前不为人知的可能影响，则还是个开放的问题（目前对美丑的社交与就业影响只有些结论不确切的研究）。

美貌与性感既然在择偶追求文化下对女人愈形重要、不断加码，自然会带来焦虑、脆弱、风险等等，然而也同时带来力量、愉悦、资源。走在街上被凝视时同时感受到的愉悦或不安似乎可以说明这种矛盾情况。然而随着性开放、社交开放、性别平等、美貌工业与性感工业的开发等等历史变化，走在街上被凝视的已经不是单纯的被动客体，而是女人主动操作他人的凝视（从短裙露背到低腰丁字裤露胸露股沟等服装可以清楚看出这种操作的企图程度）。在今日街上，被观看窥视而产生愉悦自信的可能性，更多地胜过产生不安不悦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在美貌与性感的普及化下，越开放的性文化（女性不

再受贞操束缚）、越开放的社交择偶文化（在婚姻与交友市场上女性可将自身美貌效用发挥到最大）、越发达与正当化的「性感工业／工作」（也就是被女性所垄断的就业机会），将使作为「性与美」化身的女人更为自由、有更多机会与选择，更容易得力壮大。这些都是随着社会文化变迁而可能继续扩大的契机，而如何在此趋势中帮助女性克服危险、剥削、支配等负面影响，当然就是对女性主义的挑战。很明显的，为了保障这些趋势持续提供女性发展的机会，女性主义也应该积极批判性感工作的罪刑化、污名化和阶层化（例如电视女主播比槟榔西施更高级，后者则被污名）（注22），更需要批判有关贞操、第三者、淫妇的传统道德论述。

\* \* \*

最后让我们回到女性主义关于媒体批判与瘦身减肥的另外两个假设：3）男性不平等权力决定或造成了大众媒体将苗条女体呈现为性感，亦即，媒体呈现是男性权力的体现或工具；以及4）大众媒体所呈现的性感苗条女体则造成女性减肥瘦身，亦即，女性看到媒体所呈现的性感女体，因而进行减肥瘦身实践。

让我先从较简单的假设4）谈起。假设4）显然对于媒体接收（reception）与媒体影响（媒体呈现对阅听人行为的控制）有着过度粗浅的理解。

我们很有理由怀疑媒体呈现（如呈现苗条女体为性感）是造成人们改变行为模式（如采取减肥瘦身）的直接原因，因为媒体呈现不一定会被阅听人所接受，事实上，阅听人的抵制与媒体批判的存在正说明了这一点（注23）。若讲到对人们减肥瘦身行为的直接制约，恐怕每日生活的面对面互动才是更可能的原因；例如走在街上时，他人对自己身体的羡慕爱慕目光、或我们对他人身体的厌恶鄙视等。我

不否认媒体建构现实以及影响路人目光的可能，但是在「媒体呈现」与「减肥瘦身」之间不可能是单纯简单的因果关系（表现为一种压抑性的强制力量或权力），应该还要考虑更多的脉络关系。就这个更广泛的社会脉络而言，前面已经说过，对于消费与饮食的控制乃是现代人的生存之道（参看本文第一、二节），这才是减肥瘦身的结构性因素。而「媒体（或男权）造成了女性的减肥瘦身」说法，就和「周星驰的媒体呈现造成影迷的次文化行为（如学星爷讲话等等）」或「媒体对刺青的呈现造成青少年模仿」说法一样，其实只是看到表面的关连，而误认为完全是媒体强大的行销力量直接对阅听人造成刺激反应的行为。影迷或青少年的看似失去自主，其实往往是对媒体呈现或商品加以主动消费或二度创造，借以表现自我（注24）。当代的减肥瘦身不是丧失自主，而是现代自我的「做身体」、「做自己」的能动性表现，媒体呈现则是现代人在自折回应地形塑身体与自我时所接收到的各种资讯、知识、专家、论述、制度、法令规范等的一种。

另一个和媒体接收（reception）相关的问题是：究竟媒体呈现了什么？主流女性主义在批判媒体呈现时，似乎只看到「苗条」身体被呈现为性感或美，但是这忽略了媒体呈现的多义性或歧义性。例如诉求中年妇女的瘦身广告显然也在促进中年女性的情欲能动与身体自主——当中年女性的身体完成生殖功能而趋向「无性、无情欲」之时，这些广告却呈现一个有情欲的中年女性形象；当中年女性前半生都在照顾家人身体之时（现在却面临空巢期），这些广告则鼓动中年女性要开始照顾自己的身体。又例如，很多瘦身广告呈现的女体都踰越了良家妇女的身体，投射出狂野性感或几近淫荡的「新女性情欲」形象（这种淫荡形象引发良妇女性主义的不安也是可以预期的），但是这种新女性情欲形象背后的欲望诉求却很少被当作焦点来探讨（注25）。

至于假设3）不应该被理解为「媒体呈现是直接被男性权力所左右

操控的」，因为**商业利益**可能才是媒体呈现的直接肇因。有一种看法会认为：媒体之所以充斥着女体，追根究底的原因乃是，到目前的历史阶段为止，美与性基本上都只体现在女人身上（其原因则可能是性别的生物因素，或者如1）所假设的「男权定义了美与性」，或者其他更复杂的原因），以致于女人几乎就是美与性的化身或表现；因此女人或女体是被凝视的对象、是性客体或性对象；故而媒体就是以女体来呈现美与性。换句话说，媒体只是反映、顺从、维持或甚至强化了「女体（而非男体）才是美与性的化身」这个现实。不过，上述这个说法缺乏社会—历史的面向（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何在当代：苗条身体而非其他体型会成为媒体呈现性感与美感的主流），等下我还要再进一步讨论。

不过，美与性基本上只体现在女人身上，是否就是性别不平等权力所造成的？如何使男人也成为美与性的化身？——这些才是关键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更仔细地做历史发展的、人类学的与多视角的考察。例如，即使「只有女人才体现性与美」（这个是在人类大多数社会中成立的事实吗？）起源于人类历史早期（或史前时期）普遍的性别不平等，时至今日，当性别不平等的局势已经有变时，女人若仍然主要是美与性的化身，那么我们要追问：今日男人是否有欲望成为性客体与性对象？女人是否愿意或如何将男人当做性客体？如果男人也成为性与美的化身，女人是否认为这是有利于她们的？

有很多现象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回答的线索。例如，从跨性别与某些男同性恋中可以看出：当男人不必用「阳刚特质」来吸引对方时，男人显然很乐意成为美与性的对象。另一方面，在有关色情（性工作、性言论与影像）如今不分性别的普遍化的议题上，一些女人仍然拒绝将男人视为性客体（如反对男人卖淫的普遍化、反对男性性影像的普遍化等）。此外，在最直接的面对面互动层次上来看（如追求、

观看、性交等），许多女人似乎并不愿意将男性当作性客体。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推测，大部分女人会认为，当女人不再垄断美与性时，当男人成为女人所欲望的性客体时，女人便丧失了最重要的议价筹码，而这将是女性权力的灾难。

在女性拒绝将男人性感化或美感化的倾向中，一个有趣的例外则是亚洲同人女的BL（boy's love）漫画，漫画主角都是俊美近乎跨性别的男同性恋，内容则往往有性爱色情（“H”）的场景。或许这个现象是异性恋少女情欲被压抑后的折射，但是却另类地成为男人被女人性感化的前驱。

很明显的，许多男性也迫不及待地想打破女人对于美与性感的垄断、分享特权。不少男人欲望能成为性客体与性对象，但是却往往被社会视为变态，也得不到女人在互动中的回应。而且，男人的美与性感很难跨越「男性阳刚」所设下的界限；当界限被逾越时，往往就会被视为「同性恋」（当男人完全扬弃「男性阳刚」，或伪装为女性时，会立刻被异性恋女人所扬弃，并且被视为偏差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男人的美貌与性感工业当然只是在女人的边缘寄生而已。不发达的男人美貌工业中挤满了男同性恋和少数偷偷摸摸的男异性恋；很容易被现形（out）的男性化妆工业几乎不存在，容易隐形的男性保养则悄悄流行。不过整体而言，男性美貌工业都在「阳刚」的束缚下有限成长，因此也不可能造成男性美貌的真正普及。很多人觉得男同性恋与新生代年轻男人群中较多性感美男子，这和他们比较敢于利用美貌工业来表达自我直接有关。

在古希腊容许同性爱的社会，年轻男性与男孩也体现了性与美，此一美学传统在过去的艺术文化或今日西方通俗文化中比较偏重肌肉的线条，但是其与同性恋（「1号」）的关连则是挥之不去。在全球通俗文化的媒体呈现中，另一种男人美感或性感的表现则是偏重

脸部的美貌。早期的英俊常被形容为「脂粉味」，后期则更倾向女性美的跨性别（男女不分或中性）的美丽脸庞和长发，因而其文化形象与文化意义与同性恋（「0号」）有着更直接紧密的关连。由此我们几乎可以推断：媒体呈现的主流之所以仍然是女体，男体之所以仍然处在边缘，和主流社会对男同性恋的排斥与恐惧不无关系。

\* \* \*

上面我们触及了「媒体只呈现女体」的一些社会层面，但是我们还没触及：为何媒体呈现的性感与美感主流是苗条，而非其他体型的女体？这所涉及的性感与美感之媒体呈现的转变，必须从当代的一些性／别相关的历史发展来探讨。

女性主义对媒体批判的一个重要角度是：苗条女体透过媒体而成为性感身体的主流呈现，其他性感身体的呈现则受到排挤，因而在媒体呈现中只有单一的美貌性感标准。我有条件地认同女性主义此处所说的这个事实（下详），以下我将尝试解释这个事实现象的原因，但是我与女性主义不同的是：我不认为这个苗条女体的媒体呈现直接「造成了」女人的减肥瘦身（即，上述的假设4）。就像我在本文的前半已经说过的，我认为女人的减肥瘦身行为，其动力还是来自本身所处的现代条件，而非外在力量（男权支配或媒体呈现）的强制。亦即，减肥瘦身实质上就是身体管理与自我控制，这涉及了现代性的诸多动力所形成的现代自我特色：一方面自我监视、自我规训，另一方面则是自我肯定、自我能动。在减肥瘦身中，女性经验到的身体管理与自我控制，会给自己带来自主有力感，但是也可能带来焦虑或失败感，正如其他各种现代的身体管理与自我控制活动一样。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媒体呈现「苗条瘦身」为美貌性感的身



体，并不必然就成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审美标准。在每日生活的人与人互动现实中，人们对美貌性感的标准有很多主观的成份（例如多数人倾向接受自己的外表），彼此的审美观感也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因人而异（「情人眼里出西施」）。人们的性爱机会也和美丑关连不大（参看注21的正文说明）。换句话说，我认为媒体呈现的实际影响不是对人们行为的（压抑式的）宰制（面对面互动往往带来更强的直接控制），而是给予「苗条瘦身」文化正当性，以及使之成为性感的一种元素或一种审美标准。这使得人们可以用苗条瘦身来「做性感」（参见注13），例如穿上紧身衣裤来表现自己的美貌性感；相貌平庸甚至丑陋者也有以豪乳或苗条身材来傲人。在这个意义下，追求苗条瘦身提供了减肥瘦身一个直接的心理动机，以及文化正当性。

总之，我不认为由于媒体的呈现，因而使得现实世界中的女人疯狂地将自己身体形塑成媒体呈现的某个苗条典范；相反的，很多女人正利用（媒体所呈现的）「苗条」这个美感或性感元素来表现自己的性感美感，这就是在一个看似从众的行为中表现自我。

由于已经存在着减肥瘦身的诸多身体管理技术，例如在现代社会生存颇为必要的饮食消费控制（包括实际的与口头说说的），因此，一方面可以透过许多不同的减肥瘦身技术来打造与管理苗条身体，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为着追求美貌性感而减肥瘦身的动机。这两方面互相强化，从而开发了更多的减肥瘦身的知识与权力技术，也增强减肥瘦身的动机，使得减肥瘦身益发地普遍。媒体对苗条性感身体的主流呈现，未必会使得减肥瘦身实践普遍化（媒体对某个道德的主流呈现，如媒体宣传勿贪小利，却未必使该道德行为普遍化），但是却给予了苗条性感身体强大的正当性，因而间接地正当化了减肥瘦身的实践及其普遍化，并且给予女人的减肥瘦身一个颇为性别化的理由（即，追求美貌以取悦男人，而非理性的控制饮食、个人健

身、自我表现、自主能动等等)。

在我做了上述重要澄清后，现在我们可以来探讨苗条性感女体成为媒体主流呈现的历史原因。为什么媒体在呈现性感美貌时，苗条身体是其呈现的主流呢？我将从几个和青少年相关的历史变化因素来解释这个媒体现象。

首先，虽然大众媒体呈现的多半是成熟年轻女性的苗条身体，但是苗条身体就生物学而言其实是更年轻的青少年的身体。换句话说，当代性感身体的主流呈现，其实是建立在青少年身体原型之上。

苗条（表征着青少年身体）成为性感身体之媒体呈现主流，这个现象是青少年的性感身体进入公共空间与大众媒体、进入择偶追求文化与择偶交往市场、进入消费文化，以及青少年情欲解放、青少年保护等数个趋势所造成的。让我解释如下：

美与性自古以来在许多人类社会就是以「青春」（少女）为原型代表，这之中有美感与性感的生物因素（虽然这个因素可以某种程度的被社会文化建构所修正，例如「少女」这个范畴就有社会文化的因素）；但是长久以来，许多文明社会中的女性身体并不能在公共空间被展现（女性甚至不能进入公共空间，或者即使进入公共空间也因为管制性的女性服装而无法看见其性感身体）。西方与其所影响之下的世界随着1960年代公共文化的「非正式化」（即，规矩松绑、礼仪外表不拘谨严格），女性服装更大幅度的性解放（衣服更趋向强化身体的性意味），因此，女性身体甚至大胆暴露的女体都可以在公共空间被看见；这个趋势则随着大众媒体与电视的相继普及出现而有了文化正当性。紧接着，在青少年消费文化（伴随着青少年的择偶交友文化）的推波助澜下，西方以及全球许多地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更出现青少年情欲开放的现象：青少年进入择偶追求的文化，青少

女的性感身体也首次进入了公共空间，亦即，不只在公共空间与大众媒体中看见青少年，而且还看见青少年以性感诱惑来呈现身体——为此现象铺路的当然是之前（比青少年更年长的）女人性感身体的进入公共空间与大众媒体，这就是「性的公共化」；而这个「性」进入公共空间的现象，除了因为「性」本身的现代化，也和「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历史潮流不可分，后者则是由女性普遍就业（伴随着女性特质的商品化）、开放的择偶追求文化（两性社交公开）这两个大趋势构成。

易言之，在性的现代化之影响下，从现代女性解放的历史潮流开始，到青少年性感身体的公共呈现，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但是在后者出现的同时，对于青少年的加强「保护」也随之出现。苗条女体于是在此历史时刻确定成为性感身体的主流呈现。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青少年的性感身体进入公共空间，这个历史性发展乃是苗条身体成为女人性感身体的主流呈现的原因。当然，单就数量而言，性感年轻女人远比青少年较多地出现在公共空间与大众媒体中，但是成熟年轻女人的性感身体却多半以苗条为主流呈现、向青少年的典型身体看齐，这意味着青少年的（苗条）身体在各年龄层女人性感身体的竞争下「胜出」。

苗条身体在代表性感或美感的竞争中胜出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苗条身体本身即是代表「青春」的生物因素（而青春则是美与性的原型）。不过，青少年消费能力与消费文化的发达、通俗文化的青少年化（例如爱情电影不再以中年人为主角的趋势），也应该是相关原因。此外，我认为另一个可能原因则是：在青少年情欲开放的趋势中，青少年一方面是诱惑的情欲主体，另一方面又是被国家父母学校所积极保护的客体，这使得青少年的身体特别可欲。还有，对于已婚女人情欲的控制，即，限制年长女体的性感呈现，也会强化青春

（未婚）女体在媒体呈现的独占。在苗条身体成为媒体呈现的主流后，美貌工业趋向这个标准化的产品，以及保守的商业策略固守利润所在，这些因素也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或许有人认为，在媒体的公共呈现中（而未必是每日生活的互动中或个人真实的审美中），苗条身体在「美貌性感」的竞争中胜出，不应该归诸于「苗条」代表「青春」（因为表征着青少年的身体）的生物因素，而可能还是归因于性别不平等，例如就是因为男性偏好青春身体的苗条，所以透过媒体的性感呈现来规训掌控女性的身体与行为。但是，我们要追问上述说法中的假设：为什么男性偏好「青春」身体呢（当然这个假设未必普遍成立）？难道「青春」与「美貌性感」之间真的毫无生物或身体的关连、而只是人为灌输的虚幻观念？有无可能在人类历史社会初期，由于寿命的短促与依赖生殖来延续种属生存，使得美感性感和生物青春有较紧密的连结？这个美感性感的生物因素一直延续至今但是有修正变化；不过在人类社会进化尚未摆脱青春的生殖功能前，我推测生物因素在决定性感上还会扮演一定的角色。

上述主张「身体的美貌性感在某个程度上被生物因素所决定」其实是认为：身体虽然是各种权力争战的战场，但是身体不完全都是权力所建构或虚构的实体，身体还是个物质实体，本身有着顽强且难以化约的物质性（*materiality*）。易言之，身体的物质性有可能抵抗社会权力的形塑。本文主张身体的性感与美感无法化约为性别权力（即，不是男权的产物），也就是强调身体的顽强物质性不能被权力所形塑，而有着其独立自主的（例如）生物面向。（由此推论，「性」除了有其独立于「性别」的、自主的社会权力面向外，也有独立于社会权力的生物面向，故而「性」不是完全被社会建构的）（注26）。青春代表了客观的时间向度，然而身体不但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存在，

美与性则是时间在身体中的存在方式，当然可能有着个别差异与社会文化的影响（而非「决定」）。

正如我之前所说，虽然我反对将性感与美感全然化约为性别权力的产物，但是除了生物因素外，社会文化（包括性别文化）也会影响性感与美感。当代性感与美感在日常互动的生活现实中（而未必是媒体呈现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与个别性（可能不符合生物决定的或主流影响的美感性感），我认为是在全球化与美的商品化下性感与美感系统中的许多元素「漂浮」出来，因而给予个人较多的「做性感」机会来表现自我，这使得「做自己」也变成性感的（参见注13）。例如，体现青春的性感美感元素之国外商品或装扮风潮，可以被本地年长的个人运用来操演美感（做性感），从而抗拒本地的社会控制（因为是有某些正当性的「装年轻」），表现自己独特的性感。不过很多个别独特的美感与不同于主流的性感或身体，还没有得到媒体的主流呈现，因此缺乏文化正当性，因而在公共呈现的层次上也缺乏美貌性感的多元化。

让我再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说明我之前的论点：首先，成熟女性的丰腴身体当然也可以是性感的；事实上，在青少女性感身体进入公共空间以前，熟女的丰腴身体曾是性感呈现的主流（例如西方早期的性感月历女郎或电影银幕上之呈现——玛莉莲梦露并不是苗条身体）。但是当青少年的（苗条）身体进入公共空间后，丰腴身体就不再是性感身体的主流呈现了，而且在青春风潮之下，熟女也必须要以苗条来呈现性感。这个改变的主要原因就是：「苗条」代表青春（而青春就是美和性感）。

我基本上把「性与美」和「青春」的关连当作生物因素，而不是性别权力的虚构，但是性别权力或社会文化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影响或修正决定「性与美」的生物因素。其次，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发展，

一个社会的媒体可能完全不呈现青春的苗条性感，而只将成熟丰腴女体当作性感主流来呈现；虽然「青春」和「性与美」自古就有生物因素的关连，但是在性感青少年尚未大量进入公共空间前，表征青少年青春的苗条身体也不会进入媒体的性感呈现。在过去三十年左右，也就是青少年性感身体进入公共空间的历史变化时期，苗条女体才开始成为性与美的媒体主流呈现；其他新的历史社会条件如青少年的消费文化、通俗文化、美貌工业都可能对此媒体现象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另一个重要关键是：就在青少年进入公共空间开始「做性感」而且成为能动的性爱主体时，青少年也同时成为更严厉保护的對象；相对的，熟女身体反而不像青少年身体是一种被保护的禁忌。正是因为青少年身体的被强烈保护，反而使它更成为欲望的焦点，这使得表征青少年身体的苗条女体更成为性感身体的媒体主流呈现。

在这里必须澄清的是，在大众媒体中出现的多数女人当然是成熟的年轻女人，而非真正的青少年；大众媒体中展演苗条性感身体的也大都是成熟年轻女人，而非真正的青少年（由于就业的年龄学业限制，性感工业中就业的青少年仍然是少数）。虽然成熟女性的身体也可能天生苗条，但是女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一般都会从自然苗条走向丰腴（当然这存在着个别身体的差异），而使人容易发胖的当代富裕社会的饮食文化与饮食工业，则使得追求苗条身体者必须经常费力的减肥瘦身。

不过，青少年身体也未必在媒体呈现中得到全面胜利，事实上，传统的成熟女人性感性征，特别是乳房，一直保有其一席之地。富裕社会下的青少年身体当然也开始拥有突出的乳房，不过，丰胸和苗条身体有着生理学上可能的矛盾——丰胸还是比较属于丰腴的或成熟女人的身体，清瘦苗条的青少年则很少有巨大的乳房——

而在苗条身体成为媒体呈现的性感主流后，乳房在苗条身体的挤压下仍然脱颖而出，多少被夸大的方式强调着。以此来看，夸大的乳房、或者夸大的谈论乳房，可以被视为成熟女体或丰腴女体继续争取媒体性感主流呈现的一种结果。

综上所述，将公共呈现中被夸大的乳房，或将乳房成为焦点话题的现象，简单地分析为「物化女性」，其实是没有将公共呈现与择偶市场竞争中其他的美貌性感元素——苗条——放在一起理解的结果。我倾向于认为乳房现象是成熟女体（vs.青少女身体）、以及丰腴身体（vs.苗条身体）在媒体性感呈现中的另类多元化表现。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理解肥胖女人的生活，则可以发现许多年轻的肥胖女人都因为媒体对大乳房的性感呈现，而能在其生活中「做性感」：在一个肥胖难以成为美貌性感的世界中，肥胖女人往往只能以其一双巨乳而自豪，或在择偶追求的互动中（例如在网路中的自我介绍）以大乳房作为性吸引力。

值得一提的是，亚洲女性较偏好的「美白」，作为美貌元素，显然有文化的差异，有人将之归因为皮肤色调的美学差异，有人认为有着阶级或种族因素（黑色皮肤是劳动者的特色、较黑色人种是属于劣等种族）。然而从生物角度来看，年轻人比年长者的皮肤容易恢复白皙，所以美白也可能有代表青春的意义。另一方面，追求美白的效果则是使女性和室外体育和户外阳光隔绝，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着「女人安静居家／男人运动出外」的性别意义，不过良妇女性主义甚少对这个美白现象提出分析批判。从本文的观点来说，由于这个追求美白的身体实践没有涉及什么偏差行径（如厌食、催吐、腹泻、禁食等被视为危害健康的行为），也没有颠覆「性」的权力阶序（如平反淫妇），所以就相对地得到较少的批评或注意，但是关于美白作为美貌元素的呈现其实也是充斥在媒体中。

回到苗条躯体的议题。很多青少年「天生」就有苗条身体但是却也加入了减肥瘦身的行列，每日斤斤计较或严密监视可能只有零点几公斤差别的体重。这些成长于消费年代的青少年，其立足点已经和过去女性越来越不同，其减肥意义最能適切地用本文所提供的架构来解释，也就是晚期现代人的整体存在方式，透过身体管理来形塑自我。青少年或青少年是最积极地「做身体」、「做自己」的一群，这当然有年龄政治的因素与意义。

不同年龄的女人身体，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年龄指涉了已婚和未婚的身体：通常年轻女人或青少年身体就等于未婚的身体，年长女人的身体就等于已婚身体。更有甚者，虽然就生物因素而言，美貌性感的女体等于年轻的女体，但是就社会因素而言，已婚女人的身体却不应该仍是性感美貌的。例如，已婚女人不论多年轻，都很少留着未婚时象征着择偶追求的披肩直发。已婚女人的合理归属是「家」而非「公共空间」、「择偶市场」、「野外」等；已婚女人的性感美貌或「做性感」被认为是「不安于室」或甚至「淫妇」。

照这样说来，若媒体将年长女体也呈现为性感时，就有触犯婚姻家庭规范的可能。如果某些女性主义者的「媒体性感呈现的多元化」不是一句空话口号，那么势必要处理这个「已婚／未婚」、「良家妇女／淫妇」、「家／野」的媒体呈现政治。

#### 四、野

不驯与远离家园

在青少年进入公共空间、大众媒体、消费文化与择偶追求市场的同时，还有另一个重要历史社会发展影响到苗条身体的媒体呈



现，这就是女性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有更显著的晚婚趋势。这个趋势使得未婚女性往往在脱离青少年时期后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处于择偶交往的市场竞争中，因而仍然必须追求其外表身体的美貌性感以维持市场竞争力。她们之中有些人会使用苗条这个公认的美貌性感元素来表现自己的美貌性感（很多时候「装年轻」就是年长女性表现性感的方式），这意味着不少成熟女人必须比较辛苦费力地管理身体，这些都使得减肥瘦身成为普遍现象。不过不是所有三十岁上下或更年长的女人都有相当苗条的身体，此时媒体将这个年龄层的某个女星呈现为苗条性感，往往并不必然是对这些女人的负担压力，反而是对她们的「性感化」：表示不年轻的她们仍然「性感」、仍然是择偶追求市场上可欲的对象。换句话说，当媒体将某些少数年长女人呈现为苗条性感风骚时，实际的大多数年长女人不必如媒体呈现的那样苗条，但是却能同时也被「性感化」，而成为可欲或可被追求的对象（注27）。

婚姻和性感身体还有另一层关连。如果这些年长（虽然未婚）女人的典型（丰腴或成熟）身体也被媒体呈现为性感，那么就会有一种暗示效果：由于从外表来看，年长女体在文化中会被等同于已婚女体，这么一来，已婚女人身体的性感就会连带被视为是有正当性的。因此，如果媒体呈现年长女体为性感的话，将会连带使得已婚女性性感化，这不但会使已婚女人开始自觉性感，也会使已婚女体在公共想像中成为择偶追求的可能被欲望对象。试想，如果一部描写已婚女性性欲暗流的电影〈麦迪逊之桥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能够如此撩拨人心、使很多人不安，那么，年长／已婚的成熟女体在媒体中的性感主流呈现，当然会很容易被连结到令公众恐惧的出轨、外遇、不伦、婚外情等等。这个顾忌不但阻碍了媒体呈现性感身体的真正多元化，也使得年长而性感的女人在媒体中出现时大多

都会先表明其未婚的身分，以免遭致谴责。美国电视影集〈黄金女郎〉（*Golden Girls*）呈现老女人依然有活跃的性生活与择偶追求活动，但是在将老女人性爱化的同时，却也表明她们都是未婚的。

一般都认为不论年轻或年长男性都只欲望年轻女人，但是事实上，年轻男人欲望熟女身体的声音已经逐渐现身，也在许多文化产品中被偷渡（如描写美国男大学生与女友母亲偷情的电影〈毕业生 *The Graduate*〉）。至于年长男人欲望年长／已婚女体也很普遍，只是没有文化正当性，也就是缺乏媒体对年长／已婚女体的性感呈现。相对于「好男人在哪里？」的女性呼声，其实也有个「（性感的）中年女人在哪里？」的男性呼声——显然她们都已婚在家里、都是良家妇女、都不再狂野，她们都不再性感，即，不再「做性感」。这既是媒体呈现，也有部份现实，但是结果却是强化了青春女体在媒体呈现的独占。

虽然女性主义的媒体批判经常以「美貌性感的多元化」来批评媒体呈现的「单一审美标准」，不过在媒体的商业竞争下，媒体对于性感女体的呈现，往往并不是真的非常「单一」；即使在呈现「苗条／青春」时也同时会夹带偷渡很多偏差的、不伦的、变态的、突破父权宰制和婚姻局限的欲望。然而主流女性主义或某些媒体批评者，却往往都是针对性感女体的「不健康、不道德」之媒体呈现。从这个选择性的批判角度来看，批评者所高举的「美貌性感的多元化」恐怕只是一种廉价的修辞学：它或许义正词严的批评了那个（夹带着各种偏差的）「单一审美标准」，却轻轻放过了目前婚姻家庭、性道德、亲权保护主义所强制的（健康、正确、良善）「单一」。

关于「美貌性感的多元化」，有一种常见的主张说：「不论年龄、性别、性偏好、体态，人们都有表现性感的权利。性感不应该只顺从一种主流标准，女性应有自己多元的标准」。这个看似政治正确的

说法却看不到：有许多高矮胖瘦的女人正是在美貌工业的性感身体规训中得到了乐趣、得到了力量与掌控自我，这是现代人「做身体」、「做自己」的存在方式。而且很多时候，她们的身体管理并不是去严格地使自己符合商业主流标准，而是扭曲挪用与另类诠释这些标准（极端的例子像某些MTF或变装跨性别者以自己的苗条身体来肯定自我的美少女认同），更在塑身活动的社会网络中得到新的人生经验与活力。如果我们采用菁英立场来全盘扬弃商业体系内的性感身体规训，那就只是贬低与噤声这些女性为愚民或共犯，否定她们或许也是从内部颠覆主流的行动者（例如在一个阻绝已婚女人表现性感的文化中，年长女性却用「装年轻」来进入只有青春女体才能进入的择偶追求市场）。

其次，发动批判义愤来对抗商业体系的身体规训，往往同时掩饰了另一个更为普遍深刻的主流身体规训：那就是以一对一爱情与婚姻家庭为依归的良（家）妇（女）身体主流。母亲（即，年长女人或中老年女人）与女童的无性感，是良妇身体的最神圣代表体现。这个主流的身体规训则直接影响到女人的阶级与价值定位：与良妇相对的淫妇身体因而被视为是污名与下贱。

但是，不性感的身体该何去何从？在目前主流性感标准下的「受害者」该怎么办？

我认为，如果人们想要变得性感，他们必须「做性感」。但是这个做性感，是在现有的性感结构内的操演。这可以是集体（社运或次文化）的操演与集体认同的过程，许多酷异身体的努力就是一个例子。不过对于良妇而言，做性感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做淫妇的过程，也就是说，良妇必须放弃性上层的地位与既得利益。

每个女人都同时既有良妇认同也有淫妇认同，也因此造成了许多主体认同的游移与实践上的矛盾暧昧。今天许多主流女性主义的

媒体批评却持续否定淫妇挪用商业身体规训来去除性感污名（因而动摇良妇原有的上层地位）的努力。主流女性主义将女性本质化（基本上本质化为良妇），固定其主体认同，因而在分析问题与实践策略上都无法处理矛盾暧昧，只能僵化的全盘否定商业的身体规训，空泛的高举「多元性感」或「多元身体」，但却无视已经存在于现实中的边缘变态身体与性感。结果其实质效果就是：肯定良妇的身体规训，继续维持良妇与淫妇野女的不平等。

现在商业消费与大众文化开始创造了新的暧昧与模糊，有时会「偏差地」在某些方面平反了、甚至亮丽了淫妇（故而影响到良妇的上层地位）。良妇与淫妇原本的身体高下界限因为利润逻辑而松动了，淫妇身体的某些特色（因为媒体的主流呈现）有了某种程度的文化正当性，甚至可能透过商业主流而被编入良妇的身体规训中。如此看来，商业主流的身体规训已然对良妇的主流身体规训形成搅扰。同样的，青少年也正在挪用商业主流的身体规训，来对抗父母师长强加的禁欲身体规训，而在这个主流对抗主流的冲突缝隙中壮大自己的自主性。

我们当然要批判商业主流，但是在批判时应该去捍卫那些可能引发和传统观念冲突的「偏差影像」，而严厉的检视那些一般人认为「正当而无争议」的常识影像；因为后者正是商业主流与良妇／成人主流的共谋合流之处，它们正在维持良妇与成人的主宰地位，而我们需要善用商业主流和良妇主流之间或竞争或相互渗透的张力来削弱其笼罩。

多元的性感不可能凭空创造；更简单的说，多元性感身体的前提就是多元的性（即性多元或性差异），而在目前许多性都被归类为变态禁忌的情况下，多元性感身体是无法达成的。换句话说，女性主义对于女体的分析是从单一性别角度出发而欠缺性多元平等的眼

界，这和女性主义「多元性感身体」的口号根本是背道而驰的。

多元的性感必须依靠实际「做性感」的人，以及现有主流、亚流的各类性感资源——也就是美貌工业在普及性感时所创造的资源。讽刺的是，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性感形象，例如男女同志的、跨性别的、胖女人的、愉虐SM的、或「变态」的酷异身体（queer bodies），却往往被视为「色情」而遭到封锁与查禁。这些酷异身体才应该是我们「必须正视与互动」的他人身体。考量这种对多元性感的具体打压，我们需要的是更百无禁忌的自由媒体（注28），好让边缘弱势者找到各式各样的缝隙和挪用空间。女性主义热衷严厉的检查媒体和广告，这根本不能有利于弱势者的壮大，更无法提供沃土促进多元性感的形成。没有将偏差变态纳入，多元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排除淫妇与变态的性感，就没有多元的性感可言。

我们的儿童向来就在各种保护措施中被迫和酷异身体的影像隔绝，而只接触到一元的「常态」身体。如果女性主义真的有心达到多元性感，那么，与其批评塑身事业，倒不如批评国家机器，因为正是国家机器的垄断检查或分级、国家机器对于童年建制的支持，才使得我们的儿童从小就无法有机会见识多元性感身体。另外，有些人热衷于批评媒体使青少年盲目塑身减肥，看似她们在捍卫青少年的身体自主，但是她们却可能矛盾地同时支持对青少年的头发（染发）、装扮（制服）、身体（刺青穿洞）、行动（网咖与宵禁）、性权（使用色情材料手淫）的箝制。这些箝制都是针对青少年而施行的身体暴力或「体罚」：正因为这些另类「体罚」的制度性存在，所以过去熟知的身体暴力体罚慢慢的不被需要了。这正喻示着本文所说的现代权力形态的转变（参见注7）。

对现代权力的新形态假设其实贯穿了本文的所有论点：首先，知识／权力可以造就许多主体（例如心理治疗与犯罪矫治机构等造就

出性变态、上瘾者或其他异常人格），同样的，追求苗条性感的女人或沈迷次文化的青少年都可以看成是某些知识／权力所造就的主体，以减肥或刺青等身体实践来形塑其自我认同。但是这些主体认同可能是暂时与不断转变的（因为其认同形塑是自折回应的），而权力也容许主体在主流的身体管理内部的颠复操作（易言之，即使是看似从众的、或顺从商业与媒体的身体管理也有颠复的可能性）；总之，权力不一定只是压制主体（负面的不准主体作为），而可能是积极地造就主体、促使主体有所作为。这些新形态权力的出现是为了有效操弄现代社会中更复杂众多的人事物，例如某些企业需要自动自发的工人，学校需要主动学习的学生，治安需要即时回应的监视，民主政治需要积极同意的选民，家庭需要不断吸收资讯的主妇等等；过去的高压暴力式权力显然无法造就上述能动自主的主体与机构。这些新形态权力起先则来自各种不同场域或机关制度、满足不同需要、有不同应用对象等等，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虽然互相交流影响，但是仍然可能彼此冲突，从而给予主体抵抗的空间。

本文根据上述的权力观而一再指出：进行一种身体管理绝非只是接受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与多种权力操作，造就不同主体认同，而且和晚期现代性与现代自我的特色有关。女性主义的标准答案就错在这里：减肥瘦身的身体管理并不是因为被媒体美感洗脑或内化男人的性价值（美感性感在「社会互动」与「媒体呈现」中各有不同的演变轨迹与动力，晚期现代个人在社会互动中往往利用媒体所正当化的美感元素来做出表达自我的个人性感），并不是单纯受害或受制，减肥瘦身的身体管理涉及多样的权力操作（身体医疗专家知识资讯、择偶追求文化、媒体、消费文化、亲权，以及饮食工业、性感工业、美貌工业、药物工业——每种工业则又包含了互相冲突的专家权力、对立的利益、国家介入等），因而减肥瘦身能造

就不同主体认同（例如理性控制饮食之消费者，时髦性感的女人，能自制的健康运动人、生活有目标的快乐胖女人、专业敬业的性感工作者、健康而不盲目的适度减肥者、聪明的现代科学或传统中药的减肥者、怪怪美少女……等等无法穷尽的可能主体认同），主体也往往在不断转换的认同中、在负面压抑与正面推动的不同权力技术中，进行抵抗与自我壮大，之中所包含的能量与矛盾正是社会运动可以介入之机会。减肥瘦身因此要从这些权力与主体所座落的晚期现代脉络来理解（这些脉络是：自折回应的现代性、性别的现代化、性的现代化、非正式化、文明开化的公共与市民、某些身体的公共不宜、个人主义化、自我与身体都成为开放与可塑的规划……）。从本文的讨论可知，减肥瘦身的集体抵抗策略必然涉及了（过去经常被女性主义化约为性别权力的）性权力关系与性的社会运动。性别、性、阶级、年龄、种族等权力关系在目前社会文化中的操作形态则必须从本文所提示的架构来获得更好的理解。

\* \* \*

我所认识的女性主义有两种成份，一种是驯良的，一种是野的。「驯」是和「家」紧密连结的，「野」则是和「家」对立的（例如野外、野男人、野女人都是指家庭以外的、破坏家庭的）。野也同时是无限制而自由的。在普世政治逐渐开始走向「文化战争」、保守主义的「家庭价值」正在紧缩社会自由的时刻，女性主义者的野女人认同对自由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或许，我们需要的，恰恰不是那个耳熟能详的女性主义标准答案，而是听来刺耳、看来刺眼的「不标准不正确不驯」。

## 注释

1. 「现代性」的理论分析来源，对我而言不但包括马克思、韦伯的思想传统，还有弗洛伊德、Norbert Elias、Erving Goffman、Foucault，以及晚近的一些社会理论家（Giddens, Beck）。现代社会的重要构成动力是资本主义，不过却不仅止于资本主义，本文中的「现代性」因此并不和「资本主义」对立。
2. Giddens, Anthony.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4-107.
3. Bryan S. Turner, *The Body and Society, Second Edition*, (London: Sage, 1996), 181. Turner认为想要厌食者想要控制身体，却受制于身体。我则认为这是因为身体有顽强的、不受控制的物质性。
4. 我在以下数篇文章都曾阐释过这些观念，所以不在此细论了。甯应斌，〈现代死亡的政治〉，《文化研究》（即将出版）。甯应斌，〈跨性别美学初探：晚期现代性与漂浮的性感〉，《跨性别》，何春蕤编，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2003年11月，283-312。
5. Giddens, Anthony.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Beck, Ulrich.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台湾因为家庭凝聚较强、社会福利较不完备，因此个人主义化程度不如或不类似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7. 施加于人身的权力不是变得更少，而是种类与形态更多。例如权力与知识结合（统计学、心理学、医学、犯罪学、管理学、教育学等），权力也因此变得隐蔽细微，得以穿透并且建构自我与身体。权力来源不一而彼此有可能互相冲突，同时，权力不必然笨重压抑暴虐，这也可能使人们积极的追求愉悦，因而利用权力而得到自主空间。
8. 甯应斌，〈威而钢论述的分析：现代用药与身体管理〉，《台湾社会研究季刊》33期，1999年3月，225-252。何春蕤〈从全民写真到全民整型〉，《好色女人》，台北：元尊文化，1998，154-157。何春蕤，〈21世纪的男人〉，《男性批判》，荒林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4。
9. 何春蕤，〈想要饭碗就少吃饭——节食与工作伦理〉，《不同国女人：性／别、资本与文化》，台北：自立晚报，1994，166-170。
10. 然而矛盾的是，主流女性主义不认为自己对弱勢少女的亲权保护主义（也是



- 一种不平等权力)是完全的强迫,而似乎认为少女仍有自主空间,所以少女之所以接受这种保护主义,不是不平等的暴力强制结果,而是因为少女知道亲权保护乃是为了自己好。但是照这样说来,男与女的权力不平等,就并不必然意味着:女人所有的行为(如减肥或顺从男性)都是被男人所直接或间接强迫的,而无自主空间(抵抗的可能)。
- 11.这种「整型前vs.整型后」或「减肥前vs.减肥后」的想像,在为整型或减肥提供心理动机上是十分有力的,也被广泛运用在说服消费者的广告中。没有这种想像或故事,就很难有动机去行动。
  - 12.因此本文的批评乃是针对「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而非其他(如后现代)女性主义,因为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父权支配(男性权力)」是性别现象的「基」或原点,可用来解释所有一切的性别现象(「激进」则有「根」的意思),例如:性与美也是男性权力的产物。
  - 13.甯应斌,〈跨性别美学初探:晚期现代性与漂浮的性感〉,《跨性别》,何春蕤编,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2003年11月,283-312。
  - 14.这包括相当广泛与散漫的论述、科学、专家、机构、制度、管制、技术、规范与法令等等,以我们此处关怀的女性外表为例:诸如性骚扰或其他身体相关的论述与规范、服装礼仪、穿着的色彩美学、美容知识与机构、文明化过程、身体医疗论述等,还包括像「化妆是一种礼貌」、「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女人要爱护疼惜自己身体」、「穿着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品味」的各类说法。
  - 15.关于麻雀变凤凰或貌美的女性可以「上嫁」(借婚姻而在社会阶层间向上流动),请参看Randall Collins, *Sociology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Gender, Love and Property, Second Edition* (Chicago: Nelson-Hall Inc., 1988), 232-236.
  - 16.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来说,父权社会下的婚姻家庭乃是结构性支配女性的制度。在近年来一些「保守派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很多主流女性主义也开始转向,强调儿童与家庭并不是妇女的重担(或至少是甜蜜的负担)。其次,面对着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妓权派的「婚姻是另一种卖淫」主张,有些主流女性主义则声称婚姻家庭在妇运的努力下,已经被改革为较佳的制度(但是她们却一口否认卖淫也是一样可以被改革的制度),参见Carole Pateman, *The Sexual Contrac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7.可参看本书中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全球欲望城市中缺席的女性主义身体〉对这个问题的相关讨论。
  - 18.但是身体管理通常会预设一些价值高下,这是否就等于歧视?例如,上述男

人的性身体的管理，是否等于歧视了天生阴茎短小的人。此外，饮食与瘦身控制是否等于对肥胖者的歧视？同样的问题还有：健康身体的管理与开发，是否等于歧视疾病者？安全性行为的追求或身体管理是否等于歧视了性病者、不戴保险套者、妓女、滥交等等？

19. 这其中的变化与政治可参看：Anne Bolin, 〈挑衅与驯服的身体：女子健身运动的顺从／不驯故事〉，毛雅芬、何宜玲译，第六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主办。
20. 这个论证的错误可以从「同性恋游行中的变装复制了目前文化对同性恋的偏见，所以变装是压迫同性恋的」这个简单例子窥知。对于这种「卖淫的文化意义复制性别不平等」的女性主义说法的更详尽反驳。请参看：甯应斌，《卖淫争议的伦理学探讨》（即将出版）。
21. 参看Randall Collins, *Sociology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Gender, Love and Property, Second Edition* (Chicago: Nelson-Hall Inc., 1988), 218-236.
22. 何春蕤，〈从花魁艺色馆到新闻女主播〉，《好色女人》，台北：元尊文化，1998，164-170。何春蕤，〈槟榔西施不准露了〉，《中国时报》时论广场，2002年9月18日。
23. 如果媒体开始大量呈现男体为性与美的对象，那么是否就会令男人纷纷去化妆美容保养打扮，或使女人转变欲望形态，如过去男人凝视女人一般地将男人视为性客体？还是会造成阅听人的抵制与抗议？
24. 参看本书我的另一篇文章〈青春睿智的左派？成年痴呆的左派〉中相关的论点。还有，我在〈跨性别美学初探：晚期现代性与漂浮的性感〉（参见注13）一文也提到当前许多青少年在看似从众的行为中，表达独特自我的美学风格。
25. 本书中另一篇〈全球欲望城市中缺席的女性主义身体〉其实就是在探讨这个「新女性情欲」的相关问题。
26. 参见：甯应斌，〈独特性癖与社会建构：迈向一个性解放的新理论〉，《性／别研究的新视野：第一届四性研讨会论文集》，何春蕤编，元尊文化，1997年，109-190。
27. 正是因为此一媒体呈现的特性，所以才会有诸如下列议题的出现：媒体对某个特定护士角色的性感化会引发护士的集体抗议。
28. 参见作者在本书的另一篇文章：〈公共电视与公关电视〉，页213-226。



# 全球欲望城市中缺席的女性主义身体

卡维波

台湾中山大学的副教授萧萃于2004年1月21日的中国时报发表〈全球化下的欲望城市〉，文章评论了HBO所制作的著名影集「欲望城市」的文化意义，评论的三个要点可依次抄录如下，我将在每一点后面加以评论。萧萃文章的第一个论点是：

「欲望城市」的剧集与相关的全球性美貌文化（主要是以美国为根基），其主要的影响就是在于对所谓的「女性气质」进行一番重新的界定，这个新的女性气质主要是以身体的特征为主，对于女性的身体进行新的「性化」，这个性化的过程不再如过往的是以被动的性玩物为主，反而是主动的具有性欲望和自信的主体。在这个新的论述中，女性的权力被界定为拥有性感的身体，并且可以有自信的、十分确定的行使这种性的权力与能力。（以上为作者萧萃原文）

针对以上这点，让我表达不同的意见如下：

上文作者萧萃暗示，女人由「性玩物」转变为「性自主」乃是全球商业体制的美貌文化产物。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乃是因为作者忽视与贬低了边缘女性及性基进派女性主义与酷儿等性运动的

多年抗争。

首先，女人的「性」（sexuality，不应等同于「性欲」，还包括性意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性玩物」或「生殖工具」，特别是在父权家庭之外的女人的性实践（同性恋、性工作、外遇通奸、花痴淫荡等等），有其复杂的多元面貌。这些边缘「坏」女人的性，本身就因为与主流好女人的「性」冲突而遭到压迫，边缘女人的性透过反压迫的抗争，透过某些性基进派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改变与重新界定了女人的「性」意义，使得女人的性实践不再只是吃亏受害，而可能是充满愉悦的得力壮大自己。这些意义的转变斗争，并不是良家妇女的抗争结果，也不是反性的女性主义的抗争结果，而是「坏女人」及边缘女性主义的实践与抗争结果。

目前商业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新女「性」，只是挪用了这些「不守妇道」的坏女人的性意义；商业体制并没有那么大的神通与力量，只靠广告包装就能去创造新的女人的性与身体。性与身体是最基本的物质存在，对于自己身体的有力感觉、对于性的新愉悦体会，还是要来自人们每日生活的实践，无法凭空由商业文化创造出来，商业文化只能在日常实践的物质存在基础上进行「装修」而已。

再者，女人的「性」不是孤立于其他的「性」。事实上，酷儿运动、性自由派的运动（如反对色情检查），以及各类性运动（性工作运动、全面性教育运动、代理孕母运动、堕胎权运动等等）所带动的各类性实践与新的性意义，也帮助女人改变了原有的性文化意义。

萧萃之所以忽略各类「淫妇」女人自身的抗争、以及忽略上述各类性运动对于新女「性」的改变与新定义，而把这场女「性」革命归诸于商业的美貌文化，乃是掩饰了一项重要事实：就是主流女性主义在这场性革命中的缺席；主流女性主义对于女人新近取得的性感有力身体没有积极贡献。的确，除了贬低咒诅与警告「淫妇」外，良家

妇女的女性主义究竟为新女「性」论述做过什么？

因此，这一波对女人身体的新「性化」，乃是来自边缘女人、边缘女性主义、边缘的性运动。这个新「性化」，有别于传统对女人身体的「性化」（与「去性化」），而开出性自主、性能动的新路。萧苹文章的第二个要点如下：

这种性别论述的转变，在西方其实是来自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影响，随着媒介全球化的过程，亚洲国家的女性文化也几乎是零时差同步的受到影响。虽然这是个外饰「愉悦、好玩」的新女性特质，但深入核心我们可以发现这之中没有改变的是女性特质仍具有的规范与规训特性，一个性感的女性身体必须要不断的节食、锻炼、消费和装饰，而这些过程都被当做是女性的自愿和自得其乐。（以上为作者萧苹原文）

前面说到良妇女性主义对于新女「性」论述毫无贡献，在此就得到了印证。因为这里还是主流女性主义的老调重弹——其策略就是把女性实践切为两半，一半是正确的女性主义实践（也就是主流女性主义者自己的实践），另一半则是被洗脑的、强化父权的女性实践。

但是问题是：正确女性主义的身体实践与性实践究竟是什么呢？除了西方某些人在性取向方面提过女同性恋主义外，在具体性实践与身体运动的策略方面，大部分女性主义是只有负面批评，而没有任何正面主张的。在此我们看到，正确女性主义原来只有脑袋（或一张嘴），没有身体。或者说，正确的女性主义之所以没有身体，乃是因为她没有积极开发改造与经营掌握身体的理论与实践。

可是任何运动的抗争实践策略都必须建立在群众的具体实践基

础上，女性主义的身体实践当然也必须建立在具体女人的身体实践上，不过运动不是全盘接受群众的实践（当然可以对不同的群众实践有所批判与挪用），甚至也不是接受多数群众的身体实践（事实上反而往往从边缘身体的实践才能找到新出路），但是绝不能宣称必须等到革命成功后才可能有正确的身体实践（毕竟革命不能只靠出一张嘴就能成功，没有身体的全面抗争，哪里来的革命呢？），也不能把群众的所有实践都看成被洗脑的结果，从而自己向壁虚构出一个「符合政治正确」理想规范的身体实践。故而，妇女运动的身体政治实践还是要建立在现实中某些女性主体的日常身体实践上，这些身体实践本身便有其抗争意义，但是却因为有物质存在基础而存活下来，这些实践正是女性主义身体政治应该滋养挪用的宝贵资源。这个身体资源不在女性主义教授的脑袋里，而在各类「淫妇」的身体里，正如同有些女性主义的智识资源不在女工身体里，而在女教授的脑袋里一样。脑袋与身体不能分家，所以女性主义一定要拥抱淫妇。

所有的身体实践，不论是良家妇女的、淫妇的，都必须接受规训与规范，但是这一波的新女「性」身体实践，不同于昔日对传统女性的身体规训，是能让女人觉得更自在愉悦有力的正面规训（**positive discipline**），这种正面规训不同于传统压抑式的负面规训（**negative discipline**），后者会耗去主体的动能，只遵循因袭的规范。但是新形式的正面规训在于培养主体积极主动的、随机应变的配合外在变化（流行）要求，一方面可以达到规训的目标（如商业利润），另一方面却又使主体能有更大的力量（如意外地促进主体的反思能力、强化主体的个人主义意识），这是规训所未曾预期的后果。

因此萧苹的错误在于，她把身体实践的意义看成是固定的，认为同一种身体实践对所有主体的影响都是同一的，而非随着主体反思与论述介入而转化意义。例如，节食、锻炼、消费和装饰，以致

于身体的整型、变身、刺青、商品化，对于不同主体的意义与影响是不同的，也因为政治论述或新的文化论述之介入而改变。例如老太太参加医院的减肥班或饮食控制，和其他年龄层女人的饮食控制就有不一样的意义（前者有老人社交、回返社会、争取家中权利的多重意义）。主流女性主义在这方面犯的基本错误在于：晚期现代的各类身体实践往往有多重的意义与效应，但是主流女性主义只把这些身体实践化约到「父权宰制」这个单一的性别权力框架内。结果造成脑袋与身体分家：我们往往看到知识女性一方面嘴里复诵女性主义对于身体管理的教条，另一方面自己照样进行当代各种身体管理。这是政治论述无能解释与介入身体实践的失败，也是运动无能提供政治论述来壮大主体的失败。

总之，萧萃误以为女人只要追求性感、只要将身体性化、或只要接受规训就是错误不好的（正如某些人认为只要将身体商品化就是错误的——但是追求健康养身就是正确的吗？就免于了医疗权力与食物药品商业的规训吗？），因为萧萃只从单一的性别宰制框架来诠释晚期现代所出现的众多新身体现象，而忽略了这些身体实践有太多的性别因素以外的动力与意义在运作，这些身体实践和个人主体的互动影响也是多重变化的。

萧萃的第二点还扯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但是如我在第一点的回应，新女「性」的兴起并不是全球化商业体系的产物，但是全球化可以对新女「性」在全球各地的发展与传播有所影响。这个影响一方面当然是折射了原来淫妇抗争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为淫妇们提供了文化正当性。不过，如果机械化地看待这两方面，则又犯了严重错误：因为人们不会只是被动地去接受商业文化，而总是有个挪用的过程。在地的性／别运动可以挪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文化资源、新文化正当性（而不是教条地盲目拒斥商业文化——无用无效的咒



诅），来进一步转化商业讯息为己所用。而且性／别运动应该向很多创意挪用全球化资源的个人学习：不但个别的淫妇善于挪用全球化资源，以突破本地的封锁检查，就连青少年也在全球化下挪用各类新文化资源进行愉悦的反抗，这使得很多家长与学校权威头痛不已，因为有时即使动用本地民族国家的政治法律力量来封锁检查，也毫无效力。

萧苹文章的第三个要点是：

这种新的性欲论述排除了多元的可能——仍然只有少数「得天独厚」、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可以享有性的自主。而且以性为主的女性权力概念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似乎意味着女性已经可以自由选择、不必再受限制，然而实际上却是女性在结构中所遭受的限制仍是多重难解的。另外这个「新」的性自主的论述所没有改变的是，它仍然是环绕在取悦男性、赢取男性的注视所建构形成的。（以上为作者萧苹原文）

新女「性」论述并不是排除了多元的可能，相反的，它提供了传统女人所无的一个新的身体出路，反而更丰富了多元。由于新女「性」论述乃是建立在晚期现代的身体事业上，也就是透过身体的打造来形塑自我与生活方式，所以对没有身体的女性主义形成威胁。易言之，新女「性」论述不是排除了多元的可能，而是排除了主流女性主义，使之有着与现实发展不相干的过时危机。

在过去对女性身体的负面规训与压抑下，女体只是（1）生殖工具、（2）被动的性身体（客体）、（3）有时则是去性化的身体，还有些女性或出于被动、或出于主动甚至可说是（4）没有身体的。这四种身

体也是女人存活的物质基础。这四种类型都是典型的良家妇女身体：（1）作为母亲的生殖身体，（2）作为妻子的性被动身体，（3）出现在公共领域的（去性化）端庄身体，以及（4）「没有身体」——「没有身体」的原因与可能类型是：丧失生殖与性功能的利用价值后被（自己或男人）弃守的身体，专注于工作而无心顾及的身体，自我因各种原因而对身体无所感，因病痛而被隐藏隔离的身体（隐形不见）。

上述这些身体现象亦反映在女性主义的性批判论述中：例如批判仅被视为生殖工具的（医疗化）女体、批判使女人受害的被动的性身体（性玩物、性客体）；同时，在女性主义缺乏正面积极的身体实践论述下，女人仿佛是没有身体或去性化的。

没有身体，本身并不是错误或罪过，它可能是女人「自保」的一种方式。但是晚期现代对于身体／自我的积极开发趋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局面与新机会（包括新女「性」）都是过去没有正面身体实践论述的女性主义所无法面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女性主义竟会疑虑理当是盟友或至少是促进女人自主资源的新女「性」论述，也是可以理解的。

和萧苹所说相反，新女「性」论述与其相关的身体实践并不是只有少数优势女性的专利。从网路女恐龙的一夜情，到不分年龄的全民塑身，人人都在参一脚。没有身体的女性主义却无法从中转化出积极的性别解放意义。

过去女性主义面对性与身体的新实践时，只能祭出「结构限制」（萧苹也同样的旧调重弹），但是这是无意义的，因为没有人宣称单单靠着新女「性」论述就能达成性别解放，也没有新女「性」自认完全自由而不受限。事实上新女「性」正需要更多政治论述的介入来支援。虽然所有的身体与性实践都有限制，但是也都是在限制中去突破限制、去争取进步。没有实践是不受到结构限制的，包括女性主

义者的智识论述实践、政治参与实践、法律改革实践、经济就业实践……也是一样，所有这些实践都只是在结构限制内的一小步。

其实无须淫妇，即使是许多异性恋良家妇女也非常清楚，今日女人的性感实践与身体实践的意义不会只是「环绕在取悦男性、赢取男性的注视」。男性凝视固然可能是男主动女被动的女性受害想像（这个想像对于完全缺乏自我力量的女人而言可能是真实的），但是男性凝视也可能是女主控男受制的结果，也就是女人透过性感与身体实践来操作男性凝视，这个主控的操作也往往构成女性被看的快感，以及对自己与身体的掌握感。此外，在「女人取悦男人、赢取男人注视」的同时，女人也可能借此在玩弄、暗算、欺骗、支配男人，或者可能借此进行其他与性无关的培力活动。我们可以说，新女「性」论述在为「取悦男人、赢取男性注视」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的脉络和动力学，而这个新的脉络和动力操作已经改变了旧有的意义。

## 四、媒体批判？或媒体 管制的新策略？



# 速食业的欲望广告与社会变迁

卡维波

2004年暑假电视上出现了关于麦当劳薯条和肯德鸡炸鸡的广告。中国时报的时论广场连续有投书针对这些速食业广告提出批评。其中一位批评者颜正芳（高雄医学大学助理教授）说麦当劳广告：

主要呈现的是「即使是好朋友，好东西也不能与你分享」。广告中两女孩走进几近客满的电梯，一人手伸向另一人手中的薯条但遭拒；接着一名俊男走进电梯，并引发电梯负荷过重的警告声，旋即手拿薯条的女孩将另一名女孩推出电梯，并满脸笑容地邀请俊男分享薯条。另一部广告则是描绘两名自小在乡间成长的女孩，在贫乏的物质生活中相互分享所有，直到长大为青少女，在速食店中其中一人却已不愿与好友分享薯条，自顾自地享用。

至于肯德鸡炸鸡的广告则是三部「哇，不是肯德鸡」炸鸡系列：

分别是儿童在放映中的戏院、新兵在假日家属会面、死刑犯在处决前的最后一餐等三个情境，情境虽不同，但

清一色是发现送来的不是他所希望的品牌后，以倒地打滚、哭号耍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颜正芳的观点一方面是认为广告提倡自私或偏颇的道德价值观，另一方面则认为这些广告无法「达到吸引顾客上门的效果」，因为广告商误以为青少年与女人都是不顾他人权益感受的自私族群，故而颜正芳质疑：「儿童、青少年这些速食的主要消费者，会觉得自己是自私到舍弃朋友而不顾、不顾形象穿军装在地上打滚耍赖的人吗？」既然儿童青少年并不特别自私，因此这些广告中的人物、情节根本就无法达到「让观众感受吸引力，贴近自我影像和自我期待，进而学习广告中的行为，产生消费动作」之目的。因此颜正芳结论说「建议速食业者在花大笔广告费前，还是多多了解你们的顾客心理，否则做出没有加分效果的广告，徒然浪费大把银子，又破坏自己形象」。

颜正芳在这里的分析只是触及妇女儿少的理性的自我认识（例如自认为「不自私」），这与广告要召唤的无意识欲望，根本是两回事。所以颜正芳可说是根本没有看懂这些广告究竟以何种方式打动了妇女儿少的深层欲望。颜正芳文章的最后一句是：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何广告中见到异性、见到薯条，就能舍弃友情而不顾的，都是女性呢？

或许颜正芳暗示这些广告有性别歧视之嫌，但是若不分析广告所召唤的欲望，是根本无法回答上述问题的，也因而会怀疑「何必做无法加分的广告？」（颜正芳文章标题）。

另一篇批评这系列广告的投书，则纯粹是从道德观点出发，内容十分爆笑：

每次看了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全家就会对那位拿著条的女孩大骂一声「笨！」对于看广告的我们，不了解的是这个薯条有好吃到推人出去只为了讨好一个男孩吗？如果广告的结局改成男孩进来后电梯超重了，于是女孩就和另一位女孩一起走出电梯，分享薯条，然后男孩跟着走出，这样一则显示出薯条的美味胜过赶电梯的急躁，一则显示薯条的美味让陌生的男孩也愿意追随，不是很好吗？……

这个社会越来越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好像大家都急急躁躁，情绪都短短浅浅。一点点刺激就会考验人理性的限度，而且，很多事情包括新闻报导都处理得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般。就好像吃麻辣锅，平常小辣就令人受不了，而这个社会变得让我们生活在辣锅中。小辣不够，要中辣，中辣没感觉，再来大辣好了！什么时候生活要变得这么刺激才过得下去了？

这个投书者显然不是大辣的麻辣锅爱好者，但是却有胆大刺刺地将自己个人「受不了麻辣」的口味强加给别人。社会现象或呈现是否「太刺激」、「太麻辣」其实只是某个社会位置的人的主观判断。将那些广告视为麻辣文化的表现，只是某些人的感受与联想而已。

总之，以下我将说明：上述批评速食广告的观点一方面是对复杂广告内涵的肤浅分析，另一方面则是危险地从单面价值来看待社会



变迁。

例如将女性友人推出电梯并和帅哥分享薯条的广告，乃是向来就有的「重色轻友」情节，但是过去这多半是在男性之间流传的说法。现在广告以女性为主角，其实反映了女性作为情欲主体的新社会趋势，所以表现出主动追求帅哥、排除情敌的积极作为；因此，广告所召唤的欲望其实是对女性情欲（及其能动）的正面肯定。

至于另一个广告则是死刑犯、新兵与儿童在发现送来的炸鸡不是某品牌后，不满地大吵大闹（台湾国防部还抗议了这个新兵广告）。这个广告所反映的则是富裕社会中越来越个人化的消费文化，也就是说：消费不再只是有炸鸡吃、有手机用、有衣服穿……就不错了，而是必须透过个人对品牌、样式风格……的选择来形成独立个人，因此，坚持品牌等于坚持自我。凡是欠缺个人选择能力者，根本难以生存在现代世界；同时，制造各类选择的现代社会也强迫我们不断做出个人选择。此一个人主义化的趋势甚至已经延伸到过去依赖父母的儿童青少年，因此，广告所召唤的欲望是儿少的独立与（消费）权力。

从上述分析角度来看，这些广告十分贴近某些青少年与女性的深层心理欲望，这些欲望则是在社会变迁的个人主义化趋势下所产生的。当然，社会中也存在着另一些人，对这种变迁趋势感到不安，因为新趋势会改变原来行为的固有意义与价值位阶（例如将女伴推出电梯的行为不再是「自私」或「不要脸」，而是勇敢表达情欲、主动追求性爱）。在社会变迁中的不安全感还会使人趋向保守、对于多元异己的容忍降低，并且怪罪媒体呈现为变迁的主因，将某些青少年与女性所表现出来的「野」或「不驯」（unruly），错误地用道德范畴将之分析为「自私」，或者把社会的长期趋势简化为「一窝风」流行。

对于社会长期趋势与其文化呈现的分析或批评，一向是社会理

论与文化研究的任务，而且极力避免从早期现代或前现代的道德价值来做表面的判断。尤其像广告这种有时接近艺术创作的文化产品，其丰富复杂的内涵岂能只从某部份人的观感来挾伐？有鉴于过去曾发生广告商在道德挾伐下「自动」撤除的先例，不由得令人忧虑粗浅单面的批评会逐渐扼杀各类前卫但有创意和突破性的广告。

## 引用文章

颜正芳（高雄医学大学助理教授），〈何必做无法加分的广告？〉，《中国时报》，2004年8月29日。

藏镜人（新新人类），〈我们活在麻辣锅中〉，《中国时报》，2004年8月30日。



# 公共电视与公关电视<sup>(注1)</sup>

卡维波

无线电视民主化联盟（「无盟」）长期推动电视公共化的努力一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论未来发展如何，我想跳脱所有权或产权公共化的层次，来谈「电视公共化后到底会生产出什么样的节目，会走向何方」这个问题，也就是公共电视的内容问题。

公共电视的内容可能迈向「公共化」吗？电视节目内容如何公共化呢？「公共」乍听起来是「包容吸纳的」（**inclusive**），好像什么都可以被容纳到「公共」之内（如「天下为公」的说法），但是「公共」在实际操作上往往是相当排他或排斥的（**exclusive**），例如「公共」与「私人」就是相对的，很多题材或主体是被认为「公共不宜」的，因此「公共电视」极可能成为社会排斥的工具。如果说「电视公共化」的理想应该是吸纳包容的，那么需要什么来突破「公共」自身的限制以达到真正的公共化？「争取电视产权公共化」与「争取电视节目内容公共化」两者之间有无关系？这是我这篇文章要谈的。

现在让我们先看一段电视节目的旁白，我选取这个电视节目之目的，在于显示目前电视节目在价值立场上的复杂性。这是台湾的电视谐星主持人吴宗宪在轰动一时的「虐犬（同志）箱尸案」（注2）发生后的某次节目片段，节目谈论的是箱尸命案和SM的关系。在来宾讨论之前，节目先播了一段片子：

「[影片中旁白]……不过死者的死因和性倾向却被媒体大作文章。死者因为在SM的交友网站上结识了性伴侣而发生不幸，又被各种媒体加油添醋，种种不堪的臆测纷纷出笼。什么是SM？说穿了只是性虐待和被虐待的英文缩写，一种危险的性虐游戏。当然，只要你心脏够大，不分男女种族身高和性倾向，其实都可以大胆尝试。将SM这样不见天日的地下活动，今天能如此大鸣大放，百花争艳，网际网路的功能可说不小，轻轻一敲，台湾欧美大陆轻松串联，……而这些管道一点也不特殊，他们都只是主流社会被压抑的另一扇出口。这些网路上的性活动，就好像异性恋参加『非常男女』（交友择偶电视节目）一样，其实是再普通不过的事。的确，他们是出了意外，这个事件给我们的教训，绝对不是封闭了网路各式各样的性活动，它只是提醒我们，安全的性不只是要记得带保险套而已」。（回到节目现场）吴宗宪：「这就恐怖了，刚刚我们看到的内容……」

相较于当时台湾社会对SM的文化成见而言，上面这一段内容十分进步，因为它并没有把SM当作病态或变态，而强调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性活动。这样的观点很少出现在公共的领域中。

上面那段影片之后的节目内容就是现场主持人与来宾的对谈。吴宗宪拿出各种SM玩法的列表，并且不以为然地评论说：「软骨地带，疼痛度百分之九十，兴奋度也有百分之九十。爽痛？！怎么会那么奇怪呢？」另一个来宾却反讽地回应：「爽痛，那不是综艺节目里你们常常在玩的？」之后节目中的来宾与主持共四人轮流讲SM如何变态，恶心讨厌；在四个人不断贬低SM的同时，还讲到同性恋比

较好，跟SM是不一样的云云。总之，他们都在表达一些既定的偏见，而正如同多年前异性恋贬低同性恋一样，现在贬低的对象被替换成愉虐恋SM。（除了吴宗宪之外，其他人在社会形象或平时对同志议题的参与上，都可以说是极为进步开明的菁英人士，但是他们之所以会在节目中对SM采取贬低立场，应该是因为他们对SM所不多的缘故，可能不到几年后，随着社会进步与资讯流通，他们也会改变立场）。

在另外一个吴宗宪的节目里，他访谈了几位跨性别，还请了一位跨性别的妈妈到场，他们之间的对话也很有意思。吴宗宪等人先揶揄了一下这些跨性别，之后他就跟那位妈妈说：「请妳要谅解，因为我们做电视就是这样子」（意思是：做电视节目就是要揶揄来宾来逗笑，事实上不论谁上节目，吴宗宪都会揶揄他们）。在此我想指出的是，电视很多时候会自我解构，比如吴宗宪在这么说的时就在自我解构电视制作的过程，告诉妈妈或观众这一切是在作戏。之后，整个节目就做了一些「赚人热泪」的东西，例如鼓励这些跨性别，为他们打气等等，挺感动人的。吴宗宪在这类节目中经常邀请各类性多元（即，被大众视为性偏差或性变态的人），使用的手法也大同小异。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这类节目对性多元既有抹黑，也有培力（empower）。

我想谈的主题是「电视公共化」，让我先从哈伯玛斯的「公共」观念谈起。哈伯玛斯在谈公共领域时做了一连串的分与对比，例如他认为「意见」和「公共意见」（舆论）是不一样的：「意见」是一个文化内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例如集体的偏见与判断等等；相反的，公共意见是公众的理性讨论，是针对公共权力的批评，而且应该有制度性的保障。此外，自由公开但理性的陈述各自意见，则是形成公共意见的重要条件。

这里讲的自由公开运用理性就是「公共」或「公共性」(publicness)。对哈伯玛斯来说,唯有真正的公共性的要求,才能使公共权威受到限制,才能使政治的公共论坛对政府有比较制度性的影响。

哈伯玛斯虽然区分了「意见」和「公共意见」(舆论),但是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代「公共意见」被炮制的危机,也就是有可能出现虚假的舆论。同时,真正的与虚假的公共意见,也对应着真的公共性与假的公共性的区分。这个假的公共性(「伪公共」)很接近我们今天打广告或搞宣传的「公开性」,也就是publicity,其重点不是自由公开运用理性,而是搞公共形象,搞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换句话说,publicity虽然是公开的发出意见,但却是发言者做公共关系的一部份,实质上也就是宣传或打广告。故而publicity由原本的「公开」,转向了「公关」。

上述哈伯玛斯的观点当然可以被用来检视电视与公共性、公共意见、公共论坛的关系,也可能被媒体监督者采纳以作为改革电视的理想模型。

在针对被利益集团所操控的新闻、呼应节目(call-in)、政治讨论等等形成政治舆论的部份,哈伯玛斯的批评显然是很有效的。从哈伯玛斯的观点来看,政府花费纳税人金钱来为自己政策或政绩做宣传,就是标准的公关作为。至于采用置入性行销方式,则更是隐蔽巧妙的操纵。

但是,我们能以同样观点来看待像娱乐新闻、八卦新闻播报、以及娱乐八卦新闻的呼应节目吗?此外,又将如何看待像以模仿谐拟为主的讽刺节目、或既政治又娱乐的节目呢?这些节目的基本特色就是:观众不太能(或不会)认真对待其内容,因为基本上它们摆明了自身的休闲娱乐性质而无身段。这些节目有着亚流、非正式的性格,虽然它们可能会复制正式节目的表面形式(就像网路上裸露身

体播报新闻的形式会复制仿效主流电视播报新闻），或者正式新闻节目也常采用或推销娱乐八卦新闻、或者采用较轻松的非正式播报形式，不过在节目整体的安排上与意义符码的编排上，娱乐八卦节目还是和有别于新闻政治节目——但是我们不排除有的节目或许可能介于两者之中。

很多「批判」的知识份子对娱乐八卦新闻节目持负面意见，认为这些节目把娱乐新闻或广告建构为现实事件——或者，如果我用哈伯玛斯的话来说，就是娱乐工业把公关促销活动变成了新闻，所谓「新闻」根本就是促销的广告——因此这些节目并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只是publicity（宣传）而已。

我认为这样的「批判观点」忽略了其他重要的面向，因为我认为这些八卦娱乐电视节目其实有着很丰富的、复杂的面貌与难以预测的社会效应。例如台湾艺人大小S两姊妹主持的「娱乐百分百」其实已经成为青少年建构次文化的一个媒介，她们在节目中不断地重新界定主持人的「规矩言行」，是台湾电视史上最非正式化（informalization）的表演，挑战着传统电视主持的文明化规范（注3）。虽然她们也常以道貌岸然的姿态出现，然而又旋即自我解构；她们还常游走于偏差言行的边缘（但也有「失言」而引发风波的状况），并且假设新闻局与道德成人正在监视其节目，这种自觉也引发她们「躲在亮处」与成人新闻局斗智、玩弄青少年政治的情形。

标榜「媒体批判」的知识份子认为娱乐八卦新闻不应该被建构为彷彿有现实影响的重大事件，理由是这使得大众忽略了真正的国家大事（注4）。知识份子这种说法明显地是预设了娱乐新闻的比较不真实、比较微不足道、与琐碎（trivial）。可是，事实上，当娱乐八卦新闻成为大众的话题时，由于其内容效应往往比政治新闻的冲突性较低，故而在承平时的娱乐八卦可以创造人民的文化共识与集体认



同，有社会整合的政治功能；另外，在政治与社会分裂对立的时期，某些娱乐八卦也可能反映、建构或促发分裂与对立（台湾原住民歌手阿妹在中华民国国庆大典上唱国歌因而被大陆禁演，或者因低调规避责任以继续大陆演唱生涯而被台湾政客批判，或者歌手罗大佑用歌曲表达政治立场、歌手张震岳批判副总统的原住民移民论、大陆影星赵薇的日本国旗服饰被爱国群众批判，大陆奥运体育明星的商品化与爱情生变……等等所引发的争议即是一例）。

在全球化与文化政治不断增强的时代，触及国族认同、文化认同、价值、道德争议的八卦娱乐也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因此娱乐八卦新闻与论述其实是个争战的场地。此外，娱乐八卦新闻与论述常常是下层阶级与边缘人民的另类资讯管道，是其形成次文化的重要资源，故而一方面有抗拒主流建构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使自身更趋边缘化的效果。整体而言，我们很难一概而论八卦影艺新闻必然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因为娱乐八卦新闻向来不和「社会效应」的论述相连结，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政经（正经）的真实新闻才有社会效应，因此，八卦娱乐新闻尚缺乏一套系统知识与制度机制来衡量其社会影响或效应。

娱乐新闻把公关当作新闻，进而当成「国家大事」，在知识分子眼里，是愚昧大众的被洗脑，但是其实看娱乐新闻的人当然都清楚地知道许多新闻或访问是打广告、打歌、促销、炒作等等，因为娱乐新闻也根本没有尝试隐藏这样的事实。相较之下，倒是看「真正」国家大事新闻的人并不清楚台湾与国际新闻制作背后的利害与建构。此外，之前台湾谐星小董以及罗璧玲都主持过八卦新闻的呼应节目，那其实已经形成某种公共论坛，因为之中有包括消费者（观众）的不满，以及对于八卦娱乐新闻及明星的自我解构（注5）。当然，所有这些呼应意见的发表，都构不成哈伯玛斯心目中的理性讨论。

哈伯玛斯类的知识份子或许认为电视八卦娱乐新闻是高度垄断与单向操弄的场域，虽然有另类的、后设的八卦评论呼应节目，但是其批评的公共性质有限。不过网路的出现似乎改变了这样的布局，目前在网路上普遍出现了各类对电视节目与八卦影视新闻的讨论、情感抒发、资讯交换、另类批评等等。观众不再是被动或单向的接收节目，网路另外创造了一个大众参与的电视衍生空间，大众可以在这个新空间中另行创造电视空间所无的意义，观众不再是电视前孤立的原子化个体，他们现在可以彼此直接沟通或甚至形成监督与舆论压力，其政治性潜力还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媒体监督」之类的民粹团体对于综艺节目的批评不遗余力，我倒不是全盘地替吴宗宪等人辩护，因为这些主持人也常常歧视节目中的SM、性工作者、跨性别、第三者这类性多元。但是我确实要指出，每一次综艺节目主持人被主流批评为不良示范之后，这些主持人就会力图表现很道德的模样，于是往往以更多的嘲笑和歧视性多元来表现自己站在主流道德那一边，结果，官方、政客、民粹团体与知识份子对于综艺节目的批评监督，反过来又制造了更多的性歧视。

总的来讲，这类综艺节目经常充满矛盾，既有俗见的歧视，却也提供了边缘人发声的机会。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有线电视的综艺节目比那些「优良净化节目」好很多，因为性多元更难在净化的电视中被呈现。事实上，似乎越接近官方、越接近高级精致文化，性多元与一些边缘主体（如激进艺术、各类狂野或逾越）就更有出现的机会。

有些人或许认为，既然媒体缺乏善意，那么边缘主体不出现在电视上，会不会比较好呢？毕竟，当那些性多元，例如滥交的女人、外遇的或劈腿族的女人、扮装的少年，或者厌食者、怪癖者等

等出现在台湾艺人曹启泰主持的（非常法西斯的）「大老婆俱乐部」节目上时，反而，让所有在场的大老婆来宾可以从童年的成长与家庭背景来断定主角的病因，并且严词责备主角的错误人生，迫使他们接受道德的审判，并在节目结尾公开认错。这么说来，或许性多元不上电视比较好？

问题是，性多元与其他边缘主体就是想要上电视，他们想要被看见，他们拒绝被隐形。有时候是像台北公娼那样，为了抗争，不得不被看见；有时候是像早期的同性恋一样，被看见就是一种抗争。这些边缘人让我不得不翻转哈伯玛斯的观点，而接受Andy Warhol的说法：「每个人都有十五分钟」。对边缘人来说，publicity（公开／公关）才是重要的；publicity就是visibility（曝光／能见度），publicity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文化的可接受性」，就是和大众做公关，推销自己的认同与行径。对于性多元来说，在电视上那十五分钟与人斗嘴辩论，表达了一种认同，比不被看见要好。这也是为什么吴宗宪要比优良净化节目好，因为他给了边缘人一个介入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性多元或边缘弱勢的这些主体而言，主观意见的表达，远好过公共意见的形成。Publicity（公关）远好过于publicness（公共）。多样的场域，远好过公共论坛。次文化远好过公民社会。恶性竞争的商业体制好过专家学者组成的电视委员会。

在现在的商业电视里面，有的时候边缘主体被消遣、被侮辱，但是他们去上节目的动机非常多，可能也包括金钱报酬，包括曝光宣传，但是上电视节目对他们来讲，有一定的被认可效果，得以分享电视本身的垄断（我上过电视！），这也许对别人来讲不算什么（菁英份子还常拒绝上电视的邀约），但是对边缘主体来讲却是一个得力壮大（empowerment）的经验。例如，有的人就是喜欢看到自己在电视上美美的，看到被认可的「公共」里面有自己出现。

边缘主体上电视的效应很广泛，对很多边缘的族群来讲，这是他们开始取得信心、肯定自我的一个阶段。故而真正要问的问题反而是：为什么其他的正经电视节目不去请他们上节目？事实上，以前主流电视也曾播出这类节目单元，正面的呈现这些边缘人士，可是当时就有很多卫道人士跳出来说这样的节目不能播，例如以前的变装秀、「天才BANG BANG BANG」、超龄国小女生，通通都被罚、被停掉了，胡瓜这些人还被批判：「胡瓜不尊重女性，开黄腔」、「对青少年有不良影响」，结果他们只好变得很「道德」。而「道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到边缘主体就多骂几句，这样主持人就变成了道德的人。

今天给边缘弱势主体提供公共空间的，不是公共电视，而是财团控制的商业电视体系；这并不意外，正如同国家剧院不会提供电子花车秀。被公民社会排挤在外的乡野舞台上，正在上演着另一种「公共性」戏码，虽然也有很多人需要与认同这种另类公共，但是却不能被认可为「公共」；这是排斥社会的实相。所谓「公共的」，原本就属于「公民」——属于中产市民与主流价值。今天，由公民组成的媒体监督与净化，正在力图消灭商业电视体系中仅有的一点点边缘空间。

换句话说，「公共性」不只是规范性质的，也是社会—历史性质的，因为目前社会历史形构下的「公共性」恐怕已经预先设定了某种civility、礼仪、规矩、规范。这就像在目前的公共场所内你不能有某些言行，否则会被视为疯狂、不尊重他人、不懂礼貌等等。「公共」因此等同于「主流中坚」，因此会必然排斥「边缘」。故而，对边缘主体而言，她宁可置换掉这个公共性，就是用publicity（公开性）代替publicness（公共性），也就是，她们要的不是公共电视，而是公关电视。

为什么从边缘主体的角度来讲，公关电视是比公共电视较好的？我的回答是，公共电视提供的是一个公民空间（civic space）、文明空间（civilized space），在这个公共、公民空间、文明空间里面，这些边缘主体不会觉得很自在，不能以本来面目示人，因为其「本来面目」根据目前「公共」的定义，是uncivil的、是不符合public decency（公众合宜）的。换句话说，公共、公民的空间预先就排除了被视为不够格的边缘主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边缘主体必须先改变「公共」的定义，先占据另外一个「伪公共」空间为基地，来包围改变公共空间。故而，边缘主体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嘉年华的、轰趴的（home-party）、狂野的、前卫艺术的、不入流的、地下的、无法可管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她可以看到自己想要呈现的自己。没有人会对她说：「对不起，请你向上提升一点」。边缘主体也不必向大家道歉，反而自豪：「我不需要提升来改变自己，我要来这里作公关，可以推销我自己，推销我的认同」。

总之，这些边缘主体今天要的不是「公共」空间，而是公关空间。公关空间的敌人是法律管制、是媒体监督、是言论检查。这个公关空间可能出现在商业电视中，可能出现在网路中，可能以「非常光碟」（注6）的模式流通，或甚至可能偶而在公共电视中惊鸿一瞥。就像「乡村包围都市」一样，边缘主体以公关空间包围公共空间的战略是：边缘主体以一种「伪公共」来逐渐改变公共，就像娱乐新闻（也是一种伪公共）逐渐侵入真正政经（正经）新闻一样。

目前有些赞成公共电视的人其实是为了阻挡各类边缘的公关电视去侵蚀中坚阶级（middle class）的净土；他们想要打造的公共电视其实就是主流中坚阶级自己的公关电视，以此作为自我培力与阶级支配的工具。中坚阶级的公共电视，实质上是一个排他的公关电

视，借着「公共」来排斥「公共不宜」的私领域政治或「不文明」（如暴力、狂野、嘉年华、粗俗、不法想像）呈现。

换一个讲法，有人或许会问：难道不能有个公共性的电视来实现哈伯马斯式的理想沟通？让边缘人能够阐述其理念与想法？

其实这个理想已经在某些地方实现了：例如在吴宗宪等人谈SM的节目中，他们表现出对于同性恋的善意呵护，但是却将同性恋和SM撇清，也就是把同性恋净化，把阳光没病的同性恋纳入公民社会。

换句话说，在公共论坛内，边缘主体必须以公民的身分发言，可是事实上边缘主体并不是公民，而且目前边缘主体并不能完全认同「公民」这个主流身分，故而，边缘主体在公共论坛中往往无法做到真正的自我认同，他要蒙混、做作、自我分裂，而不能以本来面目示人。在公共电视存在着监督与尺度检查的状况下，边缘主体经过净化的自我呈现，也不过是把边缘人收编到公民社会内的一种机制而已。

最后，公共电视的「结构」与「内容」有什么关系吗？「结构」也就是电视产权的问题，是商业（私有）或公有的问题，「内容」则是电视的内容是霸权或多元的问题。我想结构与内容没有必然的关系，产权公共化的电视播放的可能是被主流中坚所垄断的内容，国有的电视则可能变成官方的传声筒。（台湾的客家电视出现后，很多亲政府的政治信息就渗透在它的节目里；或许有人说客家电视不是真正的公共电视台，而只是官方电视台，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否暗喻着国有电视未来的走向呢？当然，「公共」和「官方」是不同的，「公有」和「国有」也应该不同；但是所有高悬的理想其实都可以从现实做起，公共电视的精神也应该从官方电视开始实现。）

真正公共电视出现的关键，可能还是在于建立起符合「公共」的

最低标准的共识。这个「公共」的最低标准当然不能是「文明（不粗俗）」、「公众合宜」、「影响青少年身心」、「性道德」、「个人私事」等等预先排斥边缘主体的现代「公共」。公共电视内容的公共化，首先要建立的基本价值共识，就是：「反政府」、「反主流」、「反中坚阶级」必须在电视媒体中分享显着的一席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公共」。

这个对于「公共」的最低或最基本要求也就是反垄断！它具体的体现民主、自由、多元平等的精神。很多电视改革者也是因为「反（商业电视）垄断」而倡导公共电视的理念，他们认为在目前的商业电视中，缺乏妇女、消费、环保、学生、残障、精致艺术等等弱势者的声音。我们在此所提出的最低「公共」标准，其实和公共电视提倡者的「反垄断」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就是这么简单！检视电视的内容是否「公共」，就看有没有「反政府」、「反主流」、「反中坚阶级」的节目！甚至，我们可以更特定具体的说，如果公共电视没有左派、性激进派、前卫艺术与其他边缘主体所制作或参与的节目，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公共」。其他一切制度上的权力设计形式，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最基本「公共」的结果，都将只是正当化霸权垄断的障眼法。

如何改革电视？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要我的电视台」。那就是，每种主观意见，不论如何不符合公共的理想与标准，都要能有publicity的机会。Publicity不是透过理性讨论以形成共识，而是公关——要求可以呈现、可以表现、可以表演，要求被接受、被承认、被看见，要在公共内也有显着的一席之地。因为，非如此不能改变「公共」的意义。易言之，呈现「所有的」意见，本身就是公共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达成公共意见的手段。

所以，我要我的电视台，我要那十五分钟！

## 注释

1. 原本这是我在2001年3月24日文化研究批判论坛「电视不必改革？电视改革无望论！」座谈会的发言稿，现在将之尽量改写为一般文章的体例和语气。
2. 2001年台北市一名男同志「虐犬」透过网路聊天室媒介，结识某大学生，两人相约共赴巫山一夜情，但窒息式性爱意外地让大学生送了命，还被弃尸在一个旅行箱内，由于网路公司的协助，警方从聊天室历史档案纪录中抓到「虐犬」。
3. 早期对于出现在电视与收音机上的人物都有相当严格的规范与禁忌，尤其是主持人的衣着、举止态度、身体动作、外表、语言都必须极为端庄，例如不得弯腰驼背、打哈欠、伸懒腰、搔痒等不雅动作。这是因为电视与收音机被假定为传播力无远弗届，有极强的公共性格，因此主持人乃是公共的典范人物，必须体现文明化（civilizing）的最高标准；相对的，「非正式化」（informalization）就成为电视广播的大忌。电视与广播的这种严格的规范禁忌，近年来显然随着整体社会的非正式化而逐渐瓦解。有关文明化与非正式化，可参看Nobert Elias及其后继者的著作。
4. 试想：如果台湾人民认为某歌星搞同性恋通奸劈腿是比统独之争还重大的事件，那真是台湾蓝绿政客们的灾难！当然这也意味着，台湾的主要矛盾已经从统独转移到性道德文化。很多人忽略政客也是需要被自身的重要性所培力的（台湾政客对于香港艺人张国荣自杀新闻占据报纸影视重大版面一事，非常吃味，还提出批评，这显示了政客们根本脱离了许多人民群众的生活情感现实），很多人还忽视了「重大事件的重要性是需要被建构的」，因而以为统独之争是「自然」的现实大事、八卦新闻是当然的猫狗小事；这种观点不能解释最近二十年美国社会的文化与道德价值战争。关于此处的论点，何春蕤的〈选举〉一文有更深入的阐释，收入何春蕤的《不同国女人》（台北自立出版社，1994），页202-205。
5. 阅听人监督媒体联盟于2003年底点名批判罗璧玲所主持的「九点麻辣烫」等节目，罗璧玲回应：「这是谈话性节目，我们的题目与新闻谈话性节目有啥不同？竟说我们腥膻色！为何不去骂那些怪力乱神的灵异节目？为何不去点名那些爱做秀的立委政客啊？」
6. 2003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中，绿营支持者推出被视为不入流与抹黑的影像戏剧，以光碟方式在台湾流通，引发法律管制（包括涉嫌毁谤）与言论自由之争议。结果，在民进党政府的保护下，这个名为「非常光碟」的事件被定位为言



论自由。我们很难想像，当边缘主体以同样方式发行光碟时（如以戏剧方式呈现援交者或自拍者的能动性 with 光明面），会不遭到法律迫害，而被言论自由所保护。

# 综艺节目是性剥削吗？

## ——反对媒体分级制度

何春蕤

萤幕上出现暴露女体或者玩笑性事就是「性剥削」吗？

没那么简化。事实上，身体的影像呈现和各种言谈讨论都是现代社会将文化禁忌一步一步除魅的征兆。在过去，能够有管道和机会接触（因而主导）情欲话题和文化的人局限于男性成人，单一性别掠夺有关性的话题可能是常态。但是现在女性主体和性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只是躲避、或者受害而已；相反的，透过无远弗届的大众媒体，早已另类实践的情欲及权力弱势主体终于能够近用（access）文化资源、自我发声、传承经验知识。在这个时候还用「性剥削」来一竿子打翻媒体中的身体影像和情欲讨论，反映的恐怕只是某些主流观众的性观念和阶级身段而已。台湾有一小批具有舆论影响力的主流观众，总是想将自己的品味强加于别人，认为讲黄色笑话、暴露身体、谈论另类的性观念等等就是「没有品味」，因此总想援引公权力来「净化」媒体，过去用的借口不外乎「保护儿童青少年」、「提升观众水准」等等。近年来，女性主义论述抬头，因而也大量援引「反对物化女体」、「反对性剥削」的讲法，终究还是要「净化」媒体。

### 真正的「性剥削」

举个电视节目中真正的「性剥削」例子。有些秘密档案式的节目会挑选呈现槟榔西施、援交少女、公娼等等女性主体，然而不管主

持人如何宣称公平开明，关心弱势，终究还是会义正词严的追问受访者：「如果你的兄弟姐妹或儿女是（槟榔西施、援交、第三性公关等等），你会觉得怎样？」这个问题暴露了它根本假设边缘性不是什么好事，而想借此逼迫受访者否定自我的人生选择。又例如美少女单元总是耸动式的聚焦于她们已经十分成熟性感的身体，可是同时却又不断谆谆教诲美少女们不要太着重外貌和身体，而应该努力做清纯童稚的好孩子。这些都是严重的「性剥削」：因为它们一方面利用这些性主体的「性」来作节目，另一方面却又根本否定她们可以自主的掌握与肯定自己的「性」。

## 真正的「言论自由」

今天的讨论大纲把性剥削和自由言论对立起来，好像身体裸露、情色玩笑都是假借「言论自由」的名号来枉顾剥削、自私自利。不过，我倒觉得身体裸露、情色玩笑并不一定是言论自由——它更可能是文化遗产，可能是分享媒体。大众媒体中真正相关「言论自由」的现象，事实上是综艺节目及新闻报导中对性少数所采取的言论箝制。例如受访的性边缘主体若是在访谈中肯定自我，坚持外遇没什么不好、援交也可以是青少年很好的出路、裸体写真是值得骄傲的事，主持人就会露出不豫的神色，拼命讲反话消毒，或者请专家学者来权威压制，后制单位则考虑剪掉这些肯定的言论，至少也要在结语时塞进一些担忧、警示、撇清的话。像这样的操作方式根本就湮灭了性主体的自我，更遑论让她们言论自由？

## 净化就是污名化

因此我觉得综艺节目的问题不在于暴露的女体或者情色笑话（这些呈现都有可能丰富并松动僵闭的情欲文化）；真正的问题在于，综

艺节目或新闻节目在呈现这些影像和玩笑时，一向拒绝同时容许边缘的性观点、非主流的性观点、以及那些肯定性少数的观点来分享媒体空间。如果妇女团体声讨电视媒体的时候，只是套用「物化女性」的简化公式，批评综艺节目太过俗烂，要求更加严肃的紧缩情欲空间和言论，这样的做法事实上只会更加封锁性少数展现自我的管道，更加「净化」公众讨论，也因此更加「污名化」那些肯定自我的性别异类。真的要体检综艺节目的性别歧视和性剥削，妇女团体就应该和简化了的道德净化说法划清界线，致力开拓更大的媒体空间给弱勢的、少数的、被污名的、非主流的性主体，这才是支援多元多样的女性主体的积极做法。

## 法律和分级制度

分级制度假设了生理年龄可以主宰心理成熟度；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知这个假设站不住脚，因为反例比比皆是。分级制度进一步相信生理年龄应该决定一个人可以接触什么样的资讯和经验；这里面则充斥了当代的年龄政治，很轻易的就在「保护」和「关心」的说法之下进行无理的的限制和封锁。

在某个层面上来说，分级制度是此刻的历史产物：成人的焦虑是，下一代的知识、能力和欲望正在逸出长辈们的控制，甚至远远超越了成人的想像。然而，面对世界快速变动、知识的内涵和管道急速扩张、孩子愈来愈早寻求施展自主的能力，成人并没有积极去思考如何在新的局面中与孩子营造平等协商的互动，改造自己已经属于上一个世代的眼界和感觉，反而严厉独断的在固着的年龄成见上设计分级制度，并用法律监督来强制执行。说穿了，分级制度是年龄压迫的一部份。

很显然的，分级制度常常充斥了某些成人的品味偏见。谁能说国家地理频道的动物世界（从残杀到交配）就比综艺节目的暴露和玩

笑更为适合儿童？谁能说迪士尼的亲情伦理片不会引发本地儿童对自身劣质亲子关系的不满而形成更大的反叛？然而，分级制度似乎对和性相关的内容特别关注，这种出于「性歧视」的「忌性」文化则对众多跃跃欲试的孩童进一步形成严厉的惩罚和羞辱。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权力操作却也同时激发了少龄者抗争的动力。从过去的经验就知道，这些分级制度或许让父母师长可以振振有辞的垄断观赏频道，但是更常见的是，分级制度也为青少年和儿童标示出禁忌之所在，让她们可以按图索骥的挑选成人最不想让她们看的节目。总之，无论如何严厉的规范分级制度，到头来恐怕还是无法要求所有的观众都遵循分级制度设计者一心一意要实现的理想蓝图。分级制度只是方便执法、鼓励越界而已。

## 国内外消费者的抵抗经验与如何培养阅听受众的批判能力

「抵抗」及「批判」都已经假设了观众必然拒斥综艺节目，然而收视率和开机率却显示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即使观看综艺节目，观众也不一定是全然同流的。除了那些在优雅的客厅中只看公视或进口频道的中产观众之外，有更多的观众是全家人一起，一面看综艺节目哈哈大笑，一面集体取笑主持人缺德、新单元无聊等等，其中不乏那些常常被专家学者当成「没有判断能力」的孩童。事实上，观众即使在模仿节目的口头禅或者主持人亏人的本事时，都是有她们个人的使用脉络和创造性的。把观众单单当成「受众」，当成被动承受讯息而且全面接受讯息的脆弱灵魂，就已经湮灭了观众的主动诠释和判断。（观看新闻评论节目就比较有批判力，而观看综艺节目就一定低俗无知吗？这里的性别和阶级判断值得分析。）

另外，把综艺节目「污名化」，当成可耻的、不好承认的休闲活动，并不能阻止观众观赏，而只是透过这样的不齿评断来凸显批评

者自身的优越、断言综艺节目观众的低俗，更强迫后者在人前、摄影机前否认观看／喜欢这类节目而已。这种羞耻或伪善的表现又岂是孩童的好榜样呢？

当然，有些观众或许会痛恨这些节目到一个程度，不断打电话、传真、上网、开记者招待会加以谴责，以造成某种「舆论」的压力，或者甚至邀请民间团体以及政客来召开公听会，把节目当成社会问题处理。由于这些剧烈动作往往建基于道德义愤或主流价值的自信自满，因此也常常成功的迫使某些具有开拓性的节目提前消失（例如深受争议的「信不信由你」或「花魁艺色馆」）。

我在前面说到观众不是没有批判能力，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断强调我们需要提升观众的批判能力呢？显然，学者专家们心目中想要的那种批判能力是有特别针对对象的，而且是有特定文化品味和阶级立场的。问题是：批判能力哪会只针对综艺节目呢？哪会只针对性和身体的呈现呢？作为一种普遍的质疑能力，它应该也会同时对所有出于特殊文化品味和阶级立场的「体检」加以检验批判，它更会积极抗拒那些过度监控媒体的力量。

## 政府和民间团体的角色

观视品味的选择不是号称追求尊重多元、积极支持弱势人口的政府或民间团体应该关注的事情——因为设定单一的价值，推动单一的品味、对新兴现象和事物预存芥蒂等等，都不会有助于创造那个我们期待的开明社会。如果我们真的关切综艺节目呈现的性文化和性别关系，或许我们需要的是——

### 建立自在的、不受检查的媒体空间来公开谈性

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性态度，都能自在分享媒体和教育的空间。像「天天星期八」「Jacky Sow」都常常出现一些非主

流的性观点和性实践，如果主持人不要妄加断语或劝说，这类节目是有助于所有的民众都拓展性见识，更有利于性少数呈现自己，肯定自己。

### 开发更多的身体呈现，越过性别和阶级的范畴

不仅女体，我们需要能够面对并讨论各种身体（包括男体）。前一阵子猛男秀出现时，许多女性都已经能够成熟的面对，锻炼出一种沈稳，然而后来猛男秀还是被警方恶意站岗临检而被污名化，身体又再一次被打压。我们希望身体的呈现更为平实化，多样化。

### 呵护并支持大胆谈性的女主持人主控综艺节目

目前综艺节目多半是由男性主持人操控，在观点上的偏颇当然值得诟病。但是性并不是男人的专属领域，女人也应该可以谈论自己的经验和观点，艺人中也不乏曾经大胆谈性的女主持人，像过去第四台年代的朱慧珍、罗璧玲、许晓丹等等。但是她们多半都被边缘化，被视为粗俗，被迫放弃某些开放的形象。这显然是一种阶级政治。我们需要打破雅俗之分，打破性别的局限，更要打破对女人极端不利的性禁忌。

### 民间团体不该援引公权力来自我矮化民间自主性

民间保守力量援引公权力来镇压异己，以各种净化运动来消除文化上威胁其主宰地位的新兴力量，这种做法也已经丧失了民间社会的自主性，自我矮化了民间自主的空间。批判媒体应该是自主民间社会的自发作为：之所以批判媒体，正是因为媒体不够公平、不能呈现多元的身体与道德观念；之所以批判媒体，正是因为媒体屈从于国家干预、听命于主流阶级的指挥。

## 新闻局退出对广电媒体的干预

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是大众文化与公共论坛的场域，这是民间社会各种新兴进步与保守力量角力之所在，应当免于国家的干预。社会不断在变化，过去威权时代的新闻局曾经管制长发男星与奇装异服上节目，今日又以「教坏下一代」为由，来管制各种新兴身体形貌与另类性观念的现身。新闻局的角色似乎总是一种国家暴力，帮助保守力量阻止社会变革，而且几乎都致力于「品味」与「公序良俗」的维护——也就是国家暴力对于宰制阶级之主流秩序的维护——新闻局早已经失去了中立的角色。作为自由社会的国家机器，新闻局必须停止对广电媒体的干预。

——本文为作者出席2000年8月19日新闻局与妇女新知合办「体检综艺节目座谈会第二场：是性剥削或是言论自由？」的发言内容。最近两年，由民间保守团体组成的「阅听人媒体监督联盟」则已经取代新闻局成为监控并净化媒体的白手套。它们用点名批判的方式迫使广告商撤资，借此迫使言论尺度比较开放的节目封嘴噤声。这种保守的民间团体现在反而是遂行己意箝制媒体的新兴恶势力。





# 性工作：妓权观点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1998）巨流再版（2001）

废娼，就是以国家的力量来强迫女人免费提供性服务给男人。只要性工作仍然是非法犯罪的一天，女人就一天被警察与司法强迫从事无偿的性劳动。

为什么那些坚持社会正义、主张平等自由人道尊严进步的社运与女性主义者，竟然会赞成卖淫？为什么国际知名学者与国际人权组织纷纷声援台北公娼、支持卖淫除罪化呢？

妓权运动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许多先进国家都有各种妓权组织、刊物与运动。本书是第一本从学术观点介绍世界与台湾妓权运动的中文书，不但力求高标准的翻译品质和原创性的学术观念，而且以丰厚绵密的学养论证尖锐地批判反娼主张、并且以运动的磅礴气势捍卫妓权主张。



## 目录

### <性工作与世界妓权运动>

世界妓权宪章  
「性交易与女性主义」立场声明  
夺回「婊子」之名  
卖淫就是工作  
「净化」公共世界  
拒绝重复历史  
性工作者与性工作  
婊子污名

### <性工作与台北公娼>

#### 抗争篇

公娼抗争大事记  
我的工作，我的尊严  
「性工作除罪」是不可回避的妇运立场性  
工作与警察

性工作与性暴力

台北废娼违反世界潮流  
笑贫笑娼的中产阶级，欺贫打娼的北市政  
府  
从男性沙文主义到性沙文主义

#### 理念篇

优势妇运与弱势女性  
妓权组织之必要  
女性主义的色情／性工作立场  
性工作的性与工作  
同性恋／性工作的生命共同体  
（转载）：「不幸少女」几多墙  
性工作（妓权观点）书目

# 酷儿：理论与政治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1998）

「酷儿」（Queer）是不符合主流性规范、抗拒主流性道德、跨越性别的怪胎。

「酷儿」泛指同性恋、双性恋、变性反串、跨越的异性恋……。

「酷儿」不是正常的同性恋，是变态偏差的同性恋。

「酷儿」的现身是妖精出洞，魔怪现形，以欢乐和挑衅的方式现身，却不以悲情仇恨来壮大自己。酷儿绝不含蓄。

「酷儿」是鬼魅魍魉，是性的不法之徒，是性异份子，是性左派。

「酷儿」是惊世骇俗的运动策略、也是桀傲不驯的实践，以高亢的声调肯定自我，拒绝被主流社会同化。

本书包括酷儿理论家赛菊蕊（Eve Kosofsky Sedgwick）应邀来台发表的两篇论文：〈如何将孩子教养成同性恋〉与〈情感与酷儿操演〉；以及台湾酷儿论述的历史文件「酷儿发妖」，及第一、第二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目录

### <酷儿性别教育>

如何将孩子教养成同性恋

### <酷儿政治入门>

Eve Kosofsky Sedgwick 简介

什么是酷儿？

### <台湾酷儿历史文献>

酷儿发妖（座谈会实录）

### <酷儿理论与政治>

情感与酷儿操演

罔两问景：含蓄美学与酷儿政略

怪胎家庭罗曼史

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记

痛之华：五〇年代国共之间的变态政治／性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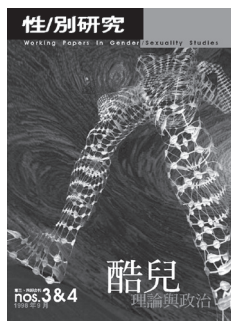
从左翼到酷异：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酷儿化」

### <酷儿全球化／女性情欲乌托邦>

欲望隐形轰炸机

猫儿噤声的妈妈国

从女儿国到酷儿国



# 性侵害、性骚扰之性解放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1999）

过去女性主义只强调「性骚扰性侵害的性别解放」，认为性骚扰其实就是性别歧视，性侵害即是性别压迫，故而性骚扰性侵害需要性别解放。但是主流女性主义的性别本质论忽略性别的内部差异、固定化女性受害位置、制造阶级年龄种族情欲的压迫效应、勾联国家暴力进行社会规训、迫害下层弱勢的性少数与性异议。故而主流女性主义的性骚扰性侵害论述不但不能达到性别解放的目的，反而更强化了原有的性／别主体建构，使男性的加害欲望增强、使女人更无力抗拒、使国家更能介入身体与人际关系。主流性骚扰性侵害论述之所以能够如此操作的关键就在于：主流论述充满了性歧视与性压迫。因此本书主张，性骚扰性侵害需要性解放，需要积极串连性别、阶级、年龄、种族以及公民政治，颠覆地操作各种性部署，甚至解构「性」本身，将「性骚扰性侵害」与其他各种形式（如年龄、阶级、性别、性偏好……）的「骚扰侵害」相提并论，以激进化彼此的反抗策略。



## 目录简介

《被学生控告性骚扰的女性主义教授》，Jane Gallop 广受注目的著作全书翻译  
「性骚扰性侵害与现代性」以全新角度探讨性骚扰性侵害  
西方女性主义战将 Lynne Segal 的两篇长文导读让你全面掌握此一议题  
批判台湾儿童保护团体的「儿童性虐待」论述  
为什么性骚扰必须性解放？为什么性侵害需要性解放？  
菲律宾同志理论家 Jose Neil Cabaro Garcia 分析同性性骚扰、校园性骚扰  
美国法学家 Janet Halley 探讨「同性性骚扰立法」，抢在英文版发表前刊出  
目前台湾性骚扰立法论述的检讨与批判  
吴敏伦探讨香港性骚扰立法  
两位性侵害当事人的反思自述  
豪爽女人何春蕤的〈防暴三招〉以及其他二十多篇精彩文章！

# 性工作研究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2003）

传统的娼妓研究过去在支撑政府扫黄废娼的政策和执行中提供了许多助力。这本书里收集的论文则是 1997 年台北公娼抗争带动台湾社会重新思考性工作之后成形的。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田野描述或理论思辨上，这些论文都和前一代把卖淫当成社会偏差行为的娼妓研究有着非常不一样的立论眼界和自觉的发言位置。不管是台湾扫黄废娼的阶级性别政治内涵，或是已经深入政府法律结构的年龄政治，或是女性主义阵营中已经面目清晰的中庸路线，或是新瓶装旧酒的反娼新论述，都需要性工作研究进一步的观察和具体分析。因此，在研究进路和观点上所呈现出和传统娼妓研究大相逕庭的视野，也将使得本书成为研究性工作的开疆辟土之作。



## 目录

### <性工作新局>

- 自我培力与专业操演：与台湾性工作工作者的对话
- 性、权力与钢管辣妹 Pub：一个田野的观察
- 酒店男公关之研究
- 「做」与「卖」：从「交易」与「交换」看性作为一种生存策略

### <香港性工作>

- 香港妓权运动的启蒙
- 香港街头性工作
- 性别与社会组织
- 情欲与权力：施叔青《香港三部曲》中

的情欲与性别互动

### <台湾公娼>

- 台北市公娼空间之再现：木屐、密道与七块钱的故事
- 公娼对工作之自我认知对生活及工作环境的影响与使用

### <女性主义／性工作理论>

- 娼妓、寄生虫、与国家女性主义之「家」
- 位移与游动：菁英女性主义「家国」里的猫狗苍蝇
- 娼妓研究的另类提问

# 跨性别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2003）

在一个宣告性别平等建制化的年代里，充斥多元性别符码的商品影像文化似乎提供了另一个松动性别藩篱的强大力量。然而无数坚持性别认同的身体却仍然持续以其肉身揭露性别体制的深刻箝制。

这么看来，以异性恋女人为主体的性别解放其实只是争取「两性」平等的妇女解放。因为只有当跨性别得到自由平等时，才能有真正的「性别解放」。事实上，跨性别运动的发展将促使「性别」这个概念逐渐失去原有的文化效应。

台湾跨性别主体的生命抗争，加上世界知名跨性别作家费雷思及其爱人的跨性别运动经验，架起了跨性别的蓝调吟唱。一个充分操弄性别符码但是无法单纯以性别来归类或想像的人种正在萌芽中。



## 目录

### < 跨性别主体 >

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  
变性欲症患者变性手术后的身心社会适应  
「性／别压迫」：跨性别主体在台湾  
Brandon Teena 资料库  
表演、Bakla 与东方主义的凝视  
解读台湾综艺节目「反申模仿秀」的性别文化：以《台湾红不让》的〈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为例  
网路酷儿再现娘娘腔  
跨性别美学初探：晚期现代性与漂浮的性感

### < 跨性别运动 >

在奋斗中浮现的跨性别  
我们都是正在成形中的作品  
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性别谜题  
婆女性主义：网路专访朴蜜妮叫我跨性人  
跨性别主体与性别解放运动  
T婆的跨性别蓝调诗  
跨性别运动对女性主义的挑战

# 性工作与现代性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2004）

性工作为何会（或不会）造成出卖自我与异化？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回溯到「现代雇佣劳动或服务工作者为何会（或不会）造成出卖自我与异化？」这个更一般性的提问（这是黑格尔等人在雇佣劳动开始普遍化时期所关注的问题）。现代各类型的工作（特别是在发端期与非完熟期）也是充满了工作者的自我被占有、隐私被侵害、公私界限难以维持的异化风险。本书认为服务工作者或顾客自我隐私被对方占有，乃是透过实际的人际互动技巧来达成的，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问题意识「性工作者如何在陌生人面前呈现自我？」在此提供了关键性的说明。但是这样的一种现代人际与自我现象还需要更广泛的脉络解释，亦即，服务工作者与顾客双方为何能够在互动中维护私密自我与隐私、为何能够动态地操作公私界限，乃是关乎现代社会的一些宏观趋势或结构性条件如何形成了现代自我。本书〈序论〉列举了五类造就这种现代自我的现代条件或趋势动力，由此一般地说明了现代性工作中自我问题的脉络。就此而言，现代性工作之所以能够不会造成自我让渡，并非个别性工作个人的独特性质，而是深刻地根植于（晚期）现代的社会条件与趋势动力中。

本书〈再论〉对性工作的互动过程的各个面向进行了一个高夫曼式的诠释分析。许多看似特殊的性工作现象（过去经常被其他研究者诠释为性工作的异化、不伦、受害…的表现），现在则被本书重新诠释为：性工作者运用一般人际互动的普通日常技巧与现代组织常见的管理规训技术，来维护有利工作顺利进行的例行化方式，以及维护自我的疆界。易言之，性工作者之所作所为，其实只是当代服务业普遍的实践方式、或现代人的一般互动方式，毫无特殊之处。这个高夫曼式的诠释分析架构将性工作的问题放在当代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中心，处理的正是社会理论的一般问题（劳动过程、公私领域、现代组织的理性化、现代自我、规训与监视等等）。（本书以简体字出版）



# 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

本書試圖批判地檢視一些流行的標準觀點，例如：「從刺青穿洞染髮到奇裝異服等等青少年通俗文化只不過是商業利益對青少年的剝削利用，女人的瘦身減肥則是性別支配的結果，而媒體則是剝削與殘害青少年與女人的重要制度」。針對上述說法，本書從一個嶄新的分析角度提出下列問題：

身體作為權力爭戰的場域，其自身的物質性是否足夠頑強而能抵抗權力的形塑？這個物質性是生物生理所構成的嗎？能夠形塑或影響身體的權力，除了來自性別、性、年齡、階級、種族等等為人熟知的面向以外，其中是否還有強大的現代性動力趨勢？媒體在這個身體形塑中的角色功能是什麼？權力以何種不同的策略來管理主流常態身體以及邊緣偏差身體？公共呈現與公共空間如何排斥偏差身體(如肥胖的身體、刺青穿洞的身體、裸露的或性感的身體、不道德的性身體、畸形醜怪的身體、死亡的身體)？目前對於媒體的批判或監督，究竟是為了批判主流身體，還是為了排斥偏差身體出現在公共空間與公共呈現？到底什麼才是具體顛覆主流身體霸權的多元化策略呢？

ISBN 957-01-8748-4



9 789570 187489